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论集

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凤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74,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000

书号 2002·267 定价 1.25元

目 录

探索探索者的道路,开辟未来·····	冯 定(1)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谈一点意见	
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孙伯鍤(19)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李由义(44)
《德意志意识形态》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叶汝贤(6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	蔡英田(84)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 历史地位·····	王卫国(102)
《哥达纲领批判》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	徐 亮(121)
《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绍孟(138)
异化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与性质·····	赵仲英(156)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张文煜(16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陈村富 陈荣富(18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基础	
略谈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	隋儒诗(206)
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规定及其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余其铨(219)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问题·····	曾盛林(232)
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	靳辉明(241)

试论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丁常春(262)
列宁对冯特哲学观点的评价	黄枬森(275)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规律观的发展	吴振海(284)
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体系	郭文卿(293)
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宋一秀 许全兴(302)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贡献	崔自铎(319)
对矛盾同一性“第二种意义”的历史考察	王永祥(327)
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情况述评	谢浞波(338)
各国对德波林学派的评论	张念丰(361)
《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简介	俞长彬 钱学敏(375)
编后记	(380)

探索探索者的道路,开辟未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
研究谈一点意见

冯 定

(一)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如何研究这三部分?首先是尊重历史,要把它当作人类认识史中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如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部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都是在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提供的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很重视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就以能熟练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自诩。在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里,他曾说,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简直有点要“卖弄”它。恩格斯也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深入地研究和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能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人的肩上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作为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反映论,就不可能有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优秀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之间的思想继承

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从它们那里发生以及后来又怎样同它们脱离，研究它们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与历史联系，对于历史地、科学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产生时与当初那些资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代表人物有过历史联系，而且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也仍然是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看法上，除了充分地研究了摩尔根所提供的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以及若干个重要观点外，还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修正主义者的国家观、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尤其是以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他们主张无领袖、无权威、无组织、无国家，有人甚至主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国家），对于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关系极大。因此，不懂得或不能了解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受到了各种反对派观点的不止一次的攻击，并且马克思本人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答辩这些反对派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愈益显示其光辉与正确。马克思说过：“那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

现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无论赞成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都在对它研究，有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有些观点讲得有道理。例如，在西方颇为流行的社会学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社会学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作宏观的观察，而其他社会学种类则是对社会作微观的观察。有些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社会学里的“冲动派”或“冲突派”。这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但是它却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些人的政治观点是进步的）也在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观点拿过去为他所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研究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认识的成果，它一旦产生，就获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固然，他还是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着自己的内容。但是应当说，它同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相互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人们也总是在比较当中获得认识并发展自己的认识的。列宁在讲到哲学史的时候说过，全部哲学史都是人类的认识史，这个结论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适用的。

一说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史，就会牵涉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观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工具，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当然同社会上各个阶级的命运、同政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从“表面上”、而且从“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正是指这一点而言。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研究它与政治的关系时又必须注意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表现在同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等）相比，它距离经济基础是最远的。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其抽象程度远为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及。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哲学，除了有政治上的成因之外还有认识上的成因。一种哲学体系的产

生,固然是和社会上阶级的、政治的分野有关联,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有关联。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完全改变。就是说,在政治要求与哲学观点之间,已经经过了若干个中间环节,在人们形成哲学观点之前,又经过哲学家或思想家们精细的加工。这种加工会受到科学技术水平、伦理道德、传统与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人们在形成一种哲学观点时是发挥了自己特殊的能动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除了有联系政治这一面外,又有超脱政治的这一面。从历史上说,许多有成就的哲学家并不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中的不少哲学著作也都不是充斥着政治内容的,其中有些人甚至还以厌恶政治、企图摆脱政治而著称(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况有些不同。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①可是问题在于,上述所分析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还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观点体系,作为一种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学说,也必然还有认识史的这一面。马克思不是神,一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不是神。他们对待世间一切事物的认识也都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知到比较完全地知。列宁有一句名言:“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②难道哲学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就变成“圣经”,就变成完全的、绝对的真理了吗?多年以来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在对于哲学的研究以至于在一切学术研究领域里,完全用政治标准代替了理论标准,又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3页。

理论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常常是把马克思的或其他几位革命导师的某一句话或某几句话当作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公式，去非难或否定他们讲过的另外一些话；或者是为了适合于所谓“当前政治”的需要，硬是对某一句话作出这样或那样随心所欲的解释。其实这种解释完全是从外面加上去的，是在经典作家那里根本没有的。或者是你捉住这几句话，他捉住另外几句话，而又常常各执一端，争执不下，完全作表面的、字句上的争论。大家都求救于“本本”，以为这样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这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之有害的。这种做法就排斥了历史地、科学地去探讨问题；对于实际问题也无任何补益。不能忘记列宁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种最完备、最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贡献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凝固的东西。所以，为了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了能够对其中某个观点作出合乎实际的、真正科学的分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反对公式化、教义化、简单化的倾向，就必须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研究，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

(二)

我们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研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仅仅是一部认识的历史。而是要求我们注意到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的有机统一，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有机统一。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辩证法既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又是认识的规律。而所谓逻辑，即辩证

逻辑，是指人们在运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时所遵循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它仍然是认识范围内的事。所以，所谓这三者一致，从实质来说，就是指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同认识的辩证法是一致的。当人们运用这三者一致的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时，可以发现，历史规律同时也就表现为逻辑的规律和认识的规律。一方面，当着研究人们认识的历史发展时，就能时隐时现、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现出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只有把历史规律提高到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高度来研究，人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才能更深刻。不难理解，列宁对于“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①，以及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起点常常也就是人类认识的起点这些精彩的思想评价很高是有道理的。

既然历史的规律同逻辑的规律是一致的，那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时，就要自觉地运用这种一致性，从历史现象的演变中把握其中的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发掘其中内在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以便使我们的研究能深入一步。

为了说明这种一致性，让我们举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例。大家知道，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也不止一次地批判过。但每一次所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都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表现了它的内在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斗争。而这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如蒲鲁东和巴枯宁），则

^① 《哲学笔记》，第210页。

是以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空想主义即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承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蒲鲁东在他的《什么是财产》和《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文章里，提出了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以剥夺人类的平等为基础，因此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由此出发，他主张取消一切政府。马克思尖锐地抨击了蒲鲁东，认为他不知道种种社会制度均是“历史的产物”，他全然不懂历史，更不必说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蒲鲁东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与他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地位相适应的。因为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中，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①正是由于小生产在经济上是分散的，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也排斥任何集中或者专政。小生产者害怕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正如害怕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由此，小生产者的思想就具有平均主义、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特色。显然，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对立的。

列宁也对无政府主义进行过无情的斗争。他在一九〇一年便写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提纲。批判的锋芒是指向俄国的民粹派。但是列宁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已经同马克思时代不同了。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还主要是以思想家和学者的观点来看政治，那么，到了列宁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代，则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观点来看世界。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直接的实践任务，为了扫荡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列宁集中力量批判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列宁从思想上、路线上，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上，全面地抨击了无政府主义，尤其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实践方面和思想根源方面的种种错误。列宁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此就根本不知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不懂得剥削的根源，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也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其后果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①在以后，列宁又揭示出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即“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同一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所选择的角度，所批判的重点以及所解剖的深入程度都是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既然是根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性，所以在小资产阶级存在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会根除的。不仅斗争在深入，人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对于无政府主义也作过尖锐批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写了《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和《一个反抗者的话》。斯大林在一九〇六年间写了著名论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批判锋芒集中指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特别针对克鲁泡特金说的“任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沦于灭亡”的论调,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专政以及对巴黎公社的认识,竟象我们“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指中国方块字难懂难认——引者)^①。他们根本不知道,所谓专政是整个阶级实行专政,而决不是少数几个人实行统治。无政府主义者既然否认任何专政,当然也就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反对“少数几个人实行统治”的借口下,把无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化为乌有。所以不待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而对真正的敌人也就必须作“真正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个批判,较之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无疑是更深入了一步,因为他指明无政府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的实质,指明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明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意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途径。而这个问题是只有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成为直接的实践任务,并且围绕这个任务的斗争深入一步以后才会提出来。

总之,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导师对同一问题所作的批判,绝不是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联系。这些批判既反映了历史条件的演变,又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②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在同一事物身上有多方面质的规定性。这些质的规定性是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而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决不是一次、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历史会有某种程度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重复，认识也会有多次反复。人们只有在反复认识中才能逐步揭露出事物全部的丰富内容。正因为历史的发展有重复性，所以才有规律可寻。然而又不是简单重复，这才产生了事物的发展与认识的发展。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才能逐步揭露出事物的全部丰富内容。而且可以从这些认识的比较和研究中，发现它们内在规律，这就不仅是研究历史，而且对观察现实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另一个问题需要提出的，就是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及其各自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似乎可以这样划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确立；另一个是这些理论在实际中运用。当然，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基本理论也会有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实际运用也可以延伸至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但是比较起来，这两个历史阶段还是可以大体上做些划分的。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这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①在此前后，列宁还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公式的世界”，而革命实践是“现实的世界”，重要的是善于从公式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

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著作或理论存在时，它所要求的是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论上的完备和准确，就是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全部人类社会所提供的优秀文化成果作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既不能忽略一点点成果，又不能忘却“批判地审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得出为前人所不能做出的，并且是充分领会了以往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的新的结论。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可称为这种新结论的典型。《资本论》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新结论时，其材料之充足，结构之严谨，方法之妥贴，论证之充分，均为历史所罕见。但是，不能因为马克思写了《资本论》，无产阶级就可以象等待福音到来一样坐等世界革命获得胜利。相反，马克思强调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列宁还说过：“我以为实践胜过世界上任何理论性的争论。”^①这样，当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摧毁旧世界时，就必须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人们熟知，例如列宁所写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其对阶级关系分析之精细，运用策略之灵活多变，运用一般原则时的创造性等等方面，又可称为后一方面的典型。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写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不必要求列宁再去写一部《资本论》。因为两者比较，除了历史条件不同以外，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同。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说的：“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②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具有新的特色。列宁在不同的著作里，还多次引用歌德说过的名言：诚实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注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这个特点，不是没有意义的。有许多的矛盾或者分歧的意见难于取得统一认识，正是由此而发生的。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的问题就是一例。有人说，马克思原来预计，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会首先取得胜利，而结果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一个这种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方国家，虽然取得了胜利，又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曲折，甚至倒退。于是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他们说，或者是马克思当初的论断就不正确，或者是现实的发展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方面的责难，都共同地反映了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就是要求任何理论都能在现实中百分之百兑现，要求规律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要求在“公式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间划等号。其实，他们不懂得，发现规律同运用规律虽然密切相关，但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当着人们发现规律的时候，必须在分析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为此就要求舍弃那些枝节的、非本质的、个别的或特殊的东西。这样才可以达到“真知”。恩格斯在驳斥不可知论者耐格里的论调时说的话，正是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①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的升华过程。舍弃了这个过程，任何规律性的认识都不可能获得。然而，当着人们运用这个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时，则必须把抽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的东西再还原到具体，即必须把一般理论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相结合，进行特殊的分析，必须有新的具体结论来补充，否则就会成为空话。例如前面说过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究竟在哪些国家首先获得胜利以及怎样巩固这个胜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自己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补充了许多新的结论。这是人所共知的。

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夺取革命胜利时是这样做的。列宁关于一国可以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等等，都是由理论化成现实时进行了卓越分析的典型。他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特别强调这一点，曾这样说过：“……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实践运动的每一个步骤，都胜过一打纲领。’这句话现在特别令人信服。”^①他还幽默地说：“谁要重复旧公式，把他送进‘革命古董保管库’。”^②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依据列宁所说，当俄国革命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的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在中国的土地上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许多新的创造。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点，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思想原则。他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在表现形式上要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具体运用之间的差别，要通晓马克思主义是困难的。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运用到新的领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著。

(四)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当提出来，就是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对曾经反对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反对派，都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化，不要以偏概全。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由于形而上学猖獗，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恶果，就是对人和对事都不实事求是，把某些人说成一贯正确，甚至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正确，另一些人则一贯错误，甚至是坏到了底。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反对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反对派，只要他们的某个观点曾被批判过，就认为他是一个公认的反面人物，从此就可能“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完全要不得的。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们对人类的贡献是极其伟大的。他们所提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他们在对于社会变革问题上所提出的重大理论以及为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疑是我们每一个革命人民都要认真学习、认真遵循的。但是也并不是一点错误也不犯。把他们说得一贯正确，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认识规律。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马克思、恩格

斯本人以及列宁,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错误从来没有掩饰,也是不必掩饰的。问题在于对错误作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列宁说过,分析昨天的错误,正是为避免今天和明天重犯错误。当然,列宁也说过,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百倍、伟大百倍,在历史上宝贵百倍、正确百倍。但是应当说,错误总还是错误,归根结蒂是要纠正的。

相反,曾经在革命发展的某一时期是错误的党派或个人也不能简单地钦定为“一贯错误”。列宁从来就反对这样做。他的这种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人所共知,在俄国革命历史上,民粹派曾经是起过很坏的作用的。列宁在开始革命的一个时期,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批判民粹派。但是他在尖锐批判民粹派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时,同时又指出,必须把民粹派纲领中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加以区别。他说:“民粹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是需要绝对反对的。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①后来,列宁对于孟什维克也采取了这样具体分析的态度。

考茨基是大名鼎鼎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堕落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吹鼓手。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又写过攻击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论无产阶级专政》。列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478页。

宁为此立即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来回击他。但即便是考茨基这样的人，列宁也不是一笔抹煞的。列宁不仅多次提倡要读考茨基在变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之前所写的著作，而且在若干重要观点上，例如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上，对于合作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性问题上，在对于革命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问题上，都肯定了考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在讲到考茨基关于革命中心转移这个正确观点时，曾大段引证考茨基的话。考茨基曾这样说：“……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纪前半叶，革命的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一八四八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意味着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以下，考茨基还说了这样一段富有诗意的话：“一八四八年，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烈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大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在引这段话之前，列宁颇有感慨地说：“这位著作家就是卡尔·考茨基，我们现在应该同他断然决裂，同他进行斗争。但是，他以前在同德国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之一，而且我们曾经同他合作过。那时候还没有布尔什维克，但所有同他合作过的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都对他评价很高。”^①读了列宁这段话后，使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反对派，不是有着顿悟之感么？

列宁向来主张，不因人废言，也不要因事废言。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真理毕竟是真理，哪怕它是出自伪君子之口，哪怕它是用虚伪的声调讲出来的。列宁这句话，对于那些好用大帽子压人，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486页。

滥用党的威信，动辄置人于死地的人，真是一个当头棒喝！

至于列宁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科学评价，更是大家所熟知的。普列汉诺夫是有过很大贡献的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称赞他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①甚至说过，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工人必读的。尽管在一九〇三年，特别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有些错误也是严重的。然而列宁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历史功绩。即使在普列汉诺夫死后，列宁仍然说：“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在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②

无论对革命导师还是对犯过错误的人都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正是表明他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不仅是表现了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底，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避免神化或丑化个人，而且也是为了有力地反对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绝对化。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者说来，只有对人对事都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经得起长久的历史的考验。

* * *

以上所说，都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而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任何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态度都应当坚决反对。古语说：“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正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世界上已经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而且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已日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并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信仰。所以，为了使这门科学不致如马克思所说，由“龙种”而变成“跳蚤”，在这里强调一下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不是没有益处的！

探索探索者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同任务。

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孙 伯 铨

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在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影响下形成的。不是纯哲学的兴趣，而是不断尖锐化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现实，把他引上哲学批判活动的道路。在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完整地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论题的选定

马克思关于《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是从1839年初开始的，论文的撰写约始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底结束。论文题目确定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根据他在序言中所说，他的研究计划并不限于伊壁鸠鲁哲学，而是包括了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怀疑论派在内的希腊后期的整个哲学思潮。马克思所以选定这一时期的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首先把伊壁鸠鲁哲学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有其深刻的考虑的。他进行这一研究的理论目的，是要借助于对希腊哲学历史的批判考察、探索和确定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认为，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有着某种历史的类似。根据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阐明的哲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观点，马克思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看作希腊精神移植到罗马

去的形态，是“罗马精神的原型”。正如罗马历史是希腊历史的一个必然的发展一样，上述哲学也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必然的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一反传统的看法，认为不能把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各学派看作希腊哲学的“暗淡的结局”，似乎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鼎盛时期，以后就走向衰落。他不同意用“发生、繁荣和衰亡”的空泛观念来解释整个希腊哲学的历史，认为对于它们（希腊后期哲学）需要在“一定的特殊性中予以考察”。他说：“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象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①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这些体系是希腊哲学发展的完成，因而“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对于这些体系的一般特征，黑格尔虽然在他的《哲学史》中做了大体正确的规定，但由于他的“思辨的观点”，毕竟未能看到它们对于希腊哲学以及一般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强调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派的历史重要性呢？这是因为它们都是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哲学”。从马克思当时的观点看来，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是时代精神的真正体现。他把自我意识看作体现哲学发展的“精神负荷者”。这一观点是“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所共同具有的。1838年鲍威尔开始从自我意识的观点批判基督教，1840年科本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一书中借助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来论证自由思想。马克思曾谈到他对上述希腊诸体系的重视是直接受到了科本著作的较深刻的影响的。他说：“人们将理解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体系的时代现在才到来。它们都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的这种

^① 《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类似表现了一种共同的历史必然性：它们都是时代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如果说，在粗暴践踏一切高尚、美好、代表着精神个性的东西的罗马社会中，自我意识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被迫逃往自己的内心，企图在主体思想中寻求自由与安宁，那末在基督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德国，面临着为自由而斗争的类似情况。所不同的是人们将不会只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自由和避难所，而是力图通过以哲学为武器的批判和斗争来改造外部现实，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认为，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独特的形式。他指出，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即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只有把它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结构^①。正因为如此，对上述三派哲学的研究对于探索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如果那些较早的体系在希腊哲学的内容方面是较有意义、较有兴趣的话，那末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怀疑学派这一组的诸学派则在主观的形式，或其性质方面较有意义、较有兴趣。但是直到现在由于其形而上学的规定而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正是这些哲学体系的主观形式、精神上的负荷者。”^②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好挑选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来考察，依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只是作为一个例证，通过揭示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来纠正人们曲解和轻视伊壁鸠鲁主义等希腊后期哲学的根深蒂固的成见。

① 参看《博士论文》，第3页。

② 《博士论文》，第3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以后各学派的批评

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也是把它的辩证方法和保守体系区别开来。他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那个为保守的体系所隐蔽着的辩证发展观有着更本质的意义。他责备老年黑格尔派的无知，因为他们天真地、无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体系，以至“竟会斥责他们老师的见解后面的一个隐蔽的意向，他们的老师认为科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一个在形成中的东西。”^①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并非“哲学理念的绝对现实性”，它必须获得进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以从自己的哲学中作出保守的结论，其根源在于他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作为他的学生就应该彻底阐发他的哲学的内在本质即辩证法，而把它的保守的结论当作一种外在的形式加以说明。

然而，马克思企图冲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初尝试仍旧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企图用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则来改造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在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作为二者之统一的绝对精神。所谓实体和自我意识不过是在思辨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它们是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两个环节，作为人的象征的自我意识始终充当着绝对精神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这种思辨的观点，使黑格尔哲学极度忽视人（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使命和作用，也没有给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留下充分的余地。正是这个原因，使黑格尔对希腊后期的自我意识哲学抱十分轻视的态度，看不到它们对希腊精神发展的重大意义。为了把哲学变成反对专制制度和

^① 《博士论文》，第63页。

争取自由解放的武器，就必须提高作为人的自由和独立象征的个别自我意识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事实上，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不过是神的别名，承认绝对精神对自我意识的主宰地位，是和争取自由的事业相抵触的。马克思引用普罗米修斯的话说：“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然后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

马克思主张，哲学应当成为改造现实的武器，成为行动的哲学。但是，黑格尔哲学却没有提供实现其自身的能动的原则。黑格尔虽然把绝对精神的发展描述为某种能动的过程，但这只是一种脱离主体的抽象思维的能动性，这种抽象的能动性仅仅对于体系本身的构造才是有用的。当问题涉及到哲学对于非哲学世界的作用时，绝对精神的抽象能动性便需要打破思辨体系的束缚，转化为意志，即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这种体现哲学精神的主观形式。这时，个别自我意识便成为体现哲学发展的“精神负荷者”，即作为意志而进入实践的领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了表现哲学生命的个别自我意识的主观形式。”不过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以哲学为武器的理论批判。

由于哲学转化为意志，转化为个别自我意识而与其余世界相对立，黑格尔哲学的包罗一切的体系就被打破了，哲学似乎被降低为它的一个方面，而与别的方面相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本身的衰落，无宁说是它的直接的实现，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指出：当哲学作为意志转而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本身的内在满足及其园融性便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的光的东西就成为转向外面的燃烧着的火焰。”^①所以，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

① 《博士论文》，第65页。

化。哲学的世界化意味着它冲破体系的迷宫而走向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这既是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损失。马克思说:“个别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里面解放出来,同时就是把它自己从哲学里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①

但是,这种个别自我意识只是作为意志,作为行动的力量而与旧体系相对立,而在理论观点方面却并未超出旧体系(黑格尔哲学)的范围。在马克思看来,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只觉得同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却不充分了解它的整个努力只是为了实现黑格尔哲学的个别环节。马克思是这样阐述自我意识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一般关系的。他说:“这些个别自我意识只有在行动中和发展过程的直接力量中才能把握住自身,因而在理论观点方面,它们还没有超出那种体系的范围:它们只是感觉到同体系的有伸缩性的自我等同性的矛盾,而不知道当它们转而反对那个体系时,它们只是实现了那个体系的个别环节。”^②

虽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从黑格尔出发而转向自我意识哲学,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深刻的分歧。因为鲍威尔等人在摆脱了黑格尔的体系之后,只是简单地恢复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把精神同现实对立起来并赋与自我意识以无限的创造力。而马克思则不同,他始终珍惜黑格尔哲学的积极内容,这就是把世界(思维和存在)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具体整体的辩证发展观。在马克思看来,从黑格尔哲学向自我意识哲学的转变,决不是要抛弃它的理性的和辩证的内容,而是要赋予它主观的形式借以同现实发生关系。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个别自我意识并

① 《博士论文》,第 65 页。

② 同上,第 65—66 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不具有纯主观精神的意义，它只是世界理性(客观精神)所采取的主观形式。

由于马克思把个别自我意识了解为客观精神的主观形式，因而自我意识也必须具有精神所固有的一切环节，即普遍性、个别性和否定性。这些环节虽然在希腊自我意识哲学中曾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但是在那里每一个环节都是被表述为其中一个体系的原则，因而未能形成一个自我意识哲学的完备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不是要回到上述希腊哲学中的那一种，而是要发展出集各个环节于一身的自我意识的完备结构。不过在这些体系中，马克思较为推崇伊壁鸠鲁哲学而否定斯多葛主义，因为伊壁鸠鲁哲学把自我意识的个别性当作自己的原则，因而强调了个人的完全独立和自由。虽然它把个别性当作“绝对原则”会导致对真正和现实知识的否定，导致对任何必然性的否定，但这种消极的否定却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结果，即一切信仰和迷信的对象也都从人们的面前消失了。而斯多葛主义把抽象的普遍性提高为自我意识的“绝对原理”，就会为迷信和神秘主义敞开大门。因此，只有伊壁鸠鲁才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说：“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原则，就个别性不在事物的本性中居于统治地位来说，那末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知识当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超越于人的意识的东西，即是说一切属于想象的理智范围以内的东西，也就全部解体了。反之，如果把那只在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高为绝对原理，那末就会为那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葛派哲学中找到。”^① 这是马克思对希腊自我意识

① 《博士论文》，第47—48页。

哲学所作的简短评语。这个评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对希腊三派哲学研究的成果，而且说明了他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基本态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虽然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有着一定的历史共同性，但前者不应完全重复后者的道路，而应该以希腊哲学为借鉴，发展出自己更完备的构结与特点。他研究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此。

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是不同的时代精神的表现

马克思证明：虽然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原子和虚空，但是在认识论上他们却每一步都处于相反的地位：“一个是怀疑论者，一个是独断论者。一个认感性世界为主观的假象，一个认感性世界为客观的现象。那认感性世界为主观假象的人注意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表现了不断实验的、到处学习的、在广阔的世界中漫无边际地观察的不安心情。那另一个认现象世界为真实的人则轻视经验，体现了那本身满足了的思维的宁静和那从内在原则汲取知识的独立性。”^①不仅如此，作为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德谟克里特是从必然性的观点考察自然，力求解释并领会事物的真实基础；而承认感性现象的真实性的伊壁鸠鲁，却是从偶然性的观点考察自然，他对现象的解释趋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种对立里面仿佛存在着一种颠倒的情况”。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的这些重大

^① 《博士论文》，第15页。

差别,是由于他们的哲学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归根到底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是自由的希腊精神的体现,它充分肯定世界发展的合理性,怀着对知识的无限渴望,永远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认识,把对新知识的不断追求当着最大的享受与乐趣。所以德谟克里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我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更喜欢!”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则是马其顿统治时期的产物,马其顿统治的严酷现实扼煞了一切代表精神个性的东西,人们被迫逃往自己的内心生活,以便从中寻求安宁与满足。这时候,“时代的精神,即自身充实的、在各方面都完满形成了的精神原子不能承认在它之外形成的现实。”^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满自足的个别自我意识似乎成了世界的中心,而世界的合理发展和对外界知识的热情追求,都一概被否定了。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代特征时,形象地说:“飞蛾在普照万物的太阳西下以后,就这样去寻找人们各自为自己点燃的灯火。”^②

因此,两种哲学表现了两种对现实的态度。德谟克里特哲学以自然为中心,把人放在从属于自然必然性的地位上,面对着无尽的自然界,他象掉进了无底的知识深渊里。而伊壁鸠鲁哲学则渴望确立人的自由和独立,它把个别自我意识当作世界的中心,把原子变成了包含着独立性和自由的个别自我意识的象征。德谟克里特强调的是人对自然必然性的服从和追求,伊壁鸠鲁强调的则是人对现实世界的独立与自由,他把意识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确定为绝对原则。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正是把直接的意识形式,即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97页。

② 同上。

为的存在,变成自然界的形式。”^①

有鉴于此,马克思在比较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时,并非一味地贬低前者而赞扬后者。对于伊壁鸠鲁哲学,马克思充分肯定的是它克服了德谟克里特的机械决定论而阐发了人对现实世界的能动原则,在探索意识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建立了哲学的新起点。但是,伊壁鸠鲁否定了自然界的独立存在及其发展的合理性,从而把哲学的兴趣完全引向主体自身,遁入内心生活,脱离外部世界,这又是被马克思一再批评的。他认为这是从普照万物的太阳转向了为自己照明的灯火。

德谟克里特的认识论未能把本质世界(原子)和现象世界(事物)统一起来,一方面他把感性现象看作主观的假象,把感性的质仅仅认作主体的意见,另一方面,被他视为真理和原则的原子本身却没有现实性和存在,始终停留在纯粹抽象的范畴里。在他看来,存在着的東西没有真理性,而真理的东西又没有存在。作为实证知识的不倦的追求者,他不能不抓住唯一存在着的東西(感性现象),然而这个存在着的東西又是易逝的、变化的,因而不能直接当作真理。所以在德谟克里特的认识论中,原子的概念(本质)和感性的直观(现象)是相互对立和并列着的。在德谟克里特那里,原子世界代表着对自然研究的一种极限,是经验认识所不断追求而又无法实现的假想目的,它隐蔽在感性现象的无底深渊里,为经验的认识所不及。反之,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乃是个别自我意识的象征,原子世界是作为他的伦理原则的永恒的自然基础而被设定的。这就是说,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不是作为对自然的经验认识的原理,而是作为社会伦理的原理而被设定的,它是一种伦理学说的

^①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3页。

基础和推动原则。因此，伊壁鸠鲁认为，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正如原则和结论一样，是必须互相一致而不能彼此矛盾的，凡是作为原子（原则）而规定的东西，都必然体现在现象世界（经验生活）中。他不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的假象，而认作客观的现象，坚持以感性知觉为真理的标准，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导者。”由此可见，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虽然都从原子论出发，但一个重在对自然的认识，一个重在伦理的行为，故而在认识论上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马克思在总结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不同性质时说道：“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及其所有诸矛盾，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是已经实现和完成了，——而这自我意识在抽象的个别性的形式下是绝对原则，而推到最后的结论，它是抽象个别性的消融（指从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过渡到感性和经验的个别自我意识，即从抽象的原子世界转变为现实的经验生活——本文作者注），并且是和普遍性有意识地对立的。反之，对于德谟克里特，原子只是一般经验的自然的研究的普遍客观的表现。因此在他那里原子仍然是纯粹的和抽象的范畴，是由于经验的结果所得来的一种假设，而不是经验的推动原则，这假设因此仍然没有得到实现，正如真正的自然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受到它的规定那样。”^①

由于同样的原因，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则注重偶然性。德谟克里特否认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是变幻不测的，是认识所不能捉摸的，因而是假象，它同强有力的思维发生对抗，因为思维不满足于对偶然性的认识。而伊壁鸠鲁则反对必然性，认为必然性是人所不能驾驭的命运，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和否定。他说：

① 《博士论文》，第48页。

“即使信从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作物理学家所谓命运的奴隶要好些。”^①伊壁鸠鲁并没有探讨对象的真实根据的兴趣，他所关心的事情只在于使那作出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而对于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表现着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他只承认偶然性，而偶然性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在伊壁鸠鲁看来，只要不与感性知觉相矛盾，对现实的任何可能的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认为解释的目的只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求自然知识本身。马克思认为，对于伊壁鸠鲁，哲学，“凡是抽象地可能的东西、凡是可以设想的东西，就是不妨碍那思维的主体的东西，对于它就不是界限，不是障碍物。至于这个可能性是否也是现实的，它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它的兴趣并不关涉到对象本身。”^②

无论德谟克里特或伊壁鸠鲁都没有正确解决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都未能使马克思满意。马克思虽然同情伊壁鸠鲁对德谟克里特的机械论的否定，但根据黑格尔哲学对自由与必然问题的辩证理解，他显然不能同意伊壁鸠鲁把自由绝对化的抽象观点。他认为个别自我意识的自由不是和自然界的合理性相对立，而是和它相一致的。他说：“只要我们承认自然界是合理的，我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就终止了。……只有当自然界被认为是不受自觉理性（自我意识——作者注）的约束而完全自由的，而自然界本身被看成是理性时，自然界才成为理性的完全的所有物。”^③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这种批评，也表明了马克思不同意鲍威尔等人把自我意识绝对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① 《博士论文》，第12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43页。

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在物理学上的 差别表现了机械论和辩证法的对立

马克思通过深入细节的分析证明：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在物理学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表现了他们不同的哲学倾向，即机械论和辩证法的对立。为了论证这一点，他首先阐发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思想。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是直线式的下降，另一种是脱离直线而偏斜，第三种是众多原子的冲击。第一种运动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所共同的，第二种运动则是伊壁鸠鲁对德谟克里特所作的重大修正，由于这一修正使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本质上不同于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伊壁鸠鲁的原子乃是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型。因此，他的原子概念不仅是指空间中的一个点，只具有空间的规定性，象德谟克里特所理解的那样，而且包含着独立性和自由、个体性和自身完备性。马克思认为，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仅仅是纯粹的质料，缺乏自身的形式规定性，它的存在与运动是被动的、强迫的，没有达到自为的存在。马克思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质料仅仅看作是被动的物质，而把能动的原因归之于形式，同时又把形式解释为观念的东西。这种解释方式符合于他当时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德谟克里特没有赋予原子以概念的、形式的规定性，因而原子本身缺乏能动的原则，他把原子运动变成了一种强迫的运动，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他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话证明：原子不能只有被动的、强迫的运动，而且还必须有自己的、自然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断言那原始物体永远在虚空中和在无限中运动的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应该说是哪一种运动和哪一

种运动适合于这些物体的本性。因为如果每一个元素都是被强迫而为另一个元素所推动,那末必然的,每一个元素除了有一个强迫的运动之外,还有一种自然的运动;而这个最初的运动必定不是强迫的,而是自然的运动。不然,就会发生永无止境的递进。”^① 只有伊壁鸠鲁才在原子概念中把质料和形式、强迫的运动和自然的运动结合起来。他用来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赋予原子以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

一个仅仅依直线下降的原子,不过是在空间中运动着的一个点,不能表现它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为了表现原子的个体性和独立性,表现它的自满自足的完备性,它们就不能只具有空间的相互外在性,而必须包含内在的差别性即否定性于其自身中。如果直线运动表现了原子的空间规定性、外在制约性和物质性,那末为了表现原子的个体性、独立性和观念性,则必须赋予原子运动以否定的原则,为直线式的下降运动设置对立面,这样就得到了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因此,直线运动和偏斜运动是伊壁鸠鲁的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是原子的独立和自由的灵魂,是它的自我规定和自己运动的能动原则。德谟克里特没有达到这种内在矛盾的认识,因而他的原子学说是机械论的,他用盲目的必然性来解释原子的运动。伊壁鸠鲁用否定原则打破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理论的片面性,同时也就打破了他的机械的必然性。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伊壁鸠鲁并不是认为原子同时兼作两种运动,或者一些原子作直线运动,另一些原子作偏斜运动,而是认为原子运动内在地包含着两种相反的规定。他用直线运动表述原子的物质性、被制约性,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表述原子的形式

^① 《博士论文》,第24页。

(概念)规定性和能动性。伊壁鸠鲁所以用两种直接相反的运动来表示原子的两种相反的规定,是因为他总是在感性意识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常把抽象的规定表述为感性的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对偏斜运动不应当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他说:“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偶然出现的规定性。反之,偏斜运动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了整个伊壁鸠鲁哲学……。”^①“正象原子从直线抽象出来,脱离了直线而倾斜,从而将其自身从它的相反存在、从直线中解放出来那样,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②这就是说,伊壁鸠鲁把承认内在差别性和否定性当作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

由于伊壁鸠鲁赋予原子以偏斜运动,便改变了原子世界的整个内部结构。首先是原子本身具有了斥力,它使原子“可以和外力作斗争并和它对抗。”由于原子具有斥力,一方面使它打破了盲目必然性的摆布,从和它的个别性和独立性相抵触的片面规定和外在制约性中抽象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众多原子的冲击和遇合成为可能。因为,“如果原子不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反击,也不会有原子的遇合,并且将永远也不会有世界创造出来。”^③原子的冲击是偏斜运动的必然结果。并非原子同时兼有三种运动:直线运动、偏斜运动和众多原子的冲击,而是原子在其生命过程中必然具有这三个辩证的环节。如果直线运动表现原子的直线性即肯定,那末偏斜运动则是它的否定,而经过否定的否定(诸多原子的冲击),原子便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就是说,它从本质世界过渡到了现象

① 《博士论文》,第2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3页。

世界,从而一个感性的世界就被创造出来了。可见,对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马克思是根据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结构加以理解和阐发的。

在偏斜运动一章中研究的主要是原子的质料和形式之间的矛盾,而在“原子的质”(第二章)中,则主要讨论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原子属于本质世界,而特质属于现象世界,说原子有特质这是和原子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相矛盾的,因为任何特质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易逝的、变化的。但是,承认原子有特质又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不然就不能解释:互相排斥的诸多原子若无质的差别何以能在空间中彼此分离开来。由于原子具有质,就获得了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于是原子的本质便外在化而变为原子的存在。作为本质的原子不应该具有特质,而作为存在的原子又必须具有特质。这个矛盾就成为伊壁鸠鲁在研究“原子的质”时所注意的中心。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一方面他作出某些规定,肯定原子具有质;另一方面又作出与此相反的规定,否定原子具有质。他和德谟克里特的区别就在于他是从矛盾的观点来把握原子的质。正如马克思指出:“他是这样规定一切特质的,即认特质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反之德谟克里特再也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其特质,也没有把那包含在原子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而他的整个兴趣乃在于根据那必然是由质构成的具体自然来说明质。”^①

德谟克里特认为原子有二种质:形状和体积。其中最基本的质是形状,因为原子形状的差别已经包含了体积的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除了有形状和体积的差别以外,还把重量当作原子的本质特性。

① 《博士论文》,第26页。

关于原子的体积伊壁鸠鲁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他肯定原子具有不同的体积，另一方面他又否定原子具有任何体积。因为原子的体积既不能大到可以看得见的程度，也不能小到最小限度，而只能是那表现矛盾的无限小。这样一来，由于原子的数目是无限多，因而它们在体积上的差异必然是无限小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原子具有体积上的差异。

关于形状，由于这一特质也和原子的概念相矛盾，因而它的对立面也必须建立起来，就是说，原子既具有形状的差异，也不具有形状的差异。如果每一个原子都有一个特殊的形状，那无限多的原子便会有无限多的形状，结果就会有无限大的原子了。所以原子虽有形状的差别，但区别原子形状的数目只能是确定的和有限的。这样一来，形状的规定性也被否定了。因为无限多的原子具有有限数的形状，以至使一些原子不再具有形状的差异。

伊壁鸠鲁把重量作为原子的第三种特质，因为在他看来，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原子不能不有自己的重心，因而必定是有重量的。但是重量的规定又是和原子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不同的重表示着原子对自身以外的某个重心所具有的差别性，而伊壁鸠鲁却不承认任何居于原子之外的重心（原子之外只有虚空），因而也不承认原子有不同的重，他认为原子本身就是实体性的重心。据此，他曾作出一个极有意义的推断，他认为：“尽管原子在质量和形式上是那样的不同，然而它们却以同样的速度在虚空的空间中运动。”并且断言：“只有原子的聚集，而不是原子的本身才有重量。”^①

由于伊壁鸠鲁把矛盾引进并运用于他的原子学说，使他建立

① 《博士论文》，第 30 页。

起完全不同于德谟克里特的辩证的原子论。马克思指出：“对于原子的特质的考察，正如对原子偏斜运动的考察一样都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即伊壁鸠鲁曾经客观化了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因而就提供给我们以原子论的科学，而在德谟克里特那里，原则本身却没有得到实现，反之却只坚持了物质的一面，并提出了一些经验上需要的假设。”^①

在“始基的原子和元素的原子”一章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伊壁鸠鲁原子概念中的内在矛盾。德谟克里特由于把原子仅仅理解为构成物体的元素和物质基质，因而不能解释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从原子到具体自然的过渡，不能解释由永恒不变的原子构成的现象世界何以会有永不停息的生灭变化的道理。这是因为他未能把握原子的内在矛盾性，未能赋予原子以能动的、创造的原则。仅仅作为元素和物质基质的原子只是构成物体的质料，仅仅具有空间的存在而已，它自身并不包含能动性和创造性。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克服了这种机械论的片面性，他不仅把原子了解为元素和物质基质，而且了解为万物创造的原理和宇宙形成的始基。这就是说，原子不仅是构成万物的纯粹质料，而且是宇宙的推动和创造力量的源泉。马克思认为：“把作为始基（应改作基础）和元素的原子同作为原理和基础（应改作始基）的原子区别开，这乃是伊壁鸠鲁的贡献。”^②

不过在伊壁鸠鲁那里，作为元素的原子和作为始基的原子并不是两类不同的原子，而是同一原子的不同的规定性。元素的原子是就原子之作为存在与质料而言，始基的原子是就原子之作为本质与形式而言。在本质世界里，原子是“绝对的形式”，而在现象

① 《博士论文》，第30页。

② 同上，第34页。

(存在)世界里,它便降为“绝对的质料”或“基质”了。由于伊壁鸠鲁作了这样的划分,那“在原子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便被设定在个别的原子本身内了”。^① 马克思说道:“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在哲学上的区别,即在于伊壁鸠鲁在它的如此高度尖锐中把握住了矛盾,并把这种矛盾加以客观化,因而作出这样的区别,即把作为现象的基础的原子认作元素的原子,而把存在于虚空中的原子认作始基的原子,而德谟克里特仅客观化其中的一个环节。”^②

我们已经知道,德谟克里特不重视原子的质和规定,他只承认原子有一种最基本的质即形状,而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同时具有三种质,即形状、体积和重量。由于原子有了质,它便和它的概念(本质)相矛盾,因为它已不复是抽象的个别性,而获得了感性的规定,进入到存在(现象)的领域。但是,也正因为原子有了质,作为始基的原子才能实现其概念,即作为具体自然的创造原则而过渡到现象世界。这是因为只有当原子有了质(形状与重量等等的差异),原子的排斥和从而引起的聚集才是成为可能的,而由于原子的排斥和聚集,才产生出具体的现象世界。没有质的差异的原子不仅不能成为具有多样性规定的具体自然界的“元素”,而且也不能进到原子之间的排斥和冲击。正是这种原子的冲击乃是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用以解释现象世界之发生的共同依据。

原子固然是自然的实体,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元素,但若仅仅就这一点来看,始终处于世界底层的原子不能被用来解释现象世界永恒不息的生灭变化,不能说明事物在分解为原子之后如何又有新的事物在形成。若是把原子当作纯粹的本质来思维,则它的存

① 《博士论文》,第34页。

② 同上,第35页。

在就只是虚空的空间的一个点，只是一种抽象的个别性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自然界的毁灭和死亡。“所以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原子的不死的实体。”^① 由于伊壁鸠鲁给原子规定了质，他就辩证地把作为始基的原子和元素的原子、把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统一起来了。

在讨论时间的一章中，马克思又回到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的差别。我们已经知道，德谟克里特认为现象是主观的，感性知觉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变化无常。而伊壁鸠鲁则承认现象的客观性，视感性知觉为真理的唯一准则。这原因究竟何在？马克思在时间问题上找到了这种对立的根源。

在原子世界里，由于原子本身的永恒性和独立性，因而不存在时间。在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是一致的。但是在现象世界，他们的观点就不同了。德谟克里特把时间看作纯主观的东西，只承认现象的空间规定（组合）是客观的。伊壁鸠鲁则不然，他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是显现着的自然界所固有的。

现象世界即具体自然界有两种形式：空间与时间。现象的空间形式表现为组合，而它的时间形式表现为变化。德谟克里特把组合看作自然界的唯一形式，因而不理解现象自身何以有变化，他把变化归之于主体的意识。而在伊壁鸠鲁看来，组合（空间规定）作为具体自然界的形式只是被动的，现象的主动的形式乃是时间。因为时间作为事物自身变化的反映，正所以表明现象之为现象，并且把现象从本质分离出来，因为抽象同一、永恒不变的东西决不是现象。从现象世界、具体自然界中抽去了时间就意味着取消了一切生灭变化，取消了现象世界本身。因此，时间乃是现象世界的本

① 《博士论文》，第35页。

质规定,绝对的和主动的形式。

如果说,在本质世界里基本的矛盾是质料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在现象世界里便表现为空间和时间之间的矛盾,即现象的被动形式和它的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德漠克里特未能把握这一矛盾,因而他一方面把现象的存在和本质的存在混为一谈,只看到现象乃是原子的组合,另一方面又把现象和本质完全分离开来,不是把现象看作“本质的自然,即原子的映象”,而是降为主观的假象。伊壁鸠鲁由于把握了时间与空间、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的矛盾,因而把时间看作现象的自身反映,把现象世界看作原子世界的映现,把在感性知觉中感知的自然界的變化看作客观的,“当作具体自然的真实标准”。时间的客观性证实着感性知觉的客观性。

既然时间是通过特质、偶性、变异和变换这些感性的质而表现其存在的,因此当感官感知物体的特质和偶性时也就是感知到时间,“因此人的感性(感知到的质)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具体自然界)之存在的反映。”所以在伊壁鸠鲁那里,偶性(特质)之在感性知觉里的反映,以及偶性自身的反映(时间)被认为是同一种东西。因为感性知觉不是别的,而是显现着的自然界自身的反映,是它的形体化了的时间。这样,本质世界(原子)、现象世界(具体自然)和感性知觉之间的统一就建立起来了。因此在认识论上,伊壁鸠鲁既不是把抽象的普遍性,也不是把理智的直观,而是把感性知觉当作真理的准则;也因此,他不是把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而是把感性的个别自我意识,当作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这是伊壁鸠鲁体系的最大特色,也是马克思所以特别重视伊壁鸠鲁哲学的基本原因。马克思说:“因此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同样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就是在具

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在原子世界中那样。”^① 我们知道，这个感性的、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自我意识已经接近于费尔巴哈的“人”了。这里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怎样不同于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并且不久便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星辰”一章突出地说明了伊壁鸠鲁哲学的反神学的革命性质，它也是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解释伊壁鸠鲁哲学的典型例证。

伊壁鸠鲁的星辰学是他关于天体和与天体相联系的过程的学说，自古以来，天体以及天体的运行过程就是人们迷信与崇拜的对象。人们对天的崇拜是和对神的迷信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认为神居住在天上，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体和天体的运行是由神意支配的，是神的意志与智慧的直接体现。这种对天的迷信连希腊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例外。伊壁鸠鲁作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他的星辰学说中力图破除对天的崇拜与迷信。在伊壁鸠鲁看来，天之所以引起人心的迷信与慌乱，在于人们认为天体及其运行的法则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于是他作出推论说：“因为天体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宁静，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它们并不是永恒的。”^②

为了反对对天体及其过程作出永恒性的解释，伊壁鸠鲁在星辰学中抛弃了他在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应用的原子论的研究方法。在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他是把原子世界当作具体自然界和感性世界的永恒基础，抽象个别的、不可分的原子是现象世界的唯一的、不变的本质。但在星辰学中却不能追求这种永恒的、统一的解

① 《博士论文》，第39页。

② 同上，第44页。

释,因为永恒性正是产生迷信与慌乱的根源。所以,在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和现象相符合。而在星辰方面却并不是这样。星辰的产生没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星辰有一个以上的和现象相符合的本质范畴。”^①这就是说,对星辰现象的解释不能作出统一的和绝对的结论。只有对那些常常出人意外的、使人感到惊异的天象作出各种各样可能的、非神话的解释,才不仅使自我意识得到安宁,消除引起恐惧的原因,而且还足以否定支配着天体本身的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律。十分明显,伊壁鸠鲁从彻底无神论的观点出发得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只有在不可见的自然的深处才具有那永恒的、不可破灭的东西——原子世界,而在可见的天体里却不能具有任何永恒性,把可见的东西永恒化是产生迷信与拜物教的根源。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永恒与不朽的是自然的本质,而不是它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因此,伊壁鸠鲁猛烈反驳那些对天体坚持一种解释方式而拒绝别种解释的人,反对那些在天体里承认某种唯一的、永恒的、神圣东西的人,说他们陷于占星术者的虚妄解释和投入神话的怀抱,不知道由于他们赋予天体以永恒性而使精神的宁静遭遇着危险。

但是难解的是,伊壁鸠鲁出于什么考虑要把在星辰学中应用的方法和其余的物理学的方方法相区别?反对斯多葛派和占星术的迷信,反对天体的永恒性,并不是作出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仍然应用原子论的方法,把天体说成原子的偶然的复合,把天体过程说成原子的偶然的运动,那末斯多葛派的迷信以及天体的永恒性也都可以驳倒。所以对于原子论者,为了否定天体的永恒性用不着什么新方法。那末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克思作

① 《博士论文》,第43页。

了如下解释：

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乃是他的伦理学说的自然的不朽的基础，是他的体系的出发点，他把原子的抽象个别性看作个别自我意识的原型和象征。他的伦理学说的原则与理想，就是具有独立性和自由的感性的个别自我意识，这是他的体系的最高峰和终结点。因此，在伊壁鸠鲁的体系里，独立自由、自满自足的个别自我意识被当作世界的中心，他不承认自我意识以外的任何现实具有永恒性和绝对合理性，因为那样会破坏和否定个别自我意识的绝对地位。可是，在天体中，伊壁鸠鲁却看到了他赋予原子即个别自我意识的一切必要的规定都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你看：原子的独立性和个体形式，它的重量的特质，它的永恒性和不变性，它的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以及它从自身中创造出时间作为自己显现的形式等等，这一切都在天体中得到了实现。“因此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在天体中一切由于原子发展而形成的形式和质料(物质)之间、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都解除了，在天体中一切必要的规定性都实现了。”^①伊壁鸠鲁看到了他的原理的最高实现，他的体系的最高峰和终结点，竟是存在于那和个别自我意识相对立的天体里，这就使他感到他的整个体系在这里破产了，他的哲学遇到了最大的矛盾，于是不得不在星辰学中改变他原来的原子论的方法，以便把独立的、不可破灭的天体“拉下到地上事物的变化消逝之中”，从而肯定自我意识的绝对的、世界中心的地位。

如前所述，整个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贯穿着本质和存在、形式和质料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表示着观念和物质、个别自我意识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正是在这类矛盾中，抽象的个别自我

^① 《博士论文》，第45页。

意识不断克服那抽象的纯粹物质而使自己的本性(独立性和自由)对象化,从而获得实现和肯定。但是在天体中,这类矛盾和斗争却被取消了,仿佛质料(物质)在自身中就具有形式(个体性和独立性),因而那最终获得实现和肯定的不是形式,即象征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和独立性,而是抽象的纯粹质料。在天体中,质料仿佛不再是抽象的个别性,而已经变成了现实的、具体的个别性了。这种在天体中获得了实现和存在的具体个别性,乃是个别自我意识的外化表现,是它的对立面、它的死敌。正如在黑格尔那里回到自己出生地的精神(自我意识)把自然界看成自己的死敌一样。这时,个别自我意识要做的事情便是“从它的茧(物质外壳)中解放出来,并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原理,而敌视那独立了的自然(天体)”。^①

十分明显,马克思对于伊壁鸠鲁在观念和物质的关系上的观点所作的这种解释,仍然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为依据的。在马克思看来,正如黑格尔把实现了的绝对精神当作他的体系的终结点一样,伊壁鸠鲁也把独立自为自我意识当作他的体系的最高峰。

^① 参看《博士论文》,第46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李 由 义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部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然而,如何评价黑格尔的法哲学?如何领会马克思对它的批判?学术界存在着意见分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开展讨论。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认识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更准确地评判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而且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如何把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同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密切结合起来,如何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创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本文仅就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马克思对它的批判进行初步分析,至于法哲学的其他内容,就不在这里论述了。

应当怎样评价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自从1821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问世以来,对这本书就有不同看法,而且由此涉及对黑格尔及其哲学的全面评价。大体说来,有否定的和肯定的两种意见。否定的意见认为这本书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的,因而认为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肯定的意见则认为这本书是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因而认为黑格尔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是德国新兴

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都有一定根据，但是都不全面，不能如实反映黑格尔及其哲学的本来面目。即使对《原理》这本书，也不能作如此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结论。

否定的意见由来已久，在《原理》出版后不久，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对此书大张挞伐，特别是对其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①这个命题非常不满，极端反感。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是“用哲学的方式对现存关系祝福”，是“典型的复辟精神的语言”、“政治保守主义的绝对公式”，有些人甚至说黑格尔哲学“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的“哲学毒菌”。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反，普鲁士政府却对此书的出版表示欢迎，它的文化教育卫生大臣阿尔腾斯坦在写给黑格尔的信中，赞赏这本著作，说它“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使人们不致染上对待现存事物的“有害的狂妄的心理”。他称黑格尔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后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还授予黑格尔一枚三级红鹰勋章，以表彰他对普鲁士国家所采取的恭顺态度。这些事实，更增添了自由派的愤怒。

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象黑格尔的这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政府的感激和自由派的愤怒。可是恩格斯却告诉我们，无论是普鲁士政府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近视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懂得辩证地看待这个哲学命题，不能发现这个哲学命题蕴涵着合理的甚至革命的内容。接着恩格斯就运用辩证逻辑，把黑格尔这个命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题的合理内容从它的神秘外壳下解放出来，最后指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①这就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极其审慎地对待黑格尔的哲学，其中当然也包括他的法哲学。

可惜长期以来，人们未能深刻领会恩格斯的提示，许多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作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哲学界，全面否定黑格尔的哲学，象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简单地、粗暴地判定黑格尔是德国容克地主复辟主义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②这样否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因为从整体上看，从实质上看，应该承认黑格尔的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他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出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革命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所进行的哲学革命一样，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只是由于两国具体情况不同，所以两国哲学革命的表现也不同。^③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曾指出：应当“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④这一科学论断也应当完全适用于黑格尔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坚持上述否定意见的人愈来愈少，特别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③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

在最近一、二十年中,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新的“黑格尔热”,有不少人从黑格尔著作中寻章摘句,曲为辩解,把黑格尔塑造成具有自由主义乃至民主主义倾向的进步哲学家。〔注1〕

对于这种意见,我也不敢苟同,因为他们对黑格尔及其哲学缺乏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事实上,黑格尔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既有反封建的倾向,也有反民主的倾向。他的哲学也充满了内在矛盾:既有进步的甚至革命的一面,也有保守的甚至反动的一面。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基本矛盾(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同他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分不开的。唯心主义体系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辩证法则反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同时还应看到,从总的倾向看,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保守的一面是占主导地位的。他晚年写作的《原理》尤其如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就曾明确指出:“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①

除此之外还应看到,当时欧洲和德国政治形势的变迁,对黑格尔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青年时代,启蒙运动风起云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是相当激进的,他曾经要求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甚至提出“我们必须超越国家”的口号,在原则上否定国家。到了老年时期,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早已过去,波旁王朝业已复辟,神圣同盟支配欧洲各国政治,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结成了联盟,把普鲁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的警察官僚制度看作是遏制革命的法宝。《原理》一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所以保守思想特别明显是不足为奇的。

实际上，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词中，即已申明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①他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而不是指工农群众；他所说的“联合”，也是以君主、贵族为主导，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他的《原理》一书可以说就是为了论证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联合专政这个根本政治主张的。而且在政体问题上，他也早已放弃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因此，普鲁士政府把黑格尔哲学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并不是偶然的。

为了正确评价黑格尔法哲学，必须探究马克思为什么要写作《批判》。从当时情况看，马克思写这个手稿，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提出来的理论问题，也是为了扫清革命发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是黑格尔法哲学所无法解释的，特别是通过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和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使马克思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同社会现实的矛盾。现实生活告诉他，国家总是为统治者、剥削者的利益服务的，它并不是凌驾社会之上的超越阶级的神物。马克思决心与黑格尔法哲学彻底决裂，因为它已成为寻求社会真理的巨大障碍。这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出版了，书中明确提出了把思辨哲学“翻转过来”的任务，这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了进

^① 《小逻辑》，第45页。

一步的推动作用。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问题经常萦回在马克思的脑际。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①这就是马克思于1843年夏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注2〕}

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因为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可是在政治上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封建专制国家。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惧怕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同封建势力相勾结，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与此同时，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的警察官僚统治，竭力把黑格尔哲学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在他的《原理》中，明确提出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认为“绝对观念”在普鲁士国家里得到了它的最完备最终极的表现，普鲁士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这些政治观点对德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为了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就必须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②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和保守主义观点，但是他仍然认为黑格尔的《原理》是一部包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着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的著作。这是在评价《原理》时值得很好地注意的。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 马克思对它的批判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和唯心辩证法大师，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绝对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绝对观念的运动、变化、发展中产生的，国家也不例外。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绝对观念从逻辑阶段发展到自然阶段，又从自然阶段发展到精神阶段。在精神阶段中，绝对观念又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发展阶段。法哲学就是所谓客观精神的哲学。在法哲学中，他又分为抽象的法、道德、伦理三大部分，国家就是客观精神的伦理阶段的最后完成。也就是说，绝对精神发展到了伦理阶段，经历家庭、市民社会这些环节，通过分化、中介而完成了统一，就产生了国家。因此，他对国家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①即是说，国家是伦理精神的表现或体现，在本质上它是精神性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核心。黑格尔的其他命题，诸如“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是自觉的伦理的实体”，国家是“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等等，都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是用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说教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

从“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这个根本观点出发，黑格尔竭力宣扬对国家的迷信，把国家说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是所谓“地上的绝对权力”，“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马克思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②。黑格尔确

① 《法哲学原理》，第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0页。

实如此。他认为：“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①同时，他又认为国家是一个伦理的有机体，公民与公民间，公民与政府间，有休戚相关的伦理关系，个人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完成自己的美德和实现自我意识。这样，黑格尔就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成是合乎理性的，是伦理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但是，黑格尔又反对用国家的意志压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强调地指出：国家的普遍利益如果不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相结合，“国家就等于空中楼阁”，人们的个人利益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国家就会站不住脚的”。^②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又突出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要求。

由于马克思的《批判》手稿尚未完成，而且有所散佚，我们难以完整地阐述马克思当时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但是从手稿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有关国家的产生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观点，得到了唯物主义的结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 and 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亦即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他认为，伦理理念的发展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阶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是“特殊性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国家是

① 《法哲学原理》，第254页。

② 同上，第266页。

它们的“真实基础”和“最高权力”；家庭和市民社会是达到国家的中介，是被扬弃了的有限性的领域，国家则是超出这两个领域的无限的现实的精神，是它们的目的。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倒果为因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是政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①“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②他批判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③“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④这是“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⑤

与此紧密联系，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 and 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认为国家规定和支配私有财产。在他看来，长子继承制就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马克思则认为在剥削阶级国家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的权力支配政治国家。所谓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实际上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本质的实现。因此，马克思说：“‘独立的私有财产’或‘真正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私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② 同上，第252页。

③④⑤ 同上，第250—251、252、253页。

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①长子继承制不仅不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证明，恰恰相反，凡是存在长子继承制的地方，“整个国家制度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②由此可见，所谓“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的说法，乃是用以维护私有财产制度、掩盖剥削阶级国家本质的虚构。正如马克思所揭露：“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③

在论述国家问题时，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了“异化”这个概念，但是内容是不同的。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概念是唯心的、神秘的。由于他把精神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于是一切真实的关系都被颠倒了。他认为法律、道德、国家等等都是从主观精神异化出来的，其表现是外在的、客观的，其实质是精神的、观念的。马克思对异化的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在《批判》中指出，在政治领域里也发生着类似在宗教领域里发生的异化，“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④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由于私有财产产生的矛盾而自我异化的结果；国家是从人民那里异化而来的，它又作为统治人民的异己力量而与人民对立。这也就是恩格斯后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⑤马克思并认为这种异化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380、381、3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会消失，所改变的只是异化的形式，至于异化的实质，即国家同社会、国家同人民的对立，一直要保持到私有财产制度完全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没有局限于就事论事，他还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对它进行更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国家观的根本错误，就是把事物的“真实的相互关系弄颠倒了。”^①因为他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一个环节，这完全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虚构。马克思指出，对国家的科学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②就是说，对国家的研究，应当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具体分析国家的产生、本质和发展的规律，而不应该象黑格尔那样，把逻辑强加于客观事物，从逻辑概念来构造现实。马克思又指出：“在这里（指《原理》），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③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性的东西是“事物本身的逻辑”，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黑格尔却认为第一性的东西是“逻辑本身的事物”，即理念、概念之类的东西。我们要求用逻辑（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国家的矛盾，来研究国家发展的规律；而黑格尔所要求的却是完成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把国家的现象作为说明逻辑的工具。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时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4、359、263页。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从根本上说来,马克思和黑格尔国家观的分歧就在这里。

黑格尔设计的政治制度 和马克思对它的批判

如同论述国家的本质一样,在论述国家政治制度时,黑格尔也是从理念出发,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马克思曾指出:“事实上,黑格尔只不过是把‘政治制度’这一概念消融在‘机体’这个一般的抽象理念中,……黑格尔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②我们应该拨开神秘主义迷雾,揭露它的阶级实质。

如上所述,黑格尔关于国体的根本主张是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联合专政,关于政体或政治制度的根本主张则是君主立宪制。黑格尔认为君主立宪制是符合国家理念的国家形式,是最高的、最完善的国家形式。由于当时德国是采取君主专制政体的贵族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黑格尔主张象英国那样,采取君主立宪制度,这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所指出:“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①

黑格尔从上述政治立场出发，把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在黑格尔看来，政治制度也只是逻辑理念的体现，逻辑理念既然包含有单一、特殊、普遍三个环节的统一，所以政治制度也必须相应地包含有君主权、行政权和立法权三个环节的统一。这就如马克思所批判指出的：“国家制度的理性是抽象的逻辑，而不是国家的概念。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制度。不是思想适应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适应于现成的思想。”^② 以下我们就来分别考察黑格尔关于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的观点。

关于王权，黑格尔说，它是“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③ 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制定法令都须“一并呈请君主裁决”^④，“它作为至上者扬弃了简单自我的一切特殊性，制止了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争论，而以‘我要这样’来做结束，使一切行动和现实都从此开始”。^⑤ 这真是有点“朕即国家”、“宸衷独断”的味道。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说成是理念的真正化身。”^⑥ 又指出：“君主权的理念，按照黑格尔对它的阐发，不外是一种任性的、意志决断的理念。”^⑦ 但是认真加以考察，黑格尔关于王权的吹捧，只不过是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0、267页。

③④⑤ 《法哲学原理》，第287、306、296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3—274页。

而不实之辞,他真正希求的,不是专制君主,而是立宪君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黑格尔虽然主张君主世袭制,但是“黑格尔却没有把它虚构为宗法的国王,而是虚构为现代的立宪的国王。”^①“王权被了解为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那末王权就不会超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②这就是说,既然是立宪君主,就不能无法无天,而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因此,君主的个人意志(“我要这样”)仅仅是一种“形式上决断”,“至于君主除了这个最后决断权之外所能有的其他东西,都是一些属于特殊性的东西而不应该有什么意义的。”^③黑格尔还强调指出,所谓君主的决断,“这不等于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毋宁说他是受谏议的具体内容的束缚的。当国家制度巩固的时候,他除了签署之外,更没有别的事可做。”^④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大臣是主宰一切的意志的合乎理性的客观方面,……而君主所分得的只是自己‘伟大’的特殊空想。”^⑤总而言之,黑格尔设计的王权,就是德国式的立宪君主。

关于行政权,黑格尔认为它应该“执行和实施国王的决定,一般说来就是贯彻和维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即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公益设施等等,这和做决定这件事本身是不同的。”^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看来,‘行政权’就等于‘国家仆役的总和’。”^⑦但是在实际上,黑格尔认为行政权是真正的国家权力中枢。他认为担任国家公职的官吏构成社会的特殊等级,他称之为“普遍等级”或“中间等级”,他极力推崇这个等级是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全体民众的高度智慧和法律意识就集中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3、268页。

③④ 《法哲学原理》,第302、30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9页。

⑥ 《法哲学原理》,第30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1页。

在这一等级中。”^① 黑格尔反对国家官员的世袭制度，他认为行政事务和个人之间并无天然联系，“个人之所以有权处理国家事务，并不是由于他们天生的关系，而是由于他们的客观特质。能力、才干、品质都属于一个人的特殊性。他必须受过教育和特殊职能的训练。”^② 他认为只有按照这种客观要求选拔官吏，才能“保证国家能满足它对普遍等级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一种使每个市民都有可能献身于这个等级的唯一的条件。”^③ 这显然是在为德国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利，其进步意义应得到肯定。

黑格尔关于立法权的论述也是充满了矛盾的。立法权本应是国家最高权力，是确立国家制度的权力。可是黑格尔却竭力贬低立法权的地位，竭力贬低议会的作用。他认为：“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因此它本身是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国家制度本身是立法权赖以建立的、公认的、坚固的基础，所以它不应当由立法权产生。”^④ 这样，立法权就被剥夺了制定宪法的基本任务，被剥夺了建立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权利。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那里，“各等级的代表（按指在议会中的代表）只是一种纯粹的奢侈品。所以各等级的存在，究其实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⑤

黑格尔之所以要贬低立法权，主要是因为他不主张进行彻底的革命，而希望走一条缓和的改良的道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凡是立法权真正成为统治基础的地方，它就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⑥ 他甚至说：“立法权在给叛乱奠定基础。”^⑦ 作为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黑格尔认为这种结局是不堪

①② 《法哲学原理》，第314、293页。

③④ 《法哲学原理》，第311、3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3页。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358页。

设想的，是应当避免的。可是黑格尔又认为，由于立法权有“中介作用”，所以它又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中介作用”一方面可以使“王权就不致于成为孤立的极端，因而不致成为独断独行的赤裸裸的暴政”；另一方面又可使“个人也不致结合起来成为群众和群氓，从而提出无机的见解和希求并成为一种反对有机国家的赤裸裸的群众力量。”^①

那末，黑格尔设计的立法权或议会究竟是什么模样呢？它包括三个等级：（1）贵族地主等级，他称之为实体性的等级；（2）普遍等级，这就是行政官吏的代表；（3）产业等级，即工商业资产者的代表。在这三个等级中，他特别重视贵族地主等级，认为他们参加议会行使立法权“只是由于他们的出生，并非取决于选举的偶然性。”^②所以他们是具有“实体性的巩固的地位”，是“王位和社会的支柱。”^③他又认为行政官吏等级“对处理国家事务也比较精明干练”，“就是不要各等级（按指不要议会），他们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很好。”^④黑格尔虽然竭力争取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的“商讨和决定”^⑤，可是他却认为工商业等级是“市民社会的变动不定的成分”^⑥，“它们都是由单一性、私人观点和特殊利益产生的，所以它们总想利用自己的活动来达到牺牲普遍利益以维护特殊利益的目的。”^⑦因此，在黑格尔设计的议会里，不仅没有工农劳动人民的代表，就连资产阶级也没有充分的发言权，这鲜明地反映了当

① 《法哲学原理》，第321页。

② 同上，第32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19页。

⑤ 同上，第327页。

⑥ 同上，第328页。

⑦ 同上，第320页。

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尽管如此，立法权终究与人民群众有一定的联系，因此，黑格尔在贬低立法权的同时，对人民群众也竭尽贬损之能事。他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①他甚至把人民群众说成是“乌合之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②这充分反映了被法国大革命吓破了胆的德国资产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老爷式的态度。

我们研究黑格尔设计的政治制度以及马克思对它的分析和批判，可以看到：尽管黑格尔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集中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比当时德国的君主专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君主立宪制比英国已大为逊色，它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色彩很少，而封建残余的非民主气味很浓。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他在《原理》一书中所表现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其主导方面是保守的。所以，不具体分析它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各个方面，而把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法哲学（还有宗教哲学）笼统称之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令人信服。

* * *

总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对他的国家观点进行批判之后就搁笔了，对于他的法律、道德观点和伦理观点的其余部分都来不及进行分析批判，但是马克思的这份手稿，特别是稍后写作的《导言》，内容是非常丰富、深刻的，而且充满了革命的、批判的精神，除了以上简略的引证外，我想再着重地指出一点，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就

①② 《法哲学原理》，第319、323页。

是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改良主义观点，提出和阐发了变革国家制度的人民革命问题。黑格尔虽然知道现代国家是充满矛盾的，而且知道这些矛盾日趋尖锐复杂、不可调和，可是他却认为只要“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通过普遍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这样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①，“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②根本否认变革国家制度需要通过质变、飞跃和革命。这是他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跟他的辩证法不彻底有关系。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彻底发挥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认为：立法权不能从根本上变革国家制度，“普遍行政事务”也不可能变革国家制度，“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③而要实现变革国家制度的革命，就必须依靠武器的批判，彻底摧毁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因此马克思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④马克思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人民革命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根本变革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国家制度。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按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⑤这表明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② 《法哲学原理》，第315、3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注1〕目前西欧有一些哲学家提出一个假设，认为1821年出版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是为了应付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而涂上了保护色的稿本，不能反映黑格尔的真实政治观点，他们希望能通过对黑格尔此书版本的考证，来解决黑格尔是一个反动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还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①

〔注2〕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夏。因为是在德国克罗茨纳赫写的，所以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这是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它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只批判了其中的第二六一节至第三一三节，即该书论述国家问题的一章的大部分。马克思之所以未完成对《法哲学原理》全书的批判，他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作了说明。

① 见西德《明镜》1979年第49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 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叶汝贤

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客观需要和理论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这部著作写于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之间。恩格斯在谈到当时他和马克思所面临的任务时写道：“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①当时，西欧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但是，当时支配、影响着工人运动的，还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的学说只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派别中的一个。然而，马克思主义一出现，就显示了它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思潮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当时的工人群众还没有认识，资产阶级却闻出了不同的味道。因此，对这一新世界观的创始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围攻于前，普鲁士、德国的反动政府驱逐于后。这种斗争形势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切感到，有必要科学地阐明他们的观点，以回击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挑战，同时用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把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从工人运动中驱逐出去。《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的产物。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以前的探索，也为科学地阐明他们的观点作好了准备。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曾经信仰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往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从理论上来看，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的阶梯。但是，走完这些阶梯是不容易的。当初和他们一同起步的声名显赫的理论家还不乏其人，然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到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不能不说这同他们的生活道路、科学研究以及他们的个人品德密切相关。他们都出生在受法国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莱茵省。法国革命、本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莱茵省人民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使少年时代就处在这一斗争漩涡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受影响。他们从小就具有与众不同的高贵品质和斗争性格。同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夸夸其谈、狂妄自大、藐视群众的思想作风根本不同，他们同情备受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一开始就把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也和费尔巴哈那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根本不同，他们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一种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这使他们从事理

论研究，总是强调要同实际相结合；他们在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锻炼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们从不迷信任何东西。这一切使他们一踏上政治舞台，就能够同当时德国人民的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从这些实际斗争中吸取营养，逐步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影
响，最后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也可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为什么始终环绕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着重解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不是自然观的问题。这一发现的重要步骤，是从马克思 1842 年参加《莱茵报》的斗争开始的。旗帜鲜明地为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辩护的斗争，导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促使他从思辨哲学转向实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起初采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从这一批判中，马克思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即物质利益领域去寻找。^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物质利益领域决定政治领域，这是马克思初次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马克思所获得的一个崭新的决定性的起点。

1843 年秋天，马克思到了巴黎，实际地接触到了当时最发达的工人运动，这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一次决定性的飞跃。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认识了无产阶级。他认为哲学应该以这个阶级为自己的“物质武器”，应该成为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对这一哲学的特征作了初步的描述，初步唯物地论述了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09 页。

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并试图从社会的物质关系出发去阐明人的本质：“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① 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标志着他们已经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他们从不同的道路，达到了同样的结果。

马克思彻底转向唯物主义以后，原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和国家哲学。但当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时，发现要解决“历史之谜”，光进行哲学的批判是不够的，而必须回过头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因此，《德法年鉴》停刊后不久，他便着力去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1844年4月至8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就反映了这一研究的成果。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性分析。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发现了一个根本规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 这一表述虽然还不够精确，但这是第一次说明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发现。紧跟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又对这一发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强调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造的物质生产”中，他们已接近了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生产关系概念。同时，他们从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深刻地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但是，这两部著作都没有批判费尔巴哈，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的影响,有的地方还对后者作了过高的评价。例如 1844 年 8 月 11 日,也正是马克思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时候,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①可见,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1845 年初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提纲第一次鲜明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局限性,这就标志了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线。这一提纲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同时从这种实践观出发,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上述两部著作和这个提纲,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门槛,从而结束了他们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时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够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50 页。

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1844年夏季至1845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现了列宁在这里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根本观点,就是说已经发现了唯物史观。这一发现当时还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的论证,但已为这种论证打下了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就是这一伟大发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提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
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②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鲜明地提出了哲学和现实、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

《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围绕着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和正面论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的。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他们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①由于把“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区分出来，也就为唯物主义地认识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察方法，一种观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另一种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只有后一种观察方法才符合实际生活。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

承不承认物质生活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③在这方面，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施蒂纳等人发展到了极端。他们把“自我意识”当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他们反对一切现实的革命斗争，把改造世界归结为批判家的思维活动、归结为反对“词句”的斗争、归结为改变意识。因此，他们把“批判家”、“思想家”、“智者”当成是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因此，“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④

马克思、恩格斯也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费尔巴哈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44页。

④ 同上，第22页。

认人是“感性对象”，因而比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对于后者人完全是一种受力学规律制约的生物。例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就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他写的一本书就叫《人是机器》。但是，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去看待人，他把人仅仅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就是说，他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一样，离开社会实践、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索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 费尔巴哈仅仅从感性的“人”出发，并且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因此，在他那里，“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② 他就把这种“爱和友情”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颠倒社会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并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从正面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从意识的起源来阐明意识对存在的依赖性。他们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③ 意识不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主体。意识总是人的意识，它总是受人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首先必须有人存在，才会有人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了要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34页。

物质的“纠缠”，就是说它对现实的反映，一开始就具有语言的形式。它最初是直接与人物质活动，与人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只有在物质生产中，由于和他人交往的需要，才产生语言，因此也就同时产生人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进而考察了意识怎样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人类社会出现的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交往也是很狭隘的。因此，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因此，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只能服从。这种关系反映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就形成一种自然宗教的意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人类的意识就向前发展了一步。在这之前，意识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从现在开始意识摆脱了对物质条件的直接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意识的多种多样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

那么，这是否可以认为，从这时起，意识就不再为存在所决定、不再是存在的反映了呢？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同上，第35—36页。

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

不管是古代原始人的意识，还是后来采取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不管它多么抽象，都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否定它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存在的制约。

上面引的一段话，还包含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错误的思想、意识，虽然是被歪曲了的，但它也是存在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②

错误的思想、意识也不是主观自生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找到其根源。这样，就科学地阐明了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而彻底地贯彻这一原则，就能够科学地阐明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阐明意识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各个阶级统一的共同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③，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对立，只能用社会存在中的分裂和对立来说明。在阶级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52、53页。

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似乎是全社会共同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实际上，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特殊利益的需要而制造的假象。历史唯心主义者就利用这一假象来证明历史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他们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使这些思想独立化，把它们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马克思、恩格斯说：“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 shopkeeper（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①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② 唯心史观把意识当作判别是非的标准和决定历史的根据，正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的反映。

那么，怎样解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因为这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就能够支配精神生产的资料。而这种思想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就进一步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根本不是什么思想、意识在历史上的统治。

从生活决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根本不同的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② 同上，第44页。

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①因此，“……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这就是用唯物史观来观察问题所必然得出的革命结论。

论证社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 决定作用，第一次阐明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活条件”的阐述，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然而，他们并不是笼统地揭示这些内容，不是不顾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特别重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强调这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现和阐明这一根本动力，正是这部巨著最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制约历史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首先，任何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种存在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制约着人类个体的发展。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8页。

③ 同上，第23—24页。

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他们又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①对人口的增殖、家庭的发展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本书中主要是提出问题，还没有着重进行研究，但他们显然认为这同样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科学的历史观对此不应加以忽视。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物质生活条件”诸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和 再 生产。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固然离不开自然基础，但这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如果仅仅从这种自然基础出发，那我们还是没有把人类社会同动物界区别开来，还没有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以根据许多东西把人类同动物区别开来，但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构成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人类正是因为开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脱离动物界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创造了人类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分析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怎样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①

我们都知道，过了三十七年以后，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就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段话，并且把这当作马克思一生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没有生产，就不会有人类的其余一切活动，就谈不上去“创造历史”，这个基本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基本事实所包含的科学真理，它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就不那么简单。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伟大发现，才出现真正的社会科学，结束了唯心史观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正是这一简单的事实构成了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不仅深刻地阐明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深刻阐明物质生产如何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物质生产过程时，指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②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32页。

② 同上，第24页。

术语来表示。虽然术语还不够确切，但他们已揭示了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揭示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如果说《神圣家族》已经接近这一基本概念，那末《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达到这一概念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物质生产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但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 每一代都必须利用以前各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这种必然性使生产力构成了历史联系的实质内容和客观基础。历史的每一阶段遇到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是无法自由地选择的。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总和也就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性质。

差不多在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一封信中指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② 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思想。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证明，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它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但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条件却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于是,“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①这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就“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②构成为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依次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特征,论证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这种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依次更替,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上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而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就说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已初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

在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们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④本书中谈到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含有生产关系总和的意思。他们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⑤,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就是由这种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③ 同上,第83页。

④⑤ 同上,第41页。

生产关系总和决定的。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性质和作用、分析了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从而初步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新世界观的鲜明特点。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叙述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时,还着重阐明,他们所发现的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指出这一发现,“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它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②因此,对人类的历史必须重新进行具体的研究,必须从分析每个时代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求得社会历史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论证,就是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实际问题的典范。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问题的这种提法,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已不只是一种道德要求,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③ 同上,第40页。

而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准备就绪的。马克思、恩格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它同过去的一切生产方式一样，也是暂时的。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逐渐发展起来，最后促使封建关系的瓦解。这种关系就“……变为由大工业和普通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即变成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①“纯粹私有制”，也就是最发展的私有制形式，或者说私有制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在它取代封建关系的初期，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它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象闪电般地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②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桎梏一样。”^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根本得不到利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在这里又出现了同封建社会末期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同上，第68页。

物质条件。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条件，而且创造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拿农奴同无产阶级进行对比。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其所遭受到的苦难不在无产阶级之下，但是它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逃亡农奴仅仅是力求自由地发展和巩固他们现有的生存条件，因而归根结底只是力求达到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① 逃亡农奴只要求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只要求达到自由劳动的权利，实质是自由地供资本家进行剥削的劳动权利。而无产阶级是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要求“消灭劳动”，即消灭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受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雇佣劳动。这使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区别开来。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没有触动私有制，只是改变私有制的形式，用另一种剥削方式来取代原有的剥削方式。而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非消灭“纯粹的私有制”即最高形式的私有制不可，所以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② 因此，共产主义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就是说，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兴趣去详细地构思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但他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中，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生产资料公有制，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页。

② 同上，第78页。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剥削和阶级的消灭，等等。由于这一切，就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再是分工的奴隶，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在这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离开集体的“纯粹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时，排除任何空想的性质。他们严格地根据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来作出这种预见。他们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③他们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当作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基本的条件。“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④。在生产力不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② 同上，第84页。

③ 同上，第79页。

④ 同上，第507页。

就必然会分裂为阶级，自由就必然是片面的、仅仅是阶级的自由：对统治阶级是自由的东西，对被统治阶级就是新的桎梏。因此，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这种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可见，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

蔡 英 田

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的发展史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构成了一个转变的阶段。在《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工作,并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去观察人及其历史发展,从而给异化问题以完全科学的解释。这正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时特别重视《形态》一书的原因。

异化涵义的变化

“异化”概念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那里有不同的涵义;就是在马克思那里,早期和后期也有明显的变化。《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早期的代表作。在这里,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这主要的表现在他继续采用费尔巴哈关于“族类本质”的概念。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感性存在,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族类;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有“理性”、“爱”和“意志力”。这是在人身上的“三位一体”,“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目的。”^①在费尔巴哈看来,异化就是人和

①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543、545页。

他的族类本质的分离，宗教正是这种异化的典型表现。马克思在《手稿》中也采用了“族类本质”的概念，虽然他抛弃了费尔巴哈把意识作为人的族类特征的观点，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族类生活，在这种活动中表现着族类的全部特征，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别，但是仍然认为人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的和不变的本质，异化就是现存的生活条件不符合人的本性，异化的消除则是人类本质的实现，这和费尔巴哈有相似之处。从这种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必然要把异化及其异化的消除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这样一来历史运动就变成了人道主义运动。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正象马克思后来所揭示的那样，是本末倒置的，是公然舍弃实际条件的结果。

《形态》一书写于一八四五年，虽然只比《手稿》晚一年，但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发展中构成了一个质的不同阶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以后研究异化问题的代表作。《形态》和《手稿》相比，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抛弃了诸如人的“本质”或“本性”这样一些含义模糊的、因而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马克思认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这个“个人”不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与世隔绝的，而是现实的、与其他人进行交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能够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特有力量——体力和智力，并以这种特有的人类力量掌握着在他自身之外的世界。人在生产活动和与此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不仅改造着外部世界，而且塑造着自己的面貌。所以，我们要研究人本身是怎样的，就必须研究人们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方式，这个生产方式也即是他们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方式。而在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采取怎样的生产方式、从而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这不取决于他们本人的意愿，而是由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要研究人本身是怎样的，归根结底，要研究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物质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人具有时代的特征，根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本质”或“本性”。

由于抛弃了“族类本质”这一概念，就使“异化”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指人和他的族类本质的分离，而是指人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和人本身相对立。这种对异化的理解不是从人有一个抽象的本质出发的，而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即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他们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产品、货币等等，他们的社会活动表现为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等等，他们的精神活动表现为哲学、宗教、道德等等。生产力、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本来是各个个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们一旦以对象化的形式存在，便构成了人以外的客体世界，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和他的活动产物之间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关系：人们自己创造的客体世界却成为人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力量，支配着人们，奴役着人们，而人们在它面前反而成了无能为力的奴隶。马克思把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就叫作“异化”。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指出：

第一，异化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异化现象表面看来是人和物的关系，但是这个“物”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是人的活动的凝结，所以从实质上看则是人自己对于自己的关系，是人对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异化概念的特殊涵义，是别的概念不能代替它的缘故。异化概念只适用于人，而不适用于物。物作

为客观的存在,是按照它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的,根本没有什么自觉的目的。一物产生另一物以及物物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表示,而不能用异化来表示。在这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不同。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不仅具有神秘的、唯心主义的性质,而且他又赋予异化概念以广泛的涵义,把物质和精神的转化、本质向现象的转化、一物向另一物的转化,统统称为“异化”。他把“异化”和“转化”混为一谈了。“异化”是指特定的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有其特定的涵义,不能到处滥用。

第二,要把“异化”和“客观化”或“对象化”区别开来。“客观化”是指人的活动及其目的、愿望等等,转化为客观的事物,而这些客观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按照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发展的。客观化是人类活动的固有属性,是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超历史”的现象。“异化”则不然。“异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社会现象。异化不是指人类活动的客观产物及其产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和这些事物及其规律的关系。诚然,客观事物是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的,但是人对它的关系怎样?是人利用它还是它奴役人?是人驾驭它还是它支配人?是造福于人还是为害于人?这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制度。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发展处于盲目的自发状态,人不能驾驭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力量。这就发生了“异化”现象。虽然“客观化”是“异化”的前提,没有人类活动的“客观化”当然就不可能有“异化”,但是“客观化”并不就是“异化”,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客观化”不可能转化为“异化”。把“异化”和“客观化”混为一谈,那就必然把异化看作是与人类共存亡的永恒现象,从而抹煞反对私有制度、争取人类自由解放斗争的意义。

《形态》一书由于抛弃了“族类本质”的概念，把人和他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也使异化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手稿》列举四种异化形式：（一）劳动产品的异化；（二）劳动本身的异化，即人的自我异化，也就是人和自己本质的异化；（三）人和他的族类的异化；（四）人和人的异化。其中人和他的族类异化，人和人的异化都与人的自我异化相联系，都是从劳动本身的异化派生出来的，是建立在人有其抽象本质的基础上的。现在，由于人的“本质”或“族类本质”的概念被抛弃，这三种异化形式自然而然地不能成立了，其结果只剩下第一种异化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异化。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现在也有了新的理解。劳动产品是人类力量的表现，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凝结，而不能作为人类本质的表现来看待了。这样一来劳动产品的异化就不再指人的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分离，而是指人和他的人类力量之间的分离。

第三，《手稿》的中心是劳动的异化，重点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形态》虽然也是从劳动的异化开始的，但却扩展到人类的全部活动，其中既包括生产活动的异化，也包括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异化；重心已不再是劳动者和劳动的关系，而是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人的关系。

第四，《手稿》中讲的“个人异化”或“自我异化”，在《形态》中被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提法代替了。马克思认为，环境创造人，同样人也创造环境；人创造的环境和人相异化，异化了的环境又反过来压抑和束缚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这样，《形态》一书所讲的异化就归结为如下三个问题：

（1）社会的异化，即人的社会活动，首先的和主要的是生产活动，怎样和人本身相异化，怎样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社会力量；

(2)社会的异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个人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中才能获得全面的和自由的发展;

(3)如何消除异化的问题。

社会的异化

社会的异化是指社会与人相对立。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人的抽象,而是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也就是劳动者。社会是各个个人活动的产物,是由“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因素构成的。研究社会的异化,具体地说就是研究这三个因素在什么条件下和人相脱离,怎样变成了压迫人、统治人的社会力量。

生产力是各个个人生产活动的产物,包括他们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体力和智力只存在于人体之内,只有按一定的方式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会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生产力虽然是个人力量的总和,但却是以物的形式,以机器、工厂、铁路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物化”。“物化”是生产劳动的客观属性,它本身还不是异化,但已为异化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条件下,就会变成现实,成为异化。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物化使劳动本身分裂为两部分,即积累起来的劳动(死劳动)和现实的劳动(活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表现为物,被投入到再生产中去的那一部分就叫作生产资料,在私有制条件下,它被各个私有者所瓜分,变成了剥削劳动力的资本。这就造成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和资本的分离、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分离。可是生产要能够进行,二者又必须结合起来,在二者归不同的人所占有的前提下,其结合就不能不具有强迫的、奴役的性质,其结果是生产者受生产资料的支配、劳动受资本的支配、活

劳动受死劳动的支配。生产资料、资本都是死劳动的转化形式，都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结晶，因此，归根结底，劳动者受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支配。在这里，生产力已不再表现为他们个人的力量，也不再表现为一般的物质力量，而表现为财富的力量，私有制的力量，资本的力量。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了最典型最尖锐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劳动的产品成了商品，而且连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资本主义在把一切劳动产品都变成商品的时候，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也都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换的关系。作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丧失了任何人的痕迹，变成了纯粹商品的力量、货币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不再崇拜自己，甚至也不再崇拜神，而是崇拜商品，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出现。工人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已经不再为他们本身造福，相反地，却成了他们贫困的原因，成了奴役、剥削、压迫他们的物质手段。生产力的异化竟然达到了这样尖锐的程度：他们创造的生产力越高、财富越多，他们就越贫困，以至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已丧失。因此生产者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都必须消除异化，都“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①。由此马克思便得出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革命结论。

其次是社会状况的异化。“社会状况”主要是指社会的政治状况，在这里具体地是指国家。国家也是各个个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的产物，是他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私有制阶段的产物。私有制是国家的基础。在初期，国家同私有制、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物质交往的联系还是很明显的，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随着经济领域的扩大，随着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的增长，国家也就愈来愈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纯粹政治压迫机关的性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①。随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它和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个人也分裂了，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

国家一开始便是作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代表机关出现的，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它不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只能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这两个原因是：第一，分工已使各个个人有了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对个人来说已是虚幻的东西；第二，阶级的出现，各对立的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

自从分工出现以后，便产生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因为分工使个人有了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有了专门的职业，他的利益就固定在他的职业上。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反对别人的利益。中世纪职业行会的出现，就是分工造成的个人利益相互冲突以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结果。正因为个人的特殊利益始终在反对普遍利益，所以国家就不能不以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对个人利益进行干涉和约束，以至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在个人之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①

国家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异己的力量，在阶级社会里，个人又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的，因此国家对于不同的阶级以及不同阶级的个人又有不同的关系。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是一个专政机关；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国家则是“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共同利益的形式”，是“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② 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统治阶级中各个成员的共同利益便获得了社会普遍利益的外观。这时，被统治阶级的个人反对虚幻的普遍利益，实质上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斗争的矛头也不能不指向统治阶级的国家。

再次是意识的异化。意识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③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所产生的意识、观念，无非是如下几种：或者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联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意识、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④ 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对物质活动和物质关系的反映。但是，由于人们的现实活动和交往关系都已经和人分离了，和人异化了，那末作为这种关系的反映的意识也不能不采取头足倒置的形式：本来它是人的头脑的产物，可是却变成了独立的实体；本来它是现实的物质交往关系的反映，可是却变成了这种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同上，第30页。

④ 同上，第30页编者注①。

系的原因；本来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可是却变成了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意识离开了人，获得了独立性，人们已不再能够支配它，相反地，它却支配人。意识的这种异化，从人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最明显不过的证明。

促使意识异化的第一个原因，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意味着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其次是因为社会存在变成了异己的力量，它独立于人之外，强大无比，于是人们便把统治他们的这些社会力量想象为不依赖于他们个人的某种精神实体的力量，于是便有“上帝”、“宇宙精神”、“唯一者”、“批判的批判”等等的出现。最后是因为社会分裂为各个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在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东西，这就造成了抽象思想统治世界的假象。

生产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各个个人在生产劳动中发挥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征服着自然，生产出各种产品，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力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种关系也就是各个个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它构成了所谓“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又竖立着国家上层建筑以及哲学、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现在，生产劳动已被异化，生产力和生产者相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意识形态又与生产、交换、国家相分离，而这一切最后都和生产者个人相分离，成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着他们、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社会力量。整个社会都和人异化了。

社会异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

在讨论社会异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时，必须指出：“这里所说

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①这样现实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们，创造了周围的环境，在这个创造活动中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自己，规定了他们自己。人除了生产劳动这个和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以外，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或“本性”；而生产劳动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力量的表现。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人在实践活动中，既改造着环境，又改造着自己。所以，改变了的人不应视为人和他的固有本质的背离，而应看作是改变了的环境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放弃了“自我异化”的提法，径直地考察社会异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异化使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丧失了自主的性质，使人不可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

人的实践活动基本的是生产劳动。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③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是潜藏在人身内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

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人在劳动中不仅改造了自然物质，创造了社会财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发展各方面的才能。劳动既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又是目的本身，是人对他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活动的一种享受。然而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也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已由目的本身变成了单纯的手段，已由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负担，已由生活的第一需要变成了谋生手段，已由自主活动变成了被迫活动。无产者“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①

由于劳动产品已不归劳动者支配，相反地却作为资本的力量支配他们，他们也便丧失了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者连生存都难以保证，更谈不到去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了。当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需要拿出一定的投资，培养工人的生产技能，发展科学技术，使之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这决不是劳动者个人的自由的发展，恰恰相反，是劳动者被迫改变自身以适应资本的需要，这正是物奴役人的表现。

由于分工，人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被破坏了，使人变得片面和畸形了。这首先是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一部分人身上专门发展了体力，在另一部分人身上专门发展了智力，使一部分人成为“生产动物”，使另一部分人成为“精神动物”。其次是由于各个劳动部门之间的分工，某一劳动部门内部的分工，在大机器生产的条件下，越来越细，使得劳动者不能全面了解生产过程，只能了解极小的一部分，他的知识和才能也只能限于这一部分。要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必须消灭分工，共产主义革命将逐渐达到这一目的。

马克思所说的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排斥集体，视一切普遍的东西都为“异物”，要求不受社会 and 集体限制的绝对自由，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与他们相反，马克思则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个人自由不是要废除集体，而是要创造这样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是各个个人的自愿联合。在以往的历史上，这样的集体是不存在的。国家表面上是个人的联合，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国家是冒充的集体”，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个人来说，不仅是完全虚幻的东西，而且是新的枷锁。阶级也不是这样的集体，因为在阶级中，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参加的，是由阶级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集体，只有在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消灭了分工，各个个人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时候，才能出现。

社会的异化使劳动者个人丧失了一切自主活动，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使人片面、畸形，使人动物化，各种腐化、堕落、诉讼、战争等等随之发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异化就是退化，人类一代不如一代，或者把人类的原始状态理想化，认为没有异化以前的人类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评价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事件的进步或反动，依据的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对待异化也是这样。异化，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十分发展的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况下,是必然的现象,对历史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马克思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异化的意义,对整个异化也是适用的。在异化的情况下,在个人发展方面出现的各种弊病,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异化的消极结果,但总的来说,人类还是不断进步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受害者首先是无产阶级。由于异化,无产者丧失了自己的劳动产品,丧失了自主活动,甚至丧失了生存的条件,陷入饥饿、贫困、失业、死亡的深渊。但是,它在另一个方向上却造成了无产者之间的团结、友爱、大公无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品质,使无产阶级能够团结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一切事物都要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无产阶级正因为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才能全部占有生产资料;正因为失去了一切自主活动,才能获得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正因为失去了任何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因为丧失了一切,才能获得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发展,已为无产阶级占有全部社会生产力,消除异化,建立自由联合的集体,从而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共产主义革命就会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共产主义革命和异化的消除

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分工和私有制,而分工和私有制则是同义语:一个是就活动本身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结果而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页。

分工使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因素彼此发生矛盾，并最后和生产者个人相分离，“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① 分工使人的统一，人和他的活动的统一，人的各种活动之间的统一，统统被破坏了，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控制 and 支配他们的活动及其产物了，于是社会陷入了自发的状态。那些占有他人劳动的阶级，取得了整个社会代表的资格，组织了国家，制定了理论，反过来压迫劳动阶级。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成了压迫他们的力量，历史的主人变成了历史的奴隶。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要消除异化，必须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而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必须经过共产主义革命。

马克思指出：单独个人的活动聚合为一种统治人们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② 共产主义革命是消除异化的道路。马克思认为，要使这个革命能够发生，因而使异化能够消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使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这两个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具备了。虽然异化在资本主义以前早已出现，虽然异化一开始就把人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异化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才把生产者和他的劳动产品完全分开，从而在一极造成了完全没有财产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了百万富翁式的资本家。无产阶级是消除异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② 同上，第42页。

的社会力量。

异化的消除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前提的。这不仅是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才可能造就消除异化的社会力量，创造消除异化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之间才能有普遍的交往，才能打破民族壁垒，超出地区界限，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发动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①因为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事业，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最后确立共产主义，才能最终消除异化。

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劳动者占有他们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占有采取什么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占有的对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现代的巨大的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不可能受哪一个个人的支配，只能通过联合的途径受全体个人的支配。也就是说，不是归个人占有，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受全部个人占有，也就是说要实行公有制。

要消除异化还必须消灭分工。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②分工的消灭，不仅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也消灭了各个个人的特殊利益，消灭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消灭分工是指消灭那种强迫的、不自愿的、将个人利益固定于其上的特定的分工，而不是消灭经济学意义上的分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② 同上，第37—38页。

马克思反复强调，异化的消除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人们自觉活动的过程，不是精神批判的过程，而是革命地改造社会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是根本对立的。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认为异化是精神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存在和本质的背离，这种背离通过精神的自我意识就可以消除。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则认为，异化是精神的一种反常状态，只要把它想象为“幽灵”、“怪影”、“怪想”从头脑中扫除出去，就万事大吉了。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异化不是人们的精神产物或奇怪的感觉，而是十分现实的、可以经验得到的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只有用革命才能摧毁。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必需，就是因为“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的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①

在讨论马克思关于消除异化的思想时，指出下面一点是必要的。这就是：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社会就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阶段，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阶级、国家、商品、货币、分工等等都会消灭，异化也就会随之消除。后来马克思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且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必要的。虽然无产阶级国家越来越多地具有经济管理的职能，但仍然具有政治压迫机关的性质，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个人自由联合的集体；至于说到固定的社会分工的消灭，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脑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消灭，那更是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异化已经消除了，而只能说是消除异化的开始，是为彻底消除异化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异化的彻底消除，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办到。

最后，还应该指出，异化的消除并不等于矛盾的消除。消除异化是指消除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统治人、支配人这种现象，使人的活动及其产物归人自己所支配，使人能在这种活动中自由地表现自己，从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客观性质，它必然表现为对象化的形式，构成一个在人之外的、按照固有规律运动的客体世界。人和这个客体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人类任何时候都是在狂风大浪中前进的。由于异化的消除，对于这个客体世界，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驾驭它，从而获得了自由。但是我们的驾驭程度、我们在它面前的自由程度，任何时候都是相对的。而且自由是一个过程，因而也绝不排斥人类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陷入盲目状态。

以上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异化思想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并不是对马克思整个异化思想的研究；至于国内外学者们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分歧和争论，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限于资料水平，缺点和错误一定会有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王 卫 国

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5—1846 年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了“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①。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们自己发现的新世界观。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基本结束。

但是，这部重要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原因在于，最初接洽的出版人就是这部著作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②，因而受到阻挠。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度打算出版这部著作，但也未能如愿。恩格斯逝世后，书稿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伯恩斯坦手中，他们借口书稿“没有写完”，内容“难以理解”不予发表。直到 1932 年，才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③

关于这部著作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都未评价过。而列宁则未读过它。近年来，这部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5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648 页。

③ 近年来，一些国外研究者曾指出这个版本的讹误，苏联版的编者也承认“有一系列严重缺点”，“这个版本的标题顺序也与手稿的结构和内容完全不符。”

了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谈点粗浅认识。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

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活动的重大步骤。当时德国的一切理论都同它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它们或者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或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都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也往往流于空想，不能为当时的革命实践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所以他向马克思提出，要尽快把新原则“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信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他们合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都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实践的迫切要求而诞生的。

然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由于《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热烈赞扬，当时流行着一种看法，似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没有区别，因而妨碍人们接受新的世界观。而马克思以前在一些著作中采用了“人的本质”、“类”等等德国哲学家惯用的术语，又给某些人以可乘之机，不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以为都是他们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因此，制定与德

国哲学思想体系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① 1845年《维干德季刊》连续发表了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文章,特别是出版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大量引用圣经中的无稽之谈,但它们在批判外衣的掩盖下,却迷惑了许多人。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决定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来进行批判。

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

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考察了摩塞尔地区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状况。这种考察促使他从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进而研究社会主义。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其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这时已经找到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他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

恩格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沿着不同的途径也得出和马克思同样的结论。1843年11月,他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后,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参加了工人运动。这些理论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究和实践活动的成果，反映在他撰写的关于英国的一系列著作之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中。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这段战斗生活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①恩格斯的这个见解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所作的结论大体上一致。

当1844年恩格斯在巴黎会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他们的共同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这部著作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为唯物史观的制定创造了条件。它提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等等观点，同时还彻底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谬论。但是它仍然打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烙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再次会面时，又决定共同钻研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体系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清算一下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产生的背景。

如果说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的某些章节由谁执笔还看得十分明显，那么几个月后，他们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志意识形态》，已经很难辨别那个部分是由谁执笔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一致，而且已是水乳交融了。如果说《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的批判，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不仅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而且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如果说《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个别观点做了大致的阐发，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唯物史观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所有这些都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成熟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诚然，马克思讲过他们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表述的，恩格斯也说过他们主张的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列宁也认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①但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论断放到一定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他们只能把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公开问世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作为他们所主张的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科学表述，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列宁在世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手稿，因而也只能依据他所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它早期著作以及他们对自己早期思想的见解，作出上述论断。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公开发表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新世界观，在这部著作中已经作了系统的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形成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8页。

的时间就应当提前,应当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标志。

我们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是因为:第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详尽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基础。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才迅速成熟。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又为唯物史观进一步作了科学论证。当他们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产生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第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描绘了共产主义的轮廓,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作了准备。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特别是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及其唯心史观,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界限,标志着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并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面系统地 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从各方面把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论证,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正是这种前提使得它在根本出发点上和以往一切历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过去的历史观不

是忽视这种前提，就是把它看成附带因素。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尘世的物质资料生产之中，而在虚无飘渺的太空。就连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不能摆脱这种结局。他虽然致力于把宗教世界还原为世俗世界，并且不满意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但是他把感性的，现实的人只归结为生物学的人，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资料生活上的社会关系，因而这种人不能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①所以他虽然极端憎恶抽象王国，但又找不到通向活生生现实世界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从人出发，但是他们看到了生产对人类生活的决定作用，因而他们指的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社会关系中的人，以此出发来确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②这个前提不是臆想出来的，不是教条，而是现实生活经验向人们提供的。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正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从这里出发才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实质问题。

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② 同上，第23页。

证关系。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科学,至少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只从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考察历史的动力,不了解社会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因而不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把历史动力归结为伟大人物的个人意志,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因而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总的说来都是唯心主义的,没有真正的历史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以后,情况起了根本变化。“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这个思想在《神圣家族》中只是一般地作了阐明,而在这里则明确宣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人们的意识只能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任何意识又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③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始人还从意识的产生、发展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他们说:“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④而意识的发展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分工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产生了“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30、199、34页。

思只是研究了异化劳动,揭示了劳动者和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分离,还没有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神圣家族》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进了一步,提出要研究产品背后的东西,就接近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制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由于这一原理的发现使得他们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真实过程,并对社会内部结构有个科学的认识,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是从对分工的研究中引出来的。“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①而真正的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时才开始的。马克思从两方面研究了分工,一方面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分工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引起新的分工,因此马克思认为,分工就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来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所以,分工又决定生产关系。

他们还探讨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认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而生产关系又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化是有规律地进行的,它的实质在于交往形式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一旦不适应就要发生变革。从而“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②。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

② 同上,第81页。

就构成交往形式的序列,同时也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地更替发展的思想已经形成。社会经济形态是用“所有制”这个术语表述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人们的相互关系都是依照他们对劳动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大量材料中概括出到当时为止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论述了它们的各自特点,说明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连续的性质。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在这部著作里还论述了阶级产生的物质根源,明确认为阶级存在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并证明各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有时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他们还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发展“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①在谈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时,他们指出:“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②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制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指出:市民社会是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全部历史的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70页。

正发源地和舞台”，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的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①

总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清晰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历史科学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它是人类科学思想发展中最伟大的成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

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和在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这部著作的重要内容。当时的“真正社会主义”主张“必须实现共产主义，以便实现人道主义。”^②“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③而其理论基础，就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本主义，所以，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继续。

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自己新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曾受到费尔巴哈观点的强烈影响，他们正是通过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回顾这段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② 同上，第651页。

③ 同上，第537页。

史时说：“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他们一方面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费尔巴哈观点的保留。1842年8月30日和1843年8月13日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和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提出过异议。到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这说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还没有完全离开费尔巴哈的影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使用“类”、“类生活”、“类本质”这样一些术语，还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向自身的“复归”，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这些观点本身和论证方法都和费尔巴哈颇为类似的。至于这部著作中对费尔巴哈表现出的敬重和过分的赞扬，更直接地说明这时的马克思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羁绊。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神圣家族》时，仍对费尔巴哈持有迷信态度。^③但是，这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他们认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④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已经从《神圣家族》中开始了。这是超越的第一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③ 同上，第31卷，第2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1845年春，马克思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起草了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几个最基本的方面拟定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质变。说明曾经起过“中间环节”作用的费尔巴哈哲学已经结束了对马克思的影响。到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不仅批判了他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而且批判了他在历史中的唯心主义。他们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这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就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分清了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就是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于感性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活动来理解。这正是造成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具有消极直观性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鄙视实践。他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了解客观世界不仅是人们认识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改造的对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 同上，第3页。

点，批评费尔巴哈脱离人们的社会实践来考察认识，因此“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①，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条件越来越变为人们活动的历史产物。

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这是同他离开实践来考察认识分不开的。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把人单纯地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物学的人，只能适应自然界，而不能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世界。“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性的同时，阐发了革命实践的意义，把实践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就是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他们还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确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功绩之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作为自己哲学出发点的唯心史观，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② 同上，第50—51页。

③ 同上，第6页。

诚然，费尔巴哈说过人应当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但他并不了解人的社会性，“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而是停留在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① 费尔巴哈把人抽象化，“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内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② 可见，旧唯物主义者虽然承认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并不懂得把唯物主义和历史结合起来，他们在历史领域内根本看不见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因而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的基础。

我们知道，正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和“普遍的爱”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去揭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是要人们不分阶级地在精神中、在人类本性中去寻找幸福和平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社会主义’硬要人们相信，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实，它本身首先就是某种神秘的科学”^③。这实际上也是对费尔巴哈关于“类的平等化”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来是“一定革命政党”的学说，而一贯远离政治斗争的费尔巴哈却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其实，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④ 至于为什么是互相需要的，他就说不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了。因此，共产主义在他们那里实际上是“空洞的范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537页。

④ 同上，第47页。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费尔巴哈所展开的批判,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唯物史观的时候,就和人本主义即“人的哲学”划清了界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

《德意志意识形态》

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制的扬弃而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不再把自己称为人道主义者,而是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批判地分析了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因而分清了科学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他们所发现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同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一样,是一种暂时的交往形式。起初,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工业生产,但是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①这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力不但得不到利用,而且成了破坏力量。此时便产生了“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个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的成员构成社会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①十分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已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问题的认识也有个发展过程。起初,他们认为批判就是革命。到《德法年鉴》时期,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认识到“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②他们还科学地揭示了革命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并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统治“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但显而易见,它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③,这就宣告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过去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将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剥削。而无产阶级即“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78页。

② 同上,第43页。

③ 同上,第78页。

基础。”^①可见，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和旧社会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然，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具备各种条件。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②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从唯物史观出发，把共产主义革命完全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尤其强调这种变革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物质前提，因为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就要为争取必需品而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些科学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奠基人已经大致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料全部都是社会公有；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们可以自由劳动，个人体力、智力得到全面发展；受整个社会支配的生产力将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共产主义社会将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② 同上，第43—44页。

③ 同上，第638页。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虽然有些术语和原理的表述还有待完善,但是,作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确立起来。因而用人的社会性代替了抽象的人的论述,用科学共产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阶段,不愧为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载入史册。

《哥达纲领批判》对 “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

徐 亮

关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问题,国内外理论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影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因此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就很有必要。本文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1)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不是在这里才“第一次提出”;(2)《哥达纲领批判》对“过渡时期”的理论发展了什么;(3)理论上新发展的伟大意义。

一、不是“第一次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都流行着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①。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也说,马克思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过渡时期的必要性”。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客观过程。它不仅没有说明“过渡时期”的实质,埋没了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新思想,而且是有害的。因为马克思这部著作写于1875年,

① 《〈哥达纲领批判〉提要 and 注释》,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当时距离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把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一方面,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它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经过1848—1871年欧洲革命风暴时期的实践,特别是巴黎公社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如果说,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才“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那就是说,在此以前,他还没有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要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也不知道这个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他的学说中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那末,还要唯物史观干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怎样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呢?而《哥达纲领》不谈这个问题,不但没有什么“倒退”,而且有了理由,因为马克思自己都还没有“论证”,甚至还没有“提出”嘛!这不是要把马克思弄到非常可笑的地步了吗?

事实决非如此。只要从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来看,就会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发现唯物史观的时候,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证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过去在分工条件下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②。因而在政治上分清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的界限。同时,他们又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③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为了“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2页。

③ 同上,第38页。

态和一切统治”。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就是“革命转变时期”的内容；消灭“一切统治”，当然也就包括了消灭自己的统治在内，而这不只是主观的愿望，而且是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分工”的必然结果，因而这个政权就不能不是过渡性质的政权。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是和他们发现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第一次提出”的，只有在发现了唯物史观以后才有科学的根据。

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上还不够确切。因为并非“每一个”阶级都能这样做。除了无产阶级，其他任何阶级，都受自己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的限制，不但不能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而且总是力图使自己永远统治下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这样做；否则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第一次对这个理论作了科学的表述。他说：“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①。当然也包括消灭自己这个阶级在内。无产阶级除了反对剥削阶级的统治以外，它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需要加以保护。对无产者来说，所谓“消灭一切阶级”，只不过是使所有的人都象无产者一样，不是作为阶级的个人，而是作为无阶级的个人参加社会生活。因此，“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如果说无产者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成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的这个阶级的统治。”^①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才“第一次提出”,而是早已有了科学的论证。

过去人们往往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版中说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②,作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理论的论据。但是,只要把列宁在该书第二版中增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所作的说明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就会知道这个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列宁根据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中“对问题的提法”,就已经明确地作出结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实质。”^③由此可见,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对“问题的提法”已经包含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而且不领会这一点,就是不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规定得比致魏德迈的信中说的还要具体。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5页。

③ 同上,第200页。

过渡阶段。”^①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必然的过渡阶段”，正是总结了当时革命实践的经验，因为当无产阶级把“空论的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② 而在这里所说的“四个达到”，也就是“革命转变时期”的具体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是适应这个时期的政治上“必然的过渡阶段”。所谓“必然”，就是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适应这个时期的政治需要。所谓“过渡阶段”，是因为实现了社会革命转变的“四个达到”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转变时期的相互关系作了详细而完整的科学论述。同时，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干脆把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同“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概念并列起来，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以及它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甚至重要到可以同整个学说相提并论的地步。列宁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正是根据过渡时期理论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我这样认识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要贬低《哥达纲领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意义，而是要还它的历史本来面目，因而一方面，可以从实质上更好地掌握这个理论，懂得它的科学性以及它在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当时德国党的纲领——《哥达纲领》，不谈如此重要的问题，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同时从上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那种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转变时期”统一起来的想法，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方面分开过。而把这两方面分开的想法，还是由于没有从唯物史观上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因为实际上一方面，“革命转变时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有随着“革命转变时期”的完成，它才能失去存在的条件而自行消亡。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转变时期，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机械地分开。分开了，这个专政就失去了任何根据和意义，“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成了事实上不可能作到的幻想。

二、发展了什么？

难道《哥达纲领批判》对过渡时期的理论没有任何发展吗？不是的。针对《哥达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反而鼓吹拉萨尔的“自由国家”，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因此，不但否定了“自由国家”在这个时期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否定了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存在的可能性。这同过去论证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时期的“必然性”相比，思想上更加前进了一步，增加了一定的新内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确实有些不同了，因为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成了革命转变时期唯一可能的国家组织了。正如列宁所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那末,这样说来,不是和前面的论点自相矛盾了吗?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前面说的是不是“第一次提出”,而在这里说的是有没有“发展”;前面是指过去是否从来没有说过,而这里是指在过去已经说过的基础上有没有新的意思,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只有首先分清这个界限,才能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有无发展。

马克思这个不同的提法,不但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排除了一切幻想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而打中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就是不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依靠当时普鲁士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无情地嘲笑了这种幻想,他说:“‘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②

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组织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由工人建立起来,就是用唯物史观去对抗拉萨尔鼓吹黑格尔唯心论的国家学说。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说:“国家是个人在一个道德整体中的统一”,“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他在《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中还说:国家的伟大使命,就是“要扶植人性的幼芽”,“要作为一切人而存在的机关”,保护“一切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9页。

的状况”。马克思说：不把社会当作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①，就是指出拉萨尔和黑格尔一样，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正好相反，国家不是“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它本身只不过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根本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本质，它的本质必须到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是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的工具，不但不能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②

既然社会是国家的基础，那末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就决不能依靠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来实现，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改造来达到，即只有经过剥夺剥夺者，才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旧社会。而要达到这一步，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就不能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而《哥达纲领》提出的政治要求，例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废话，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因为所有这些要求，凡属不是空想的，都已经当时的瑞士和美国等地实现了。所以马克思说：“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③，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范围，它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呢？

由此可见，马克思这个不同提法是多么重要！在它面前，一切企图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都现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形。因此，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3、21页。

义的分水岭。拉萨尔便充当了机会主义的首领。马克思关于“政治上过渡时期”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遵循着他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以来的一贯思想，也就是认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之中，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他始终坚持用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明社会的上层建筑，科学地解决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

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的变化问题，指出了《哥达纲领》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错误。这才是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的新思想。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② 因为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因此不能再用它来说明问题，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同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也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崩溃的问题，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不能制造乌托邦，不能凭空猜想无法知道的事情。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呢？列宁说：“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

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①也就是根据对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问题，但是，因为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而且详细地分析了第一阶段“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还没有完全消失；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没有成为人们乐生的第一需要；个人还不能全面发展，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还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充分涌流出来，因而人们还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所以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就不能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样，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这里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作了“最详尽的说明”，^③因此在唯物史观看来，就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问题作了最科学的论证，它在理论上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正是这个原故，当列宁看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对“第一阶段”的科学分析，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问题，作出了直接而明确的答复。列宁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权利规范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④而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2页。

④ 同上，第256页。

这种国家的职能就是“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保卫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①因此，马克思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会保留下来的问题，就有了科学的说明。

列宁在说明了这个问题以后，估计到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极其深刻内容的人，会责备马克思主义“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于是，他就进一步指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②列宁就这样，不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而且从实际生活出发，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③因此，又从世界观的高度为马克思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问题指出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不只是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问题，而且还认真地进行了科学的论证。经过列宁的阐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明显地丰富和发展了“过渡时期”的理论。他第一次阐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旧社会的痕迹”还不能完全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革命转变时期的“四个达到”，因而作为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也不能完全结束。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职能却随着革命转变的进程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象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那样，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剥削阶级对消灭私有制的反抗，现在它主要是完成列宁说明的“三保卫”的任务，保证劳动成为领取个人消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

②③ 同上，第256页。

费品的唯一尺度，使社会公有财产不受任何不劳而获行为的侵犯，能够顺利地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显然，无产阶级专政保留这种社会职能，是为了实现按劳分配的平等要求。因此，它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平等要求，而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①这是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本身的主张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因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实际上只是要求消灭封建的等级特权，也就是要求口头上的阶级平等，并不要求消灭阶级本身。而无产阶级在这里的平等要求，是在消灭阶级本身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进一步要求劳动和报酬之间的平等，也就是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劳而获，借以巩固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的继续再生产。因此，无产阶级国家的这种社会职能，决不能象无政府主义那样，幻想“在一天之内”就加以废除，它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社会痕迹”的逐步消失，随着人们不断地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而逐渐地“自行消亡”。否则，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制度就可能遭到破坏，不能顺利地过渡到高级阶段。这就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地说明了国家“自行消亡”的社会条件。马克思就这样在批判拉萨尔“自由国家”的唯心论中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

因此，否定《哥达纲领批判》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过去总是不讲马克思在这里发展了什么，只讲“第一次提出了”或“论证了”过渡时期的理论，而且照例不讲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问题，因此就淹没了马克思的新思想，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别是真正“第一次提出”的新贡献。而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对过渡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新发展。

只要明确了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就不会把过渡时期只局限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也不会否定社会主义时期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国家,也不是仅仅由于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事实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提出未来共产主义国家制度问题的根据,恰恰不是由于国际上的条件,而是由于国内的社会状况。而不能理解马克思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唯物史观上来认识他的过渡时期理论。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不管国际情况怎样,只要社会主义社会还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就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到底。它只能随着“旧社会痕迹”的消失而“自行消亡”,直接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联系起来,不能在“过渡时期”中间插进任何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正如列宁所说:“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①,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

三、新思想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过渡时期理论的新发展,当时就在思想上粉碎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后来又成了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武器,并且指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因此,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新思想,是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成为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5页。

真理，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光辉思想，就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一直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全部航程。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且继续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于是第一次把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的科学预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但是，托洛茨基却把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当作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借口。他在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说：马克思和列宁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维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来说，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远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它甚至还不能想象‘按需分配’。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不能使自己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他把“按劳分配”歪曲成为“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因此，不清算托洛茨基的思想，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沿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向前发展，而且还有被人继续歪曲和利用的危险。

原来托洛茨基打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号，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他不是用唯物辩证法，而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观察问题，因而不顾列宁的预先警告，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就把新事物当作比旧事物还要落后的东西来反对。他看不见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资料已经变为公有财产，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作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他与拉萨尔一样，不懂得“如果物质的生产资料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①而按劳分配正是苏维埃国家存在的一种经济基础。但

是，他却要求苏维埃国家不去保卫按劳分配，而去想象“按需分配”。因此，他就不能不同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马克思承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不承认这个原则。他们说：“‘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②但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经过对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他认为按劳分配的这种“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实行这个原则，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按需分配。这正是马克思对过渡时期理论的重要发展。列宁也正是根据马克思这个新思想，才作出了在共产主义的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结论。但是，托洛茨基却把马克思和列宁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这种新发现，都当作不但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还要落后。难道这不是同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正好相反吗？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在不同劳动者之间还有富裕程度的差别，但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已经没有存在的权利了。因此，它和资产阶级国家相反，不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不劳而获的剥削权利，而是要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现象，促进人们“各尽所能”地创造集体财富，迅速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消除“旧社会的痕迹”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和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神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离开共产主义更远了，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上层建筑，而且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保证。不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走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也就不需要了。

托洛茨基把“按需分配”当作实现“各尽所能”的根据，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消费资料的分配只能是劳动的结果，不可能在劳动之前就先有分配，否则，分配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因此托洛茨基从根本上颠倒了劳动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它本身成了乐生的第一需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在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前”，或者说，当人们还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之前”，要想人们都不要任何强制就“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工作，就象要求“按需分配”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列宁说得好：“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① 只有经过按劳分配，才能使那些“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② 也不能不参加社会劳动，并且逐步养成劳动习惯。否则，他们连维持自己生活的劳动都不想干，你却叫他“各尽所能”，不是太可笑了吗？

因此，只有“按劳分配”才能促进“各尽所能”。而到了劳动已经成了每个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按劳分配就自然地失去了自己继续存在的条件。因为人们都自觉地“各尽所能”，就意味着强制

①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259页。

性的分工已经被个人的全面发展所消灭，而这只有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那时，“按需分配”不但有了物质前提，而且有了精神条件，它就自然而然地代替“按劳分配”成为社会的旗帜飘扬起来了。因此，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也必然和国家的消亡一样，不能人为地废除，只能自然地代替。托洛茨基对此一窍不通，所以他不要经过按劳分配，幻想依靠“按需分配”来实现“各尽所能”！但是这样一来，不但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不可避免性的全部论证都被他彻底否定了，而且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旗帜上写的，也不应当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应当颠倒过来：“按需分配，各尽所能”。托洛茨基就这样处处同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相对抗。难道不是打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和列宁吗？

因此，只要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新思想，就决不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还保留着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便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把社会主义看作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东西，只能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实事求是地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必经之路。要想不走这一段路就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正象初生的婴儿要想不经过童年时代就成为大人一样，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 绍 孟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泛滥于德国社会主义论坛上的杜林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写下了不朽的光辉著作《反杜林论》。这部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全面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系统的、更加完备的形态表述出来。《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是历史 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对由他们创立的世界观加以系统化和总结，这不是偶然的。

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与此相应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向深度和广度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总结无产阶级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欧洲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①，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走向全面反动，工人运动处在积聚力量、加强组织的阶段，社会主义政党在各国逐步建立。社会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就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以便从思想上进一步武装工人阶级，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巩固，促进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走向没落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竭力提倡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庸俗唯物主义。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以不同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滋生和蔓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极端仇视，制造大量的谎言，诽谤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妄图消除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大肆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并豢养一小撮工人贵族，从无产阶级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运动。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不断地在工人运动中出现，兜售冒牌社会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货色。为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指导工人运动沿着健康的路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先后同来自“左”面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来自右面的米尔柏格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紧接着，“杜林瘟疫”在德国蔓延开来。实证论者杜林，冒充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家”、“改革家”和“唯一真正的哲学家”，疯狂诋毁马克思主义，并因袭德国思想界“创造体系”的恶习，臆造了一个庞杂的折衷主义体系，自吹自擂他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达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杜林的反动理论，俘虏了不少幼稚青年，影响极坏。德国工人运动也深受其害，一些领导人良莠不分，上当受骗。统一不久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基础本来就不巩固，经过杜林主义的严重侵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就变得更加混乱了。

鉴于这种情势，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直接参加下，暂时停下他对《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和研究，决心彻底收拾杜林。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虽然无意于创造一个新的体系去与杜林相对抗，但由于论敌本身的情况，使他不得不涉及非常广阔的科学领域。恩格斯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①他还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②。因此，《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系统连贯的阐述，正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特别是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所迫切要求的。

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以后，大体上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即形成阶段，从1842年到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从事科学研究，批判地改造和继承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遗产，特别是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有价值的成果，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3页。

② 同上，第49页。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5—1846 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些基本原理。但该书由于德国反动当局的阻挠，当时未能出版。1847—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把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公诸于世。《共产党宣言》是运用这一世界观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伟大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的光辉体现。第二阶段，从 1848 年到 1867 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已形成的世界观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和发挥，并进行科学的论证，以《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受了一次大规模革命实践即 1848 年革命实践的检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还集中了大部分的精力，解剖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67 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使这些原理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论证和发挥。如列宁所说，《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第三阶段，从 1867 年到恩格斯逝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对四十年哲学斗争进行总结，以《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为主要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表明，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不是这个世界观一开始产生就有的，而是一个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的发展过程。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对这一历史观进行科学论证。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许多时间去研究自然科学，总结自然科学的各种新成就，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当然，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

史观是统一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就不可能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革命导师一贯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利用了很多自然科学材料。不过,在七十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只是作了“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①。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出系统的阐发,还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这是因为,在客观上,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受到恩格斯高度重视和评价的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等人在生物人类学方面的贡献^②,为这件事提供了科学根据。当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客观情势,也提出了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迫切需要。在主观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内容广泛的准备工作,有可能对自然科学知识作一次彻底的分析。恩格斯说:“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③从1873到1876年,恩格斯在搜集研究大量自然科学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了若干片断和“导言”,准备完成一部自然辩证法的巨著。《反杜林论》一书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多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成果。而且,该书正是在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全面准备的条件下,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系统阐发。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本身发展到七十年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② 达尔文于1858年提出“自然选择”理论,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1871年他又从性选择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人是从猿进化来的。赫胥黎于1863年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明确论证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海克尔于1866年发表“重演论”,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代以后的必然结果。

二、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马克思 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科学真理，具有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所包含的各项基本原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革命导师的许多经典著作，都体现了三个组成部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①。“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②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作完整系统论证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完成的。《反杜林论》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及其思想来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原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主要内容，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怎样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并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58—60页。

恩格斯精辟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理论基础作用。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这是因为，辩证法在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不承认有什么凝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唯物史观正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具有自身运动规律的发展过程。同样，为了正确说明和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透过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和假象，揭露出被物的关系（即商品等价交换关系）掩盖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揭示出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才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看到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和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发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找到变革现存制度的正确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恩格斯又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②

为了具体阐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历史上考察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从逻辑上论证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基础和前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恩格斯分析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出 1831 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 1838—1842 年的英国宪章运动,标志着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和明朗化、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的事实,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之类谎言的破产。另外,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但是他们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不知道阶级斗争是由物质利益引起的,他们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只是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把理性看成人类历史的主宰。因此,他们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新的阶级斗争状况和唯心史观破产的事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了一翻新的研究,从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简要地阐明了这一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也是它的最顽固的堡垒中,即历史观中驱逐出来了,从而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6 页。

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①。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个伟大发现时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了剩余价值，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恩格斯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指出：“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在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③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结构，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正确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钥匙。恩格斯指出：“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是通过对“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分析而提出来的。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这个伟大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123页。

现,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详尽的探讨。他追溯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所作的尖锐批判,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提出了一些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思想,它对未来社会也提出过一些积极的设想和主张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缺陷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把理性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和主要内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是从外部产生出来并强加于社会的,因此,它的社会改革方案“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②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③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才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

② 同上,第299页。

③ 同上,第307页。

务。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理论证明：

第一，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也必然要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必然表现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出现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形成财富和贫困的同时积累，两极分化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和尖锐，最后“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夺取政权，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使自己成为自然界和本身的主人，逐步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二，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它代表新的生产力，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最有远大前途，是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力量。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于深刻经济利益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通过暴力革命，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这样，社会主义便不再是理性、正义等主观的产物，不再是依靠少数天才人物，通过和平和改良的道路去实现，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革命真理。它的产生，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为无产阶级树立了一面争取解放的光辉旗帜，指明了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三、全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反杜林论》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有过若干不同程度的阐述。《反杜林论》所作出的新贡献就在于，对各项基本原理作了必要的概括，使之系统化，并且在把这些原理运用于现实和认识的各个不同领域、特别是运用于自然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从而使各项基本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反杜林论》比较全面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构和体系，对包含在这个结构和体系中的各项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恩格斯首先抓住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他的全部论证和对杜林的批判。这个后来被恩格斯作了进一步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或两条基本路线的既古老而又常新的唯一标准。恩格斯从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思维和意识产生的根源、世界的统一性等问题上，充分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的原理，第一次明确提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①的科学论断。在物质存在形式问题上，恩格斯科

学地阐明了物质和运动的辩证关系,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辩证关系,时间空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关系,以及运动形式多样性的原理。在认识和真理的问题上,恩格斯阐明了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他还通过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科学论证,阐明了认识的能动性和根本目的,揭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关于唯物辩证法,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矛盾规律、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揭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和各篇中,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客观的历史规律,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以及阶级、国家、革命等原理,分别作了论述。根据恩格斯的“连贯的阐述”和所阐述的各项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认为,《反杜林论》既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结构和体系的比较全面的阐述。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结构和体系的重要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体系,不是封闭的和凝固的。它总是具有具体的时代特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结构和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各项基本原理,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

其次,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② 同上,第65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的，因而它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是有规律地运动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各种运动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把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当作前提和出发点，没有这个前提，辩证发展便失去了客观的基础。而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承认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唯心主义由于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因此其全部哲学论证都是脱离现实基础而臆造出来的。即使象黑格尔那样承认辩证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辩证法，只能是头足倒置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但由于它否认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因此这种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并且常常给唯心主义留下地盘。

形而上学者杜林由于不懂辩证法甚至仇视辩证法，处处都导向唯心主义。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始终贯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他在坚持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前提下，特别强调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及其规律性；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上，强调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上，强调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反对把物质运动归结为单一的机械运动；在时间空间问题上，强调时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在认识论问题上，强调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强调从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而突出认识的能动的、革命的方面。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就同形而上学者杜林明显地、截然地区分开来了。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① 同样，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用了

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证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指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一时一刻也没有忽视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基础和前提。

《反杜林论》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一致性。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②他认为，生产和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③这样，唯物主义就被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用社会的存在来说明社会的意识，用物质的、经济的根源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反杜林论》在考察社会历史运动、尤其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因而能够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形而上学者杜林蔑视辩证法，用简单的“公理”，即所谓“普遍公平”、“永恒正义”等去应用于简单的“要素”，即两个光秃秃的抽象的人，从而构成他的理想的“共同社会”，得出关于道德、法、国家等方面的永恒真理，这就不能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同杜林相反，恩格斯非常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以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旧的唯物主义。他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也非常重视历史的辩证法。他在承认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对社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③ 同上，第308页。

会意识的根源性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考察，以揭示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并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以达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①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反杜林论》就是论述这块统一整钢的典范篇章。

再次，恩格斯给唯物辩证法下了科学的定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 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是在研究大量实证科学、全面探讨辩证法发展的各种历史形态、总结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个定义表明，唯物辩证法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它不是去说明绝对观念的运动发展，而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阐明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同时，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它不是孤立、静止、片面地去研究事物、现象，而是要从事物、现象的联系和运动中，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事物、现象的本质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一定义还表明，唯物辩证法同揭示某一领域特殊规律的各门具体科学不同，它所揭示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这里有一个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唯物辩证法指导和包括各门具体科学，但是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唯物辩证法的产生，标志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以往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的终结。恩格斯说，唯物辩证法“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①又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②因此，唯物辩证法是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掌握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同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就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发挥巨大的力量。我们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必须坚持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才能保持唯物辩证法的蓬勃生命力，使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杜林污蔑辩证法是简单的证明工具，根本不懂得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③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本性”，并且从科学的和革命的意义上论证这个“本性”。他指出，辩证法不仅是探寻新结果、实现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而且它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④。又说，辩证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⑤这样，事物、现象就被理解为一个运动变化，互相联系，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有规律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同上，第17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180页。

循的发展过程。了解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个“本性”，也可以说就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有这个基本的性质，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和发展，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这一突出的贡献，决定了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学习和理解这部经典著作，对于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异化在马克思早期 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与性质

赵 仲 英

(一)

异化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当时它是马克思用以对法、国家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将异化范畴应用去分析社会现象时，他就对异化作了历史的考察，并且将人的异化到克服异化的过程，同时理解为是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由此又促使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进一步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

但是笼统地说，异化构成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中心，那是不够确切的。如果以《博士论文》为马克思早期理论活动的起点，他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实际上经历过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839年至1841年的《博士论文》阶段，那时马克思基本上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自我意识这一范畴便是那一阶段哲学理论的重心。以后是1842年至1843年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宗教批判进而对德国的政治、社会状况进行了批判，他抛弃了“自我意识”这个范畴，并用“理性”或“时代精神”去代替它作为批判的武器。从1843年秋，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立场，才用“异化”作为分析和批判私有制社会的武器，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异化”的观点无疑是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不过贯穿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却的确有着一个统一的观点，那便是关于人类的解放。首先是《博士论文》中对宗教的批判，接着是《莱茵报》有关论文中对现实德国的专制制度和社会的批判，后来是《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一般的、私有制社会的批判，都突出地表现出同一个主题，即如何使人从宗教、普鲁士专制国家以及私有制社会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正是人类的解放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轴心，至于其它的理论则都是围绕着这一轴心在旋转。

当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思想时，他是针对着现实地匍匐于宗教、专制制度和私有制的重压下的人而言的。马克思认为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去代替封建专制国家的革命，还不能求得人类的解放，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使人类得到解放。因此，他对旧社会的批判，就不仅限于宗教、法、国家，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去面向它们的社会基础，即私有制社会。马克思从1843年转向唯物主义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对于意识中的矛盾，只能从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去发现它的秘密。因此，就不是从自我意识的矛盾，或者是理性、时代精神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去理解私有制社会，而需要去揭露和解剖私有制社会现实的矛盾，才能发现这个社会的秘密。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家以及私有制社会的分析，发现了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异化状态，他力图藉对异化的分析，不仅去阐明私有制社会存在着的产物不属于劳动者，并且转过来支配着劳动者这个事实，并进而去分析这一事实产生的根源，以及最后被消除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异化、尤其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开始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正经历着他早期的批判时期，他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进而对法、国家、政治经济学展开了一系列的

批判，随着批判的逐步深入，他又需要去清算德国当时关于法、国家等理论的哲学基础，即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的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这时同样也涉及到批判的武器问题，显然如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去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体系，那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自我意识”本身就是黑格尔的范畴，它与“理念”又都有着同一的血缘纽带；它们都同是客观世界被颠倒了映象。只是当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对宗教的批判同时，揭露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和宗教的同一根源，即它们都是思维的异化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才算得是真正的开始。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立场后，他就用异化作为武器去分析黑格尔的思辨体系的秘密，指出了它的秘密，不仅在于用一种非实在的内容，去表达实在的内容，用一种颠倒的手笔，去描述现实世界，而且还在于这种颠倒只是人的思维的异化。如果说宗教的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同样地黑格尔体系中的“理念”亦不过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在人的思维中的异化，因此，异化又成为青年马克思用之去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体系的武器。

马克思在早期思想发展阶段运用异化范畴阐明私有制社会自身的矛盾，又用它作为批判法、国家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它们的哲学基础，即黑格尔思辨体系的武器，这就决定了异化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异化之所以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还在于它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直接联系着。单纯就异化而言，不过表明了私有制社会的一种普遍状态，异化劳动亦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每日都在发生的事实。对于这类现象和事实的描述，至少在当代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已是屡见不鲜。但是马克思在分析私有制社会的异化状态时，却是将异化作为进一步去打开私有制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并且由产生私有制

的历史根源,去考察它最终被消灭的可能性,最后则从私有制的消灭与异化的被克服,去论证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可见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同时就是他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如果说人类的解放,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轴心,那么,异化就是这一时期他为人类解放的思想安上的理论基石。

(二)

私有制社会存在的人剥削人与人压迫人的现象,是马克思提出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的现实前提。但是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提法还是限于社会的这种现象是不符合于理性或时代精神,由此构成现实社会与理性或时代精神的矛盾,人类的解放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从次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法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后来的提法是:现实社会本身存在着矛盾即异化,它不仅以宗教、国家的形态表现着,它更表现为产品、劳动对劳动者的异化,异化劳动则是其它异化形态的基础,而异化劳动就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正由于存在着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才需要提出人类的解放问题。所以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观点,又是和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密切联系的。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理论上直接渊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以及《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对于青年马克思无疑地是有过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他的类存在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类存在亦就是他的社会存在,因为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

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① 这里马克思突出了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而社会的活动指的则是劳动。马克思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存在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不仅因为人能思维,而且在于人对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类存在,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表现为感性活动,“因为生活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但是人的活动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由于它是有意识的改变外部世界的活动,即实践。实践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它直接使人与一般动物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因此,马克思称实践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并且“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认自己是类的存在物。”人通过实践,既表现着他的本质,复自觉到自己是类存在,自觉到个人的活动与社会的联系。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包含着两个内容,即人的类存在与实践。事实上马克思是将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本质和作为人的本质表现的实践,看作是统一的。他理解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按照这个观点,又可以说劳动者的本质就是他的劳动,劳动是“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即本质的表现,而生产也就是劳动者能动的类生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②

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本质,那么当劳动者的劳动和产品,被资本家所提取并作为资本去支配他时,这种异化劳动亦就是劳动者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② 同上,第51页。

的本质的异化。劳动者的本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它表现为“首先,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① 这里马克思用了黑格尔关于本质的外化的思想,它指由本质所产生的但又不属于本质或不符合于本质的内容。因此,外化的克服,便是回复到本质,异化则是一个否定的环节。虽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本质,可是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和产品却与劳动者分离并属于资本家所有,所以当劳动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时,劳动对他说来就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此外,劳动又使他肉体受损伤,精神遭摧残,这又是因为“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的劳动”,劳动者仅仅为了谋生才不得不受资本的支配,才使自己的劳动成为他的外在的东西。最后,异化劳动“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把他的生命活动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它把对人说来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② 因此,人类的解放,就是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状态的克服,是人的本质的再现,复归或重新占有。

异化在这里所包含的意义就很明确了,它就是人的现实存在与他的本质的矛盾,或者说私有制社会中人的存在,不符合于他的本质,是他的本质的异化。而这就是肯定人有着固定的本质,只是在私有制社会中,人的现实存在才与他的本质矛盾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异化的最终被克服,则将导致人的本质的复归。但是这种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

② 同上,第49页。

人所固有的本质，即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的人的一般本质能是什么呢？

如果说，人有着他固有的本质，它就是“自由地发挥自己肉体力量”的劳动，只是由于异化的出现，人才丧失了他的本质。那么，是不是可以将异化看作是人的本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厄运？或者是人的本质的堕落，就象黑格尔将自然看成是理念的异化，复是理念的堕落那样？

如果说，异化的克服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复归，那么，是不是可以将异化的克服看作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力量；或者是理性的力量，就象费尔巴哈那样认为只要人理解到爱的力量，并用爱的宗教去代替旧的宗教，便可以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

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异化又是怎样产生的，它怎样才能够被克服？克服异化的条件又是什么？

这一问题，马克思是怎样去解决的呢？

(三)

异化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上存在的异化现象它的根源何在？费尔巴哈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他只限于站在道义和伦理的立场上谴责了这种现象。但是在1843年恩格斯和赫斯就都已指出，私有制的存在，是产生异化的根源。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分裂这种现象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赫斯在发表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里的三篇论文中则认为，异化的根源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财富和相互竞争，使人与集体异化成为利己主义的个人。

在更早一些时间即一八四二年，魏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

保证》，在那部著作中他认为，最初人类发展的踪迹是在地球上最肥沃和最美丽的地方，那时人类在玩乐、欢笑和享受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后来由于私有制的出现，才导致人类社会病态的产生。

如果说产生异化的根源是私有制，那么，私有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来，虽然是一个禁区，可是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它却是主要立论的前提。对此，魏特林的答复是：社会出现了牧人和猎人的分工，于是牧人开始计算他牧群的头数，猎人也开始查点他的兽皮的件数。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动产这个概念。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超过上一世纪卢梭关于第一个想出圈地的人就是私有制的创立者的说法，虽然魏特林暗示了分工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原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肯定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而且还指出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资本使异化劳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又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但是溯其源“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由于产品和劳动的异化，才不断地产生私有和资本，马克思既然肯定异化是从人的本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异化的产生又使私有制成为必然，因此就避免了将异化和私有制看成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偶然的产物，就象卢梭的圈地人或是魏特林的牧人和猎人的故事那样。马克思进一步开始从人的本质发展过程中，具体说来便是从劳动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异化产生的根源。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人如何达到劳动的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他并且认为：“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然而他接着却并没有直接解答这一问题，也可能马克思准备在那张手稿的最后部分对问题作出回答，可是文字却到此中断了。一八四六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

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是循着劳动的发展过程这条途径去考察，首先是怎样构成劳动和产品与劳动者分离这一历史状况的。然后得出了人类的劳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工，开始使产品与生产者分离并使异化成为可能，而当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时，异化就成为必然这一结论。

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产品甚至他的劳动都为资本家所支配，由此劳动就成为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又是其它异化形式的基础，结论就必然是：消除私有制是克服异化的前提。但是既然异化的产生还有着它更深刻的根源，它是植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工，那么，最终克服异化，就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还需要消除旧式的分工，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以及使产品、劳动与劳动者分离的状况，而最终克服异化也就是人类的解放。

由于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发展过程理解为劳动发展的过程，并且对这一过程作了历史的分析，因此，异化即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到异化的克服和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也就有了新的意义，而整个的转折正是开始于这一点。当异化和异化的克服被理解为历史的过程，而不再是纯粹伦理或道义的要求时，异化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同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人性或伦理的范畴。异化有着它产生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又为克服异化提供了基础。至于摆脱了异化的人，亦不是人的本质简单的复归，因为“已经产生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恒定的现实，也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①这是指导于原始人的共产主义新人。而且共产主义亦不是“违反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页。

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它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前进。至于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亦完全不是人性的必然，也不是批判的结果，而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革命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是这样写道：“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足以扬弃私有财产思想，而为了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①无产阶级就是这一行动的主体。因此当马克思确认异化是历史的范畴时，它又有着作为伦理范畴的异化所不具有的新的意义。

（四）

伦理意义的异化和历史意义的异化虽然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两种含义又都包含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观点内。当异化仅仅被看作是伦理的范畴时，它意味着的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与人的本质的矛盾。但是当异化被理解为历史的范畴，并对它的产生作历史的考察时，这种抽象的矛盾就为人类劳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所代替了。

按照前一个意义，人的固有的本质是出发点，那就是他的自由的和自觉的劳动。异化则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人丧失了他的自由和自觉的劳动，反过来却受他的劳动和产品的支配，最后异化的克服又恢复了人的真正的本质。按照后一个意义，人在出现分工与交换之前，他的社会劳动和产品的社会占有是统一的，只是当社会生产发展出现了分工之后，人的社会劳动和产品的社会占有的统一才被破坏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使异化成为可能。异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3页。

化又以完整的形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那里产品和劳动都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家所有，它反过来就以资本的形式统治和剥削劳动者。最后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又为消除私有制创造了前提，而消除私有制也就导致了异化的克服。这两种意义虽然是矛盾的，可是却都构成为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观点的内容。

正由于存在着这一矛盾，才引起了从本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早期异化观点性质的广泛争论。虽然这一争论之成为当代有关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可是争论却表现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观点究竟是伦理范畴抑或是历史范畴这个矛盾上。而且如果认为异化是伦理范畴，是否可以说它就标志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全盘继承？如果认为异化是历史范畴，又是否可以说它是标志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全盘抛弃？

这种提法实际上是离开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观点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事实，他的异化观点所以包含有矛盾，也只有将它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得到理解。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是新哲学的对象这一思想，将人的解放作为他的理论的轴心；他也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类存在和本质异化的思想，并以它为他的异化观点的始点。但是进一步马克思却将人、实践、异化放到历史中和现实中去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了产生异化的历史条件，以及克服异化的可能性。这样异化的产生与克服，就被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不再是单纯的人性的呼声。如果说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里表达得较多的还是异化的伦理的意义，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就被历史的内容所充实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费尔巴哈关于人，人的类存在和异化的抽象性进行了

批判，由此将异化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安到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上。这个过程亦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向成熟时期的过渡，它又表明着马克思的这两个时期思想之间存在着的连续性。在这个过程中异化的伦理意义和历史意义得到了统一，或者说克服异化和解放人类的伦理要求，最终则被放到历史唯物主义这块科学理论的磐石上。

因此，马克思早期异化观点，并不表明一种思想断裂，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断裂。可以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这一连续的衔接点，在那部手稿里，人、人的本质和异化虽然仍是以抽象的形式表现着，可是也就在那里，马克思提出了必须对劳动和异化劳动作出历史的考察，并且对“人如何达到劳动的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作出历史的、而非抽象的解答。

有人认为由于异化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是一个伦理的范畴，因此，它在以后马克思的著作里就被抛弃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正确。就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分析物化劳动和劳动力不断转化为资本时，他仍不止一次地用异化去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现象。可见马克思即使在成熟时期也并没有就此抛弃了异化这一范畴，当然，在那里已经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去代替人的社会存在与他的本质那种抽象的矛盾了。不过有一点则仍然需要肯定，即人类的解放则始终是他的异化理论的归宿，而劳动者的解放，又是人类解放的主体。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张 文 煜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地位，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

异化问题也是当代国际哲学斗争的焦点之一。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用异化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视异化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核心”。而有些人在批判上述观点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用非历史的简单的做法，把异化视为马克思著作中的“糟粕”。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系统化和完成。因此，对《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作历史的考察，阐明它的性质及其与唯物史观创立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异化劳动理论的由来及其性质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直接来源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被用来表述绝对观念如何把自己转化

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到自身的过程,是黑格尔构造思辨哲学体系的工具和杠杆。黑格尔异化观的贡献在于,它在唯心主义形式下猜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劳动,人类通过劳动不断进行着自我创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他从感性的人出发,认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然后又把上帝当作独立的主体,顶礼膜拜,因而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不过是用思想表达出来的,并且得到合理论述的宗教,也是一种异化。费尔巴哈异化观的贡献在于,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在宗教、思辨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起了思想解放作用,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费尔巴哈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把人只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不是理解为“感性的活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类”,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理性、意志和爱。他抛弃了黑格尔异化观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青年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通过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而转向唯物主义的。但是,他不满意费尔巴哈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忽视,而把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用于研究社会问题。马克思用异化概念研究经济问题,开始于1843年秋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他在巴黎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所以要运用异化概念分析社会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第一,由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异化”成为当时德国哲学界的习惯用语,是哲学家的行话。第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有一个共同原则,即人不应异化,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状态必须扬弃。因此,在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规律尚未弄清之前,异化概念

就成了批判资本主义非人化、反人道，探索人民苦难根源的方便武器。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运用，既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批判继承的反映，同时又是他的哲学观点尚未成熟的反映。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批判地改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制定的。批判地改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定异化劳动理论提供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状况的矛盾。他指出，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劳动的全部产品应当归劳动者所有，但是实际上，劳动者得到的却是非人的生存。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说成财富的本质，似乎承认人的独立性，但实际上把劳动者看作非人化的存在物，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自身内部的支离破碎的原理”。^①

如何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相矛盾，这里牵涉到对经济学作出根本改造和创立新理论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既然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是财富的本质，而现实的劳动却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那么，现实的劳动就是与劳动的真正的本性相“离异”的劳动，即异化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异化劳动必然要被扬弃。马克思就是这样分析问题，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改造，虽然带有人本主义痕迹，但是，马克思既坚持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又吸取了经济学家以劳动为生产的灵魂的原理，并且试图从劳动本身寻求私有制的根源，这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68页。以下凡引用此书，只在文内注明页码。

就对马克思向唯物史观的过渡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黑格尔异化观的批判改造，为马克思制定异化劳动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黑格尔异化观的唯心主义错误在于把异化与对象化等同，把扬弃异化看作扬弃一切对象化，在思维中占有对象，因而包含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黑格尔异化观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潜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的和成熟的形式”（第115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观中的辩证法思想批判改造的同时，还把它用来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关系。他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的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摧残人的异化劳动；他运用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把异化劳动看作历史上暂时的现象，把扬弃异化看作历史的必然。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经过马克思批判改造之后，成了分析异化劳动，批判资本主义的犀利武器。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提出和制定异化劳动理论过程中，密切结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批判中，马克思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但是，由于他把费尔巴哈的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并且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使他同时也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作出了初步改造。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批判改造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马克思是这样分析异化劳动的：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劳动产品变为商品，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便失去实现人的本性的性质而发生异化。异化劳动表现为：劳动产品成为与生产者脱离的独立的力量；生产活动成为不体现它的

本质的强制性的活动；体现“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与人异化；人与人的对立、异化。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归根到底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因此，消除异化劳动与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致的。

可见，马克思用异化概念表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第94页）；用异化劳动理论说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具有非人化、反人道主义性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劳动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过程，是真正“人的社会”自我创造和生成的辩证过程。异化劳动理论一方面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合理成份，并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因而从研究的目的、对象到作出的结论都根本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已经具有某些新的质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痕迹，还不是成熟的科学的世界观。所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一种过渡性、二重性的理论。

二 异化劳动理论对于唯物史观 创立的意义

异化劳动理论由于已经包含有新的质的特征，因而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一）异化劳动理论对于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解剖，使马克思加深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认识，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唯物史观的发现，归根到底是对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规律的揭示。而对于物质生活条件规律的认识，必须

“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仅仅停留在哲学范围内是无法达到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借助于政治经济学，不解剖社会经济关系，不可能创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已走出了哲学的圈子，开始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了经济学的解剖。尽管这一解剖还未达到完全科学的程度，但是，它开辟了一条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

通过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解剖，马克思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通常的、物质的工业”是“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第80—81页）工业是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环节。“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第81页）因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有以工业形成的自然界为基础，才能克服其抽象性、片面性，成为真正的科学。自然科学只有以工业为中介，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第81页）。

通过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解剖，马克思初步看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于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用物质关系说明精神关系。他认为：“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的人的生活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普遍规律的支配。”(第74页)人们的普遍意识是现实共同体、社会生活的理论形态,是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反映。“作为类的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重复着自己的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人既是“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又是“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第76页)这里,已接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解剖,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作出了新的探索。他把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确定为“劳动”。他认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第50页)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正象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活动及其成果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第75页)物质生产活动还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为社会的联系。人利用体现于生产活动中的其它人的本质丰富自己,同样也用自己的活动去丰富其它人。在产品交换中,“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互相补益”(第101页)。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他的生活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第76页)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已经把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初步改造成为社会的人。

(二)异化劳动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和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

“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要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前提。”^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4页。

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资料。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他现有的形式不能直接导致唯物史观的发现，必须经过改造，把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所以，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同时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是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相统一，从而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用唯物主义观点初步改造了黑格尔异化观中的辩证法。这种经过初步改造的辩证法，就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直接受到了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启示。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第116页）

这就是说，黑格尔猜到了人类的创造性的活动；历史是人通过劳动不断使客体转化为主体，达到自我创造的过程。因而，这一否定的辩证法“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第112页）

在黑格尔（同时在经济学家）的启示下，马克思发现，在人类社会中有种永恒不息的创造性的活动，它能“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50页），又能创造人自身，这就是生产劳动。只有这种生产劳动能够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指出：“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第84页）因此，凌驾于自然界

和人之上的一切造物主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本质特征，又运用了事物“自己运动”的辩证法，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已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异化劳动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历史辩证发展的规律性。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未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因而他暂时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说明私有制的发展。马克思试图说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地产、异化劳动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的灭亡，异化劳动的扬弃，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部矛盾愈演愈尖锐。“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第 60 页）“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对历史发展次一阶段说来是必然的环节。”（第 85 页）显而易见，借助于辩证法，马克思已经从总体上看到了，人类历史是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发展的过程，并且作出了私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革命结论。

对于人类活动特征的认识，即实践观点的形成，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关键。而要科学地揭示人类活动的特征，形成社会实践的观点，必须要有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只有这种观点，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既是由客观世界决定的感性物质活动，又是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初步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这就为马克思形成社会实践的观点、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初步理论前提。

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他把人和自然界的发展归结为精神的自我创造、自我认识的过程，“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第 128 页）。但是，由于他把辩

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所以他不可能理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所说的劳动只能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无内容的“纯粹的活动”。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强调人的自然制约性，但是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看不到人的能动性，因而他也不了解人类活动的特征，不了解劳动生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采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又吸取了黑格尔能动的原则和辩证法思想，初步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于人类活动特征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唯物辩证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把能动性归之于物质的存在物——人，认为人一方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因而就应当把人的活动，既看作能动性的活动，又看作“对象性的活动”，即客观的物质活动。^① 这里，已经接近辩证法和唯物论融为一体的社会实践的观点。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对经济关系、生产劳动的解剖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是密切结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不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就不可能克服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现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结合。不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关系作出科学解剖。异化劳动理论体现了哲学与经济学、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初步结合。它对唯物史观创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这两方面的“初步结合”，推动了社会实践观点的形成。马克思正是从研究异化劳动入手，通过社会实践的观点，踏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①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页。

三 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局限 及其向唯物史观过渡的必然性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向唯物史观过渡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异化劳动理论虽然研究了经济和劳动,从而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发现。但是,研究经济和劳动的观点、方法受到了人本主义的影响。异化劳动理论从人本学意义上看待劳动,因而只注意研究劳动的异化(非人化)方面、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对象化方面。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劳动的创造性意义,但主要指共产主义条件下理想化的劳动,还未提高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认识。对于现实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主要是从伦理学意义上,从异化方面来考察的,没有着重从历史必然性的意义上来认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限制了对劳动自身的矛盾作进一步考察,因而未能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

异化劳动理论以抽象不变的“人的本质”、理想化的“人性”作为衡量经济关系的尺度。所分析的基本矛盾是理想化的“人的本性”与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而不是生产运动自身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未能着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的现实“存在”,进而揭示现实“存在”“非人化”反人道的经济根源。因而,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阐发,不能不带有伦理性、空想性。

异化劳动理论虽然提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命题,但是,由于对于人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尚未作出经济的历史分析,所以只能从人与动物区别的意义上理解人的一般本质,而没有

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研究每一时代人的特殊本质。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时，只能以人的一般本质作为尺度，把现实的人看作不符合人的一般本质的异化的人。这是异化劳动理论人本主义局限的症结所在。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承认有一个共同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的理解。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改造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离不开对于人类历史作经济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科学说明历史上的异化现象，从而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手稿》由于受到人本主义的影响和异化概念的限制，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关系的根本矛盾，从而对异化现象作出科学说明，因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仍被当作证明的工具，来摆脱抽象思辨性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人本主义限制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改造，限制了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结合。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由于受到人本主义的影响，也未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待李加图的劳动价值论。从人本主义出发，马克思一方面认为，李加图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本质，真实地暴露了私有制的非人性质，从而有助于揭露资本主义的非人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站在劳动异化立场上的非人性的理论，劳动价值论“在承认人这种假象下面，无宁说不过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第67页），因而断然摈弃了这一理论。^①实际上，李加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有其阶级局限，却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有机

① 参阅：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译本第2卷，第169页；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中译本，第58—61页。

联系和生活过程的基础,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历史价值。^①可是,马克思当时还未看到这一点。只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才开始变化。^②而真正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待劳动价值论,则是从彻底摆脱人本主义影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开始的。^③

由于人本主义所造成的上述局限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未能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完成揭露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根源的任务。因此,他只是这样地提出问题:“现在要问,人如何达到自己的劳动的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我们已经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归结为外化了的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因而我们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第56页)从现存《手稿》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对这一问题的科学揭示要有唯物史观。这对当时尚未从费尔巴哈影响下解脱出来的青年马克思来说,当然是无法解决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异化劳动理论人本主义局限的主要方面。这些方面与正在形成中的唯物史观存在着矛盾。比如,一方面要从经验事实出发,用“经验的分析”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价值出发,对这些经验事实用“异化”概念作出人本主义的概括;一方面从对象化方面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从异化方面,把劳动看作摧残人的劳动;一方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劳动,另一方面又把现实的人排除于人的本质之外;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原因(用所有制关系说明异化现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8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63页;《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3页;第4卷,第156页。

象)，另一方面又强调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原因(用异化说明经济关系)。这些矛盾实际上是两种出发点、两种方法的矛盾，即从经验事实出发与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的矛盾，经验的分析方法与思辨的分析方法的矛盾。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所作的理论尝试，包含着上述逻辑上的矛盾^①，是不必苛求的。这一矛盾表明，用人本主义建立的异化理论，不能说明复杂的社会问题。只要用人本主义说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上述矛盾。只有抛弃人本主义，同时抛弃异化理论，科学的历史观才能建立起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代替人本主义的异化观，是认识史的必然。

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马克思愈来愈感到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局限性。自《手稿》以后，马克思开始对异化概念作出改造。这一改造，经过《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最终抛弃了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过渡。

概言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历史的范畴和理论，它既蕴含着导致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痕迹。因此，我们既要充分估价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中的地位，又不应当把它拿到今天来不加分析地乱用。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异化精髓论”混淆这种对立的界限，主张用异化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出发点，实际上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是倒退。“异化糟粕论”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混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无视其孕育着的新思想，也不是科学的态度。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抓住马克

① 异化劳动理论包含着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也是造成研究者对这一理论和《手稿》作出各种各样评价、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原因。

思早期的异化理论,鼓吹“回到青年马克思”,实际是要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因此,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揭露资产阶级在异化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诽谤,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是哲学战线上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基础

陈村富 陈荣富

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就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部理论的基础，是人类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一次大飞跃，也是解决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等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研究有关人的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含意和意义。本文不牵涉哲学界、文艺界、伦理学界有关人的争论的各个具体问题，仅仅就一切争论必然涉及，也必须首先弄清的这个基本问题，谈些粗浅的意见。

（一）

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有一个成熟过程，他对“人的本质”、“人的现实性”、“社会关系”的理解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大体说来，在柏林大学时期，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谈论人的问题的。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关于人的理论还是唯心主义的。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已经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同时在历史观上形成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观点，从而开始从唯物主义出发观察人的问题。随

着唯物史观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关于人的理论也日趋成熟。1845年春天提出的论断是马克思已经基本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成熟的科学论断。为了准确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来加以考察。

马克思很早就思索“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现有资料说明，早在1835年8月的中学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马克思就使用了“社会关系”的概念，提出了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施加决定性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①大概是这个见解有独到之处，所以老师在评语中特地摘录了这段话。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作文中，马克思在谈到“个人的历史和人的本性”时，把“对善的激情”，“追求知识”，“热望真理”等看作是“人的本性”。^②马克思这时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观点，他所说的“社会关系”还是人们常识所理解的关系，然而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智慧的火花。

时过五年，当马克思跨上社会门坎时，他对人的理解已经超出了同时代的人。请看《博士论文》中的一段话：“直接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又是其自身时，他才是概念上成为现实的个体性，即使这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下是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仅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本，第1卷，1975年英文版，第4页。译文曾参照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译本。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本，第1卷，第637页。

是一个不同的存在物，而是一个个别的人（即使不是精神）的时候，这个人才停止其为自然的产物。”^①这几句话既散发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气味，又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孕育着人的社会性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黑格尔是把人当作理念发展的一个环节的，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个不好的人就是一个不真的人，亦即一个与他自己的总念或自己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人。”^②马克思以个体性及人的概念衡量现实的个体的人，显然还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框框，但是他又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个体的人。这里包含一个卓越的思想：人不是同物发生关系中认识自己，而是同别人发生关系中认识自己的本质；当人与人之间都以个体性资格彼此发生关系时就形成了社会关系，人也就“停止其为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了。

马克思走上“社会舞台”（马克思语）的第一次活动是为《莱茵报》撰稿和主编《莱茵报》。这一时期的文章和通信表明，他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第一次明确地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为“新的世界观”，要求“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③这个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看法带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色彩，就观点而言还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④。马克思后来批判这种观点是“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页。译文曾参照《博士论文》中译本。

② 《小逻辑》，1957年中译本，第4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67页。

动物”^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已经提出人类生活中存在两种关系——自然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而且注意到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② 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把社会关系看作是物质资料生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是指政治生活中的关系，但是他已经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在克罗茨纳赫的笔记，证明马克思已经转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他认为“理念本身应当从现实的差异中产生出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它们才是原动力”^③。1859年马克思回顾这篇未发表的著作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④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决定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的观点已经包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的这个重大发现使他对人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时，他认识到：在黑格尔那里，“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反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③ 同上，第256、250—2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①在人的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首次提出要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把握人的本质。同时，他还看到了人的社会性，他指出“人的普遍的和客观的特质”，即黑格尔所说的“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②，可见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理解人，他已经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也认识到要以“现实的人”为基础，从社会关系出发把握人的本质。

马克思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最终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这一时期文章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强烈影响，同时又超过了费尔巴哈，提出了“新世界观”的一些重要原理，例如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宗教的本质和社会根源等等。所以，评价这个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不能离开这一总的特点和历史背景。在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到赴巴黎前夕，他看到了费尔巴哈在同年3月、6月发表的两部重要著作——《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这两部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超过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9月马克思在通信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象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③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2页。

② 同上，第270页。

③ 同上，第418页。

稿》序言中还特地提到费尔巴哈的这两本书，认为这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显然这些都是过高估计费尔巴哈著作的作用的。关于人的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命题，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命题的含义，也没论及同费尔巴哈类似命题的区别。这说明马克思这时对“人本身”、“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马克思这时期对人的理论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上述命题，而在于进一步发展了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思想，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而且还在于开始研究经济领域的异化问题，指出“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②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这时的研究方向——解剖“市民社会”，研究经济关系。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1844年4—8月写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手稿》首次体现了这个思想。这部著作专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研究了劳动的异化，明确提出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态度，制定了唯物史观和新的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原则，使马克思有可能把人的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同以前相比，关于人的问题有下列新的进展：

第一，马克思开始把历史理解为人通过劳动创造的历史，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

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①

第二，明确认识到在诸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受生产的特殊规律支配。”^②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提法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国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是说平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手稿》又前进了一大步，更接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诸社会关系中首先是经济关系决定人的本质”的思想。用此理论研究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失去人的本质，成了“商品的人”，“便是这整个运动（指资本主义生产——引者注）的产物。”^③

第三，改造了费尔巴哈的“人是类的存在物”的思想，指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④ 这就是说，人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获得自己的本质；离开实践活动，人就失去人的本质，剩下的只是空洞的“类”的抽象物。

那末，到了1845年春马克思写《提纲》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成熟到什么地步呢？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中回顾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指“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引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③ 同上，第58页。

④ 同上，第76、51页。

注)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①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重申了“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接着说:“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②究竟马克思何时基本上制定了他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是最有发言权的。恩格斯的回顾表明,到了1845年春天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他的基本理论,并且用“明晰的语句”表述了自己的思想。所以,《提纲》提出的人的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走上成熟时期的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之后关于人的理论发展的总结;把《提纲》同1845年以前的思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看不到有一个发展过程,把马克思后来抛弃了的思想当作成熟的见解也是错误的。

(二)

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要给这个论断作出合乎马克思原意的解释,不仅要考虑到它的形成过程,而且要结合《形态》中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形态》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该书第一卷第一章是全书两大卷的立论基础。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谈论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238页。

本质的，尽管在个别地方还有不成熟、不确切之处。理解人的问题时碰到的两个关键问题——如何理解“人的现实性”及“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形态》第一章中都有具体的论述。考虑到学术界对这几个概念理解上的分歧，我们不得不多引用些原文。

首先是“人的现实性”或“现实的人”问题。德文原文“*In seiner Wirklichkeit*”中文译为“在其现实性上”，这里的物主代词“*seiner*”就是指“人”，说的就是“人的现实性”。根据《形态》一书的论述，“人的现实性”包含两层紧密相关的意思：一是这里所说的人是从事社会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或鲁滨逊式的人；二是人所从事活动的舞台是由确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而不是处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先说第一层含义。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①用这个根本原理观察人，马克思认为，人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而生产活动不可能由单个人孤立地进行，它只能是社会性的，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实践活动。所以必须首先从人们的生产活动出发把握人的现实性。诚然，认识人的本质，就象认识任何事物的本质一样，要靠抽象思维，而不能象费尔巴哈那样只靠感性的直观。但是，我们要的是科学的抽象。如果把人的社会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抽象掉，那末其后果就象《提纲》说的，“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即依靠纯粹自然的纽带，而不是社会关系的纽带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性。费尔巴哈正确地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人是“理念的人”，因而是抽象的人。他针对黑格尔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有时还讲“社会的人”，这是他的功绩。但是，他所说的“现实的人”不过是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有血有肉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①他讲的“社会”，是撇开生产活动和历史进程的日常交往、宗教活动和伦理生活；他所说的“社会的人”无非是从事宗教、伦理活动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有血有肉的人”其实还是抽象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②由此可见，从“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就可能认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具体的各种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然后是派生的其它社会关系，从而把握人的丰富的、具体的本质；反之，从抽象的人出发，就无视具体的社会关系，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自然属性、心理素质，以及抽象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其结局就象马克思说的：看到积劳成疾的贫民时，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改造社会制度，而费尔巴哈却“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③

“人的现实性”的第二层意思的实质是怎样认识人所处的环境。法国唯物论者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他们说的环境主要是指政制、法律、教育，其次是家庭、日常交往，地理环境。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归结为两个字——人和自然，认为自然是人的基础，

① 《未来哲学原理》第36节。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人是自然的产物。可是他所说的自然仅仅是单纯的感性直观的对象,而不是人类改造的对象;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不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①他看不到人生活其中的环境同动物所依存的自然的区别。他的悲剧就象恩格斯说的:“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②

费尔巴哈没有讲到的,马克思讲到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世界”又是什么呢?《手稿》回答说,就是市民社会,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世界。《形态》一书进一步说明:人固然以自然界为基础,但是人的世界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而“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③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每个历史时期的人都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此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④

综合“人的现实性”的两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时的基本前提就是,把人看作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④ 同上,第30、25页。

史地确立的世界”里从事实实践活动的人。“在其现实性上”的含义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关于“社会关系”概念,马克思在《形态》中也作了具体发挥。他说,无论是物质资料生产还是人口的生产,都“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①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吃喝穿住等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人与动物一样的生理需要,由此形成人的自然属性^②;另一方面人又不同于动物,人从事社会性的生产,由此形成人的社会属性。同样,人的生儿育女也有两重性:性欲、繁殖后代是动物式的本能;另一方面,人们的性爱、配偶、生育又是社会行为,它受社会发展的制约。人的自然关系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共同性,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性,即人之为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人之为人是由他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关系决定的,也不是二者共同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意思,人的本质只能是人的社会属性中的根本性质。动物性指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犹如人体活动不能摆脱化学运动、物理运动一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很干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别。”^③ 但是人性与动物性并不是并列存在,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同一事物的两重性。以饮食男女为例,马克思认为它是人的“动物机能”,同时“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前者仅仅是后者的自然基础,“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它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② 属性不同于本质,可以说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不能说人有双重本质——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中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①这就是说,撇开社会关系一面,就仅剩下自然关系了。

马克思区分了人身上的两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然后又把社会关系分为主要关系和从属关系,或象列宁说的区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与“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②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就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它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③,人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由它决定的。除了物质资料生产还有人口生产,人口生产形成血缘关系,到了一定历史阶段又形成家庭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在生产、再生产及人口生产的基础上,人们才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机构,这样才有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等。人的本质就是由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铸成的。人就是这一切社会关系的凝结点、纽带。抛开这个关系之网,网结(人的本质)也就不存在。平常我们说,这个人的品性是自私的,就是从他处理同别人的关系中看出来,而不是从孤立的个人的气质、生理或天性中找出来的;我们说这个人剥削成性,不是因为他肚皮大,生理需要特殊,而是在于他对别人劳动成果的贪婪和占有。人们不能根据某人对动物的凶残,断定此人的本质是坏的;反之,也不能根据他对动物的慈爱,断定他是善良的。所以说,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关系的产物,而是现实的诸社会关系的产物。

所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德文原文是“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意为“诸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马克思仅用“关系”的复数形式“Verhältnisse”,并没有

① 《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43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

“alle”(一切)的字样。所谓“总和”(Ensemble)并不是说一切社会关系加起来就等于人的本质,而是说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不是彼此孤立、分离的(例如生产关系中生产、交换与分配,生产关系与其它社会关系),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决定着、影响着人的本质。因为,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人也就无所谓社会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体现着、集结着许多社会关系。不管是好人,坏人,古代人,现代人,他们的本质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的质的规定的统一。我们说这个人大公无私,待人热情,热爱集体,爱憎分明,顾全大局……等等,说的就是这个人的多样性的本质的体现。试问,这些品质是从那里来的?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这些丰富内容是由什么决定的?显然,从“人本身”出发是分析不出来的,从各个阶级、各个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原始社会前期的人还没有家庭关系,也就没有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的属性;没有敌对的阶级关系,也就说不上此人是反动的,或者是革命的;没有宗教关系,也就说不上此人是虔诚的宗教徒,或者是异端分子。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深刻的。按照人的本质的论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性;社会关系改变了,人的本性迟早随着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人的本性也就不同;有没有共同的人性,取决于有没有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都一样的共同社会关系;既然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带有阶级性,自然就形成带有阶级性的人性;消灭了阶级关系,自然就出现共同的人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阶级影响的消失,人的阶级性也日趋消失,共同的人性也就逐步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必将带来共产主义的共同人性。

能否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些论述是“不成熟的”、“片面的”呢？不能。因为第一，马克思是运用唯物地改造过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特别是运用关于具体概念和科学抽象的理论，去把握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包含着丰富内容，它不是简单地抽取事物表面的共同特征，而是通过科学的分析得出的概念；第二，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这点已如上述；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没有对这一论断作过修正，恩格斯于1888年发表提纲时，这一条也只字未动。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坚持这个论断的。例如，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根据人的本质的理论，批判了斯密、李嘉图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历史的起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出发论述了资本家的本性，揭露了把自由、平等、博爱、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的根源和实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了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而且还把历史唯物论称作“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指出这是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所以，不是马克思的论断“不成熟”，“片面性”，而是持这种意见者自己尚未领会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三)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是人类对人的认识的一次大飞跃，是认识史上关于人的理论的革命性变革，也是以往的关于人的认识的总结。

在古希腊，人们对人的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史称“前苏格拉底”时期，那时的哲学家统称“自然哲学家”，不管是唯

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以自然现象为中心，研究整个世界、宇宙的本源和变化，用水、火、气、土或种子、原子说明人的组成，人的活动，人的感觉和思想。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智者”和苏格拉底开始到亚里士多德（前384—322年）。这时研究的主题转向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人的美德，人在世上的意义，个人同国家的关系等等，成了人们关心的普遍问题，最后，亚里士多德对前两个时期作了系统总结。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三个时期即希腊后期，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形势，人生问题成了三大学派（伊壁鸠鲁、斯多亚、怀疑论）争论的中心，他们从不同的哲学理论出发，回答了三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人生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怎样求得灵魂的安静和生活的快乐。

这是古希腊涉及人的问题的基本概况。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问题，在第一个时期根本还未触及，到了第二个时期才明确提出来。这是同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相关的。只有这个时候，由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才开始从个别中寻求一般，进而对事物作类的区别，然后探求同类事物的定义，开始是具体的感性事物，例如桌子、房子等的定义，然后是数、图形、动植物的定义，最后是道德范畴、国家和人的定义，于是出现了一场有趣的争论：

甲：“人是什么？”

乙：“人是两脚的动物。”

甲：“那么鸡也是人啦！”

乙：“人是两脚而没有羽毛的动物。”

甲：“如果我把鸡毛拔掉呢？”

……。

这样给人下定义当然是肤浅可笑的，然而它说明人们已经学

会用种加属差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认识人和动物的共性和特性了。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把事物的性质区分为本质(essence)、固有性(property)和偶性(accident)。对于人的性质,他也同样作了区分,认为白脸之“白”,塌鼻之凹性,是人的偶然属性;两脚、无羽毛、有理性、会说话是人的固有属性;而决定人之为人,使人与其它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性质才是本质属性,即定义中的最后属差,也就是与质料相对的形式^①。那么人的本质(形式)是什么呢?在《政治论》中,亚里士多德按上述理论给人下了一个有名的定义:“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②他认为人有群居的本能,但又不同于群居动物。他需要结成家庭、村庄和国家,作为城邦的一员过着社会的生活,“凡是自外于社会的人,或者是自足而无需生活于社会的人,他必定或者是野兽,或者是神人”,“人即使在生活上无需互助,也乐于共同的社会生活。”^③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表明他已经初步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尽管他所说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且他还把奴隶排斥在人之外,当作“会说话的牲畜。”马克思很重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他说:“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④。马克思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合理思想,同时又指出人的社会性主要是,而且首先是社会的经济关系,他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

① 参看《形而上学》英文版第七卷第四、五、十二章,及《政治论》标准页1253a10、1332b4。

② 《政治论》标准页1253a3。

③ 《政治论》第一卷第二章标准页1253a28—30,第三卷第六章1278b20—21。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

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①

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人们对人的认识也深化了。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充分显示了人改造自然的才能，“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即“创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说，“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②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特点，是人类对人的认识的进步。它接近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的观点，马克思也是吸取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这一合理思想的。

那么，人同动物究竟有那些不同本性呢？从文艺复兴到英法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先后发表了许多言论。大体说来，他们都把自保、自爱、利己、理性、自由、平等看作自古以来人人共有的本性。斯密、李嘉图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建立他们的经济学；霍布士、洛克、卢梭从抽象的两个人出发论述各自的社会契约论；爱尔维修、霍尔巴哈以人的趋利避害，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为原则，建立他们的道德体系和政治学说。他们的共同毛病是把人看作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正如马克思说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③对于他们的错误，人们已经作了不少评述，这里仅从认识发展史角度，考察一下他们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什么意义和教训。

大家知道，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时期，教会和经院哲学家从神学出发解释人的本性，其理论要点是：一、人是上帝在第六天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是受上帝之令统治一切生灵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3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参看《反杜林论》第93页。

因而人是神创造的，但又是超自然的；二、原罪说；三、人的天性就是不平等的，唯有僧侣贵族才有理性和智慧；四、信仰高于理性，理性要为信仰服务；五、禁欲是幸福之道，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是犯罪的根源。资产阶级人性论破除了神学家们的上述说教，把人们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人性论中，从理论上论述最充分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爱尔维修的《论人》；从哲学上以机械唯物论为武器，对人的问题作了概括和总结的是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第一部第六章“论人”，《社会体系》第一部第六章“论社会生活”，集中代表了法国机械唯物论关于人的理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同高度发展的机械唯物论，已经包含辩证唯物论的萌芽一样，霍尔巴赫关于人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历史唯物论的萌芽。他说：“人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物质组成的整体”，“人和其它的一切事物一样，乃是一种自然产物”，“是处在一种继续不断的迁化之中的”，“整个宇宙在过去的永恒历程中并不是和现在一模一样，在以后的永恒历程中也不可能有一刻和现在一模一样。”^①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问题：人是否“不得经过无穷个连续的发展阶段？”人除了“和其它一切自然产物一样，同样遵守着一般的、已知的法则”外，还遵守着哪些“自己特殊的、未知的法则”？^②在《论社会生活》这一章中，霍尔巴赫把人看作“社会人”，认为人的需要，理性和义务感“只能是社会生活的结果”，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把他的精神放在劳动上”^③。霍尔巴赫还隐约看到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他反对卢梭等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15、619、620页。

② 同上，第615、616页。

③ 同上，第651、652页。

人对古代自然状态的歌颂，认为即使回到古代去，“人依然会依次重新经历原来的那些状态；……到了若干世纪以后，他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今天看到他所处的同一点上”。^①象以上这些思想，显然已经超出了以往机械唯物论和人性论的水平。当然就总体而言，它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研究他们的学说，我们可以得出两条认识史教训：

第一，机械唯物论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不可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只有克服旧唯物论的机械性，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揭示人的本质。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能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它必须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研究了法国唯物论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发现“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欧文、德萨米、盖伊等“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②但是，从人性论出发，不可能解释人和环境的关系，也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阶级关系，因而无法为无产阶级指出正确的解放道路。《神圣家族》完成之后，马克思就在《提纲》第一、三、九、十条中作了批判性总结，接着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学说必须建立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反克利盖的通告》、《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以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法国唯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后的重要成果。

在法国唯物论之后兴起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人性的论述不多，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他们的贡献，尤其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168页。

特殊贡献。费希特用唯心辩证法研究人的问题，在《论学者的使命》第一、二讲中提出“自在的人的使命”与“社会的人的使命”问题。他认为：“人既是理性的生物，又是有限的生物，既是感性的生物，又是自由的生物”，“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①他把“自我”作用于“非我”称作“能动性”，认为“自在的人的使命”就是通过理性认识和实践活动，“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②黑格尔吸取了费希特的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以及“自我”与“非我”相统一的思想，进一步用辩证法分析人同世界的关系，并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③这些思想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对人的理论的重要发展。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人的理论的过程中，是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因素和辩证方法的。^④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发展的高峰，他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认识到“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于团体之中，包含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⑤。这些原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特别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但是，“包含于团体之中”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从《基督教的本质》“引论”第一、二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方法是撇开历史

① 《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第11、16—17页。

② 同上，第9、10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页。

④ 参看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206、174—175页。

⑤ 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第54、59节。

的进程,从抽象的个体中概括出“类”的共同性——情感、理智和意志,认为“理性、爱和意志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目的”^①。这样,就象他自己说的“将人本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通的科学”了。其结果,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他“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使“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从文艺复兴到费尔巴哈,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有个别合理因素,有过一些特殊贡献,然而都不能认识人的真正本质。究其原因,除了阶级根源之外,还有时代限制所造成的认识根源。人们可以从一个个的动物中概括出这类动物的共同本性,从而给哺乳类、两栖类、爬虫类……下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适用于古今中外同类的一切个体的,是反映这类动物的共同本质的。可是,用同样的方法却不能从各个人(那怕是无数的个体)中抽象出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人的本质。当他们企图从个体中概括出理性、情感、自爱、利己等“共同人性”时就陷入歧途了,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些抽象的、超阶级的、超时代的“共同性”。他们不懂得没有高级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把握人的本质的;他们看不到人是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孤立的个体中,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从个体的分析中得不到人的本质,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才能概括出人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也正是在这里。1842年6月马克思提出一个疑问:“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性质而不存在人类的一般性质吗?”^②但是马克思走的不是历史的老路。他是在社会化大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6页。

生产的条件下,在人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用人类思维的最高成就——辩证思维方法去研究人的问题。当他发现不同等级,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本质,不同的本质不是由国家和法决定的,而是受“市民社会”支配的时候,他就着手解剖市民社会,创立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和唯物史观,从而实现了关于人的理论的变革,达到了人类对自己本性认识的飞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并不象西方某些学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人的理论”。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高于迄今一切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是真正科学的学说。

略谈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

隋 儒 诗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又重新活跃起来。为了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重温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是很有必要的。

一、马克思人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一生的言论、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人性问题。为了正确认识人的本质,马克思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为了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而展开其全部内容的。当马克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的时候,他曾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当然,马克思对人性的科学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唯心到唯物、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841年以前,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处于幼发时期的抽象人性论阶段。在这个时期,从总体上说,马克思还是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唯物主义思想的唯心主义者,或者叫做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

完全赞同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者。这时，马克思把人性主要理解为理性。

1835年，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①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马克思反对自私的欢乐，希望全人类都得到幸福，并且立志用个人牺牲来为全人类服务。但是，他还不知道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839年初到1841年3月，马克思写了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文章出版时，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封·威斯特华伦先生写的献词中认为：“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真理。”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普罗米修斯反对神灵的思想，认为“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②很显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他反对神灵并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崇拜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立场上。

第二，从1842年创办《莱茵报》到1844年底，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处于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越来越具体，唯物主义的科学成份大大增长

① 转引自海因里希·格母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第7页。

② 《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起来。

1842年,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又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其他几篇论文。这些文章表明了“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① 马克思写道:“我劝你们,思辨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假如你们愿意明白事物存在的真相,即明白真理,你们就应该从先前的思辨哲学的概念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你们只有通过火流(双关语,德文,意译是火流,音译是费尔巴哈——引者注)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② 从这时起,直到1845年春,马克思已经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成为一个拥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者。

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不彻底的。费尔巴哈只看到人的自然本质,主张生理决定论的人本主义人性论。1843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一系列著作,虽然对旧世界进行了无情批判,并且提出了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对人性,却往往还是从费尔巴哈的观点,即从抽象的族类本质上去考虑。他认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所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③ 当时,马克思看到了人间存在的深重苦难,他用理想的抽象的人性来向这苦难作抗议,以求唤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恨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那时,由于社会上对“往何处去”的问题都很糊涂,所以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④ 这些话反映了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34页。

③ 同上,第411、414页。

④ 同上,第416页。

马克思对人和进行具体探讨的现实倾向。

1844年,马克思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从经济异化的角度,较为具体地探讨了人性的历史发展,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但是,在对人性的总的看法上,手稿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实在、深刻、广泛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①从手稿的全文来看,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的任务,表明他还没有和旧唯物主义彻底决裂。

第三,1845年以后,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处于科学的成熟的和不断丰富发展的阶段。这时,马克思坚持从社会经济关系上去研究人,从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

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根本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一切旧的人性理论的影响,正式创立自己的新的人性理论。这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产生,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催产作用。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最早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后来,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产生,到《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的问世,特别是在长篇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时,马克思对于人性已经不是从抽象个人的共同性上去理解,而是从历史进程的现实性上去探讨人的具体的社会形式;已经由对人性的抽象议论转入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具体剖析。在这个阶段里，马克思用全部精力探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道路。为了找到人间苦难的根源，找到解救苦难的方法和道路，马克思深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通过研究进而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理论，既不能否认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也不能把 1845 年以前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观点奉为楷模，而应当坚持成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

二、马克思在自己思想的成熟 阶段对人性的理解

当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以后，他对人性的理解包括了极丰富的内容。总的说，马克思主张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认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点内容：

1. 人的本质是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统一。由于人的社会本质对人起着决定和主宰的作用，因而人的本质归根到底就在于人的社会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么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 这里所说的“兽性”，我理解主要是指人的生理本能，例如生理正常的人都有生存欲望和性爱等。当然，人的生存欲望和性爱是已经“人化”即社会化了的，同动物的生存欲望和性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如此，它们毕竟仍有生理的机制在起作用。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爱的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10 页。

教时,承认性爱对人的作用 and 意义。^①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概念中,确实包含有人的自然本能的内容。

当然,马克思着重强调的并不是人的自然本质,而是人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然本质和动物的自然本质也是根本不同的。人的自然本质是社会化了的自然本质,人性的任何内容都受社会性所主宰。因此,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本质既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起点,也是人脱离动物界并不断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历史表现。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③随着人的发展,人的社会性也就不断加强。而人的社会性的加强,不仅改造了人的内在自然本质,而且改造了人的外部自然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④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本质是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生产劳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他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人和动物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专属于人的劳动不是对自然界的简单的适应,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自然界进行根本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造。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人们为了在实践中取得胜利，彼此就必然要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其中既有合作，也有分工。这样，人们的劳动产品就会“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②由此可见，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劳动者的概念也会不断扩大，人的社会性也就逐步地走向更高的阶段。

2.人的本质是人的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共性不等于本性。人的本性在于社会性，而社会性不仅有共性的一般表现，而且还有个性的特殊表现。人的共性存在于人的个性之中，只有通过对个性（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等）的具体的历史的研究，才能认识人的共性，才能从个性和共性的结合上去把握人的本性。

具体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是通过
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人性的研究，来揭示人性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预示了不同个性的不同历史命运。

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③这也就是说，资本家的个性是喝工人血汗的个性。这种个性是由资本这个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特定的社会身份，决不是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556页。

③ 同上，第260页。

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①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酷剥削性质，所以工人阶级必然会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也就意味着把“资产阶级身份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②马克思就是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家个性的科学研究，得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结论。

那么，无产阶级的个性及其前途又是什么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③由于工人的劳动力成了商品，由于工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形成了无产阶级特有的阶级个性。他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是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的，代表着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目光远大、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等高尚个性。这种阶级个性要求摆脱人对人的奴役和剥削，提高劳动者的价值和地位，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和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新社会。马克思深入考察了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首先从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开始，进而通过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消灭私有制来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本性不仅要求本阶级的全体成员联合起来，而且要求联合所有的劳动者，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工人阶级看来，“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页。

② 同上，第85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2、218页。

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实践早已证明，工人阶级个性的发展，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工人阶级是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了维护资本家的社会主宰地位，总爱玩弄抽象人性论的空话，而且总愿把自己打扮成为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主义者。对此，马克思从十九世纪中期就开始进行批判，越往后来，这种批判就越激烈、越深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② 事实上，人性、“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说：“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通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④ 马克思依据历史事实告诉无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格言，早已被步兵、骑兵和炮兵所代替，尽管“博爱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⑤ 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一生确实“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⑥ 等陈词滥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尊重科学、尊重客观实际的生动表现。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不仅是解放无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

⑥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5页。

阶级的正义呐喊，而且也是对自己过去不成熟时期的错误思想的清算。恩格斯在 1892 年为自己 1844 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序言时，感人肺腑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指出，抹煞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① 恩格斯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② 这充分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3. 人的本质是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不能把人性只理解为意识概念，而应注重人的行为和活动，应当从人的实践的性质中去把握人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统一。如果只片面强调实践是感性物质活动，而否认精神活动在实践中中的作用和意义，那就会使实践陷入盲目性。事实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里，指出理性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同宣扬理性至上的唯心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当马克思先后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分道扬镳之后，他并没有忽视理性的作用，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理性作了正确的解释和说明。马克思始终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人，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崇高理想的社会价值，他所反对的只是空想和欺骗。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理性，具有精神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人高于动物的突出表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76、277 页。

现。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 人们的这种精神活动，是人类实践的社会性、自觉性和目的性一种体现，是最高级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正是由于人脑的作用，才使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考察人的劳动的具体过程时指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来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② 这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既离不开人的物质性，也离不开人的精神性；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绝对分离，既是人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人性发展不完善的表现。

必须强调指出，在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是在承认物质活动对精神活动有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来承认精神活动对物质活动有巨大的反作用的。物质活动是精神活动的前提、基础、条件和目的，精神活动是物质活动的反映。精神现象是主观和客观互相作用的结果，它既离不开物质器官人脑，也离不开人脑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离开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精神既不能产生，也不起任何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③ 这说明，在人的本性中，物质性是起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方面。所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

② 同上，第555—5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以,为了获得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光靠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行动,必须用物质的批判去消灭那些异己的力量,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4. 人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性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去研究人性问题。

1847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时指出:“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①马克思还特别强调生产活动对改变人性的作用,他写道:“在再生产行动本身中,不但客观的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本身改变着,练成新的品质,由于生产而发展了自己,改造了自己,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际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性的变化并不是向人类的原始状态倒退,而是不断实现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造就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新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③这种新人,实际上也就是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新人。

三、研究马克思人性理论的现实意义

对于人性的研究,并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的,更不是到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

②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这里就结束了。在马克思以前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哲学家早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论的主张。这些主张至今还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标志着人类对自己本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一个极其光辉的阶段。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还不可能完全把握人性未来发展的全部详细情况。因此，马克思以后的人们还要继续探讨人性问题，乃是历史的必然。

鉴于目前国内、国外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应当回避对人性论的讨论。应当正视现实，正确地回答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把讨论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人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有着自己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人民群众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人、改造人、提高人、为了人的工作也就更加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百多年以前，在资产阶级人性理论喧嚣表演的时期，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科学的人性理论，驱散了无产阶级面前的思想迷雾，指导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取得巨大胜利。今天，当我们满怀信心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进军的时候，更需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发扬马克思所开创的良好学风和光荣传统，深入地研究现实社会，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

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规定及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余 其 铨

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科学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规定为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对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基本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四十年来哲学斗争的总结，也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本文拟就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发展过程作一个历史的概略考察，进而阐明这一科学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考虑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了。但是，那时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和科学知识的不足，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解释做梦的现象，就把自然力人格化。他们把思维和感觉不是看作他们身体本身的活动，而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灵魂的作用，灵魂在人死时离开了肉体而继续活着，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人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最初思考，是蒙昧时代的狭隘的愚昧的产物。

到了奴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奴隶社会

相对于原始社会来说,虽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总的说来,仍然是落后的、不发达的。大自然对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盲目的、异己的力量。哲学最初是同自然科学浑为一体的,它的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客体,即是说,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本身。但它不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的现象,而是把世界作为总体来研究。这种研究也叫做本体论的研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就产生了两条相反的认识路线。古希腊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论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主义的斗争,就是欧洲古代哲学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和“虚空”的学说,以及他的“影象论”,唯物主义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问题。这种回答还是很幼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①但是,从本质上看,它毕竟是唯物主义的。

柏拉图却是坚持了一条与德谟克利特相反的路线,企图用他的“理念论”和“回忆说”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客观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仿和阴影。所以,他认为客观事物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人们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人们要获得知识无需与外界接触,只要闭门思考,进行自发反省,让灵魂去回忆就可以了。这是唯心主义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取消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

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之间的斗争,是欧洲古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斗争。这场斗争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后来欧洲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学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柏拉图路线和德谟克利特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在欧洲的中世纪，产生了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实在论者认为一般是实在的，是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的；唯名论者则相反，认为一般不是实在的，不是先于个别而存在，个别高于一般，只有个别才是实在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因素。但是，不管是唯名论者还是实在论者，都不懂得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因而他们都不可能正确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哲学家们虽然已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很不自觉的，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到了十五世纪的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的统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以尖锐的形式向教会提出了挑战：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人文主义者在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时候，要求人们把目光从天上转向地上，从神转向人。这样，哲学也就从封建主义的“天国”搬到资本主义的尘世，自然和人就成为西欧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各派哲学斗争的中心课题。

不过，这时哲学对象的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本体论方面，而是从对客体的研究为主转变到以主体的研究为主，研究主观能不能反映客观，如何反映客观的问题。也即是研究人的知识来源问题，获得知识的途径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产生了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错

综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反映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最突出的就是洛克的“白板说”和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但涉及到认识的来源问题，而且在主观如何反映客观，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的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洛克的“白板说”不但主张人的思想、观念是后天获得的，而且认为认识导源于经验，是人们在活动中凭借感官得来的。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的局限，也不可能正确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①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作为全部哲学的中心课题来研究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因此它的成就也特别突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过去的哲学家在研究人的认识过程时只是研究思维或存在的某一方面，而德国古典哲学却把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同时研究。即是说，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但研究了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谁是根源、谁是派生的问题，而且还研究了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如何反映存在的问题，以及思维的反作用的问题。第二，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觉察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黑格尔曾说过：“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转。”^① 费尔巴哈也曾说过,精神对于感性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虽然还没有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对它的内容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可以说,已基本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对这一内容作了重要的阐述。德国古典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

黑格尔虽然辩证地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他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他以思维去统摄存在,把存在思维化。他说过:“存在与自我意识就是同一个东西,所谓同一个东西,并不是比较地相同,而是就其本身说根本是一个东西。”^③ 马克思曾指出,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是风趣而形象地揭露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命题的唯心主义实质。黑格尔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其实是思维和思维的同一性,他讲的从思维到存在的转化,实质上是上帝创世说的翻版。

费尔巴哈正确地论述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给人耳目一新。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的重大贡献,是他基本上明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歧的界限在于是否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问题,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提了出来。但是,费尔巴哈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又是异常混乱的:第一,他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缩小为人本学的问题,把思维与存在

① 《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93 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63 页。

③ 《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57 页。

这个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变成为我与我的思维的关系问题。第二，费尔巴哈非常讨厌抽象，他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简单地看成是思维消极、被动地反映存在，否定了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他从感性存在出发，认为只有从主体的被动性中才能找到思维与存在的差别，才能证明客体的实在性。因此，他只承认思维对存在的机械反映，否定思维到存在的转化。第三，费尔巴哈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混乱，还表现在他区分哲学派别的标准问题上的混乱。费尔巴哈认为人类文化、人类社会生活都不能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说明，唯物主义只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但不是人类认识的大厦。所以，费尔巴哈不敢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敢承认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甚至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混乱，有他认识论上的根源，这就是他的形而上学唯物论所决定的。同时，也有阶级原因，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使他不可能把哲学基本问题贯彻到底。

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在哲学史上才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使人类的认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科学原理的提出，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说，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因为它是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原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一八四一年，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中已指出思维和存在、哲学和周围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时，他还没有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已经转向唯物主义。他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提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的思想，认为“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①，精神不是在物质之外而是依赖于物质而存在的。并且指出，黑格尔法哲学的错误就在于他脱离了物质的、现实的存在，把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头足倒置了，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又进一步指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统一的思想。马克思说：“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②。这些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阐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③这是第一次用实践的观点把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认识，才能反映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实践是检验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论述的一次重大发展。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成创造一切的决定力量，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哲学与现实、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青年黑格尔派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去搞单纯的精神批判，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 and 存在关系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与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存在（即物质）是思维（即精神）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就谈不上有思维的存在，没有被反映者就谈不上反映。同时，思维本身也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他们所讲的同一性其实是“自我”与“自我”的同一、思维与思维的同一，这种同一取消了物质基础，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深刻地阐明了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在肯定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的前提下，阐明了精神、思维如何反映存在，以及如何反作用于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9—30页。

存在，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性。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思维的社会本质，提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把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贯彻到底。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自然观上虽然承认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不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旧唯物主义者根本不懂得思维的社会本质，只把思维仅仅看成是大脑的自然属性，把人的思维能力看作是既成的、纯粹的、自然的生理的现象。所以，旧唯物主义不可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不可能彻底了解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虽然已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但并不等于说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就已经系统地、完整地提出来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从提出到科学原理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可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唯物史观的产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和阐述。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于哲学基本问题比较系统的论述，则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绝对对立的时候，指出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思维和意识“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①这就是说，不能把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思维和意识的根源，离开了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也就不可能产生思维和意识。据此，恩格斯提出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2页。

物质性”的著名原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时，还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①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精神与物质、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而且精辟地阐明了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有两个特点：第一，恩格斯没有直接用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术语来表达，而是借用杜林的“原则”进行论述，这是由于《反杜林论》的论战性质决定的，思想原则和客观实际的关系也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第二，恩格斯比较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哲学基本问题，这是为了从认识过程的反映与被反映，如何反映，以及认识的对象和来源问题上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后来，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提出了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这是对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反杜林论》已经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原理，没有明确地规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原理，到了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

八十年代，恩格斯在反对新康德主义，总结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四十年来哲学上两条路线斗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32 页。

争的基本经验时，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准确而系统的阐述。恩格斯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在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明确地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① 这样，不但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而且对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重要的规定。第二，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科学原理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明，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从而对哲学基本问题两方面的内容作了全面的、准确的阐述。第三，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把哲学上两大派别、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明确地表达出来，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作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对区分哲学上的派别的斗争有着重大意义，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对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什么意义？恩格斯没有讲，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两者关系也没有充分的论述。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是“第一方面”就够了，“第二方面”可以不包括在哲学基本问题之中。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扩大了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含义。列宁认为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谁属第一性，谁属第二性不但是讲世界的起源问题，而且也是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

谁派生谁、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问题。因为本原问题也就是认识对象的源泉问题,所谓反映,既包括认识的对象问题,也包括如何认识的问题,即认识的辩证法问题。列宁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有机联系起来了,这是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的重大发展。

三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原理的提出,是对哲学发展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几千年来哲学史的发展,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但使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而且也推动了哲学向前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哲学发展史的轴心。列宁说过:“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所谓认识,无非就是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哲学基本问题这科学原理的提出,对哲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首先,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使两千年来的哲学发展史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什么是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不是把哲学史看成是各个哲学派别、各种哲学观点的杂乱无章的堆积,就是把哲学史看成各种观点的相互矛盾、相互推翻的历史。所以,黑格尔说:“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

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① 这种观点否定了哲学史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否定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发展史的轴心问题,这就是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普遍规律认识的历史。这样,抓住了哲学史的本质内容,正确地阐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总结和概括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显示出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本身固有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性。

其次,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明确地表达出来,为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提供了唯一科学标准。哲学史上千流百派,观点五花八门,斗争纷繁复杂,但是追根求源,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只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形成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派别。凡是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凡是认为精神、意识是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物质世界是由精神所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坚持用哲学基本问题来分析哲学史,就能正确地清理出哲学史上斗争的基本路线,认清其斗争的实质。这样,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指导人们在哲学领域的斗争中,自觉地分析和鉴别各种哲学的基本性质的主要方法。为我们坚持正确的认识路线,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的认识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1—22页。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问题

曾 盛 林

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此后，“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便成了传统的提法。然而，这个提法并不科学，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际情况。对此，有些同志已经提出了疑义^①。为了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应当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 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其它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归根到底，“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②。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出现过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产物。由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之中，所以社会主义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诉诸理性和正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

① 张红旗同志在1980年《齐鲁学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德国是马克思主义故乡吗》一文，我同意张文的基本思想倾向。不过，张文只有数百字，未免失之过简。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产生的。

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仍然是一个反动的封建国家，尚未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封建枷锁禁锢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手工业仍然占优势地位。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划分还不明显，还存在着大量的行会师傅，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小工场主等小资产阶级阶层，不象英国和法国那样，阶级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①。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尚未充分暴露。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过，当时的德国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德国人没有英法两国人所有的那种发达的阶级关系。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等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的体系的基础。因此，唯一存在着的德国共产主义体系是法国思想在受小手工业关系限制的那种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这是十分自然的事”^②。这个“唯一存在着的德国共产主义体系”就是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批判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③。恩格斯后来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时也说：“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④。

为了论证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传统的观点总是把德国西里西亚职工起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这不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2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脚注。

合历史实际。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确实是德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但是，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却是错误的。因为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发生在1844年6月，而当1844年1月《德法年鉴》出版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因此把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和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8—1842年的英国宪章运动相提并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是不妥当的。恩格斯在列举“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时，仅仅指出1831年的里昂工人起义和1838—1842年的英国宪章运动，没有把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包括在内。^①

斯大林在论证德国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地时，全部论证就是《共产党宣言》上的一段话：“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 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斯大林从这段话得出结论说：“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③。这个结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话是运用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德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教导德国工人认识德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向德国工人说明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怎么可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②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页。

③ 同上，第8页。

拿它作为论据呢。

马克思主义是德国辩证法 批判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经济的结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不能排除德国。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创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1882年9月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①。传统的观点为了论证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常常以这段话作为他们的一个理论根据，但他们却忽略了恩格斯在1883年的德文版上所加的一个重要的脚注。恩格斯的脚注指出，“‘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②传统的观点直接违背了恩格斯的这一指示。

谁都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和法国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所提供的相应思想材料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页。

② 同上，第377—378页。

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①。恩格斯甚至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中产生的”^②。然而，“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③。因此，只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及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才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研究材料，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离开英国和法国，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巴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 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还在于他们亲身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德国人，但他们参加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地点，主要不是德国。他们青年时代参加德国的社会革命实践，并没有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基本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实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创立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德国以外，马克思在法国巴黎，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

③ 同上，第115页。

1843年马克思到达巴黎之前，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独立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不可能参加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不可能认识德国无产阶级。同时，他还没有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确立共产主义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当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一点初步了解，也不是来自当时德国的社会实践，而是来自他对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初步观察。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文章说：“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份财产，这是事实……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①。显然，马克思是从英国和法国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同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密切联系的。

马克思在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很多地方表现了天才的机智的唯物主义观点。常使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当时已有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把对具体事物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混为一谈。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把一些具体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上升为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在批评林木盗窃法时，认为林木占有者企图把私人的，自私自利的利益提升为法律是“下流的唯物主义”^②。由此可见，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摆脱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家对唯物主义概念的错误看法，还没有认识到唯物主义是和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怎么能说他已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呢？

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的实践只是具备了转变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因为他虽然看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与普鲁士现实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

② 同上，第180页。

尔法哲学。他虽然看到了政治法律制度同经济利益的联系，但还没有作出唯物主义结论。他虽然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但并没有解决这些疑问。他虽然产生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但还没有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从1843年3月中旬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到1843年10月底迁居巴黎之前，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在克罗茨纳赫渡过的。这段时期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段时间是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①的时期，主要不是参加当时德国社会革命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在巴黎实现的。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来到巴黎，立即投入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的斗争生活。他同各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出席他们的会议，并和工人直接接触，常常和他们谈到深夜。工人们向马克思诉说了自己所受的剥削、自己的斗争和希望。这使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进一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仅仅在这时，他开始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并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②

同时，马克思也是“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③的。1843年底，他阅读了亚·斯密，李嘉图，让·巴·萨伊，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及其它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了札记。1844年1月底，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由曼彻斯特寄给《德法年鉴》的《政治经济学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判大纲》一文，马克思阅读了这个大纲，并作了摘要。列宁指出：“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① 1844年4—8月，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下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大纲。马克思正是在巴黎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参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②

恩格斯是在1842年11月下半月离开德国前往曼彻斯特的。列宁指出：“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③，“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④

英国当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工人运动最发展的国家。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宪章运动的堡垒。在这里，恩格斯亲身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投身于英国工人运动，出席工人的集会、宪章派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和宪章派的左翼领袖乔·哈尼等建立了联系，并为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在《新道德世界》上向英国工人介绍了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哲学。恩格斯常常深入到工人栖身的污秽陋巷中去，亲身观察工人的苦难和斗争，与工人交知心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些地方渡过的。正象他自己以后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所写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② 同上，第90页。

③④ 同上，第90、89页。

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① 这些活动才使恩格斯认识了无产阶级。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他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阅读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阅读了有关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著作和所能找到的官方文件。正是通过在曼彻斯特的这些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实践，恩格斯才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发现了和马克思完全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又没有象马克思那样上过大学，当过报纸的主编。但是，他们世界观的转变基本上是同时的，同时发现了唯物史观。而且恩格斯当时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还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恐怕不能仅仅用恩格斯的天才来解释，这与恩格斯比马克思早一年离开德国到曼彻斯特参加革命实践活动有密切关系。

总之，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仅仅在德国，它是国际的产物，“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

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

靳 辉 明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是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伪科学。它以“研究”马克思之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肆无忌惮的篡改。尤其是肆意曲解“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关系，用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全面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这股荒谬而有害的反动思潮，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可等闲视之。

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但这与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的理解，却是断然不同的。列宁曾说过，马克思在1843年刚刚“成为马克思”。尽管在时间界限上众说纷纭，但研究者都认为确实存在着成熟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之分。因为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者面临这样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马克思起初是唯心主义者，后来却是唯物主义者。因此，科学地阐明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形成，揭示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的过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出于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适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的需要，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伪造青年马克思的机会。所谓的“青年马克思”问题，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某些难点上进行投机的产物。

围绕“青年马克思”进行投机的决不只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中还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老修正主义者，天主教的理论家和形形色色的反共主义者。然而，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这一反马克思主

义大合唱中，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反动“理论”，给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巨大影响。所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乃是粉碎这股反动思潮的关键所在。

本文试图通过对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产生及其基本派别进行一些分析，以揭露资产阶级伪造青年马克思的反动实质。

(一)

资产阶级伪造青年马克思并形成一股风靡西方理论界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决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和社会政治原因。追溯半个多世纪来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过程，就能更清楚地认识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反动作用。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向，始则漠视，继而抱以错误的态度。就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而言，他们的一个主要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的经济学说和“特别的社会见解”，忽视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其主要代表是考茨基）。按照这种观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其哲学基础的。至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发展，他们更是置之不顾。有的理论家虽然注意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但或者混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如伯恩施坦），或者混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如普列汉诺夫）。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不仅直接影响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而且实际上孕育了从另一极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为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补充”马克思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对资产阶级“青

年马克思”问题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早期一部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伯恩施坦等人隐藏达三十年之久，1932年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S·朗兹胡特和I·迈耶尔在发表这部著作时，公然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他们认为，马克思这部不成熟的著作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胡说什么这部著作势必会改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对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提出要把“人的本质”的观念作为马克思的“中心”概念，等等。这种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就为后来对“青年马克思”的各种伪造，奠定了思想基础。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呢？就“新”在他们发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一个是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被他们硬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贬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从而提出用早期的马克思否定晚期的马克思，开创了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先例^①。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始终是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盟，两者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无疑对日益陷入深刻危机的资产阶级哲学是一个新的“启示”，使他们早已开始的对马克思作“新的”解释的“尝试”，逐渐成为一种有计划、有

① 见《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1932年德文版和H·德·曼：《重新发现的马克思》，载德国《斗争》杂志1932年第5、6期。转引自列·尼·巴日特诺夫《哲学中的革命变革》，1960年俄文版第8页。

目的的行动。

资产阶级哲学其所以能够接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并迅速形成自己的“理论”，是同资产阶级哲学内部成长起来的思想因素，同当时的政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上提出了个人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形式等哲学范畴。显然，这些问题恰恰是半个多世纪前青年黑格尔派所研究的中心。所以，当时在西欧，甚至也在日本，曾一度出现对这个早已消声匿迹的思辨哲学的研究兴趣。继而，他们逐渐地把兴趣转移到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的关系上来，开始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他们歪曲青年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视为只是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范围里进行的过程，而且是以费尔巴哈所阐明的“黑格尔思想的坚定的人本学”为基础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时，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两个主要流派的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适应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也相继崛起。前者以对黑格尔哲学作“新的”说明为特征，后者则以“自我”的人为其立论的前提。不言而喻，这两个哲学流派同上述歪曲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着内在的联系。到了三十年代，它们很快从刚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了它们共同渴望的思想材料。因此这两者逐渐融合起来，专门从事于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明确提出“回到马克思去”的口号，甚至推崇“青年马克思”为自己理论的“奠基人”。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思潮的产生，固然直接导因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歪曲，但其深刻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哲学本身因素逻辑发展的结果。

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思想原因,而且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正象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这一科学论断,同样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取得了空前重大的进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的创造性。两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的各種矛盾和凶残本性暴露无遗;两次革命的伟大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由一种科学学说上升为居统治地位的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愈来愈深入人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增强,同时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进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愈益陷入混乱和危机。因此,资产阶级改变反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叫嚣“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哲学提出了一个纲领性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能为一切人所接受”^②。这当然是欺人之谈。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分野,就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社会科学,因而就不可能有为一切人都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这一表白,却最清楚不过地供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遇到的深刻危机,反映了他们为摆脱这种危机,妄图通过“解释”(实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以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的需要。由此可见,所谓“青年马克思”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求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回到马克思去”的口号,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用“青年马克思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② 转引自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74年俄文第二版导言。

思”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策略罢了。

综观近百年来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在上世纪末曾经叫嚷“回到康德去！”继而本世纪初提出“回到黑格尔去！”二十世纪中期又提出“回到马克思去！”这三个口号形式不同，本质则一，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补充”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就是用资产阶级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从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然而，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花招，其结果都不能阻挡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进军。相反地，在不同时代提出的这三个口号，恰好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过程，如实地纪录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历史。历史的辩证法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二）

现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都对青年马克思竞相进行伪造，它们的观点形形色色，手法五花八门，但究其主要倾向，可归结为两个基本派别：新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和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此外，还有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的“解释”，但它只是前两者的混合物，只是上述观点的发挥而已。

对青年马克思的新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是历史上最基本的和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种。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抹煞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与黑格尔哲学的原则界限，用被他们庸俗化了的黑格尔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本世纪初，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发起复兴黑格尔运动时，这种观点就已端倪可察。那时他们就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继续”，把注重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因素作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点，明确提出“黑格尔继续活在马克思主义中”^①，从而根本否定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

改造和发展。朗茨胡特和迈耶尔在 1932 年把马克思观点看作黑格尔观点的具体化,同上述思想完全一脉相承。按照他们的看法,青年马克思的观点是黑格尔观点的“发挥”,而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例如 1837 年给父亲的信中所含有的思想,“就已经包含了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的萌芽”。不言而喻,必然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继续。无怪乎半个多世纪来,几乎所有黑格尔主义者都视马克思为“坚定的黑格尔信徒”,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想寻找一条从这个理论过渡到经验现实的道路而已。这种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视为纯粹的量变过程,就为后来新黑格尔主义者伪造青年马克思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五十年代以后,在西方形成了“研究”马克思的热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S·胡克将这种“盛况”比喻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但是,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热潮原来是三十年代对马克思“重新发现”的继续。这时新黑格尔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解释”,也无非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理论观点的“彻底化”。这种彻底发展了的“理论”,和他们以前的观点相比较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于黑格尔哲学。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前主要限于歪曲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将前者说成是由后者“借用”来的,那末现在西方“马克思学者”不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都来源于黑格尔哲学。与从前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相反,现在又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哲学问题。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他们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新托马斯主义者德·拉·

① 转引自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74 年俄文第二版导言。

皮尔竟然宣称：“共产主义关于世界的学说完全建立在黑格尔的理论基础之上”^①。由此可见，这种所谓“彻底化的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歪曲罢了。正象他们过去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他们片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

其次，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般哲学问题，而且仅仅归结于一个异化问题。这是新黑格尔主义伪造马克思的最主要特点，也是现在西方流行的一种最时髦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奠基者就是法国著名资产阶级教授让·伊波利特。他不再把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这种统一性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异化的观点。马克思青年时代阐明的这一哲学观点，完全体现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这位教授在他的实际为新黑格尔主义伪造青年马克思奠基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一书中，这样写道：“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我认为，从这一思想出发，并把人的解放看作人在历史进程中为了反对他的本质的任何异化（不论异化采取何种形式）而积极进行斗争，这就能更好地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②。这就是说，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袭用来的“异化”概念，是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和结论，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这种观点就成为利用“异化”伪造马克思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谬种的理论来源。现在西方流行的这类观点，无非是伊波利特思想的具体发挥。

① 转引自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74年俄文第二版导言。

② 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955年法文版，第147页。

所以，人们称他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台柱之一。

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抹煞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根本区别出发，经过一个演化过程，最后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个“异化”问题，这完全是伪造“青年马克思”的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发展的逻辑结果。这个事实表明，在同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哲学问题、特别是“异化”问题愈来愈居重要地位，因此，正确地说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原则区别，以及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科学阐明，就能使新黑格尔主义一切伪造显出原形。

异化概念无疑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借助于对异化问题的探讨，确实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得到深化，或者说，马克思对异化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他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接近。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了旧哲学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表现了马克思如何在旧的哲学术语影响下获得新的思想内容，而当这个内容发展到足以摆脱旧形式时，他又如何以新的术语取而代之的这样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总之，它表明了马克思观点的形成，是在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客观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对这个过程必须辩证地看待。

众所周知，异化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概念，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借以运动的形式。异化和异化的消除即非异化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就是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而在社会历史中，绝对精神通过人的有限精神认识自己，从而又从自然界的异化中“返回”到自身。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历史不外是异化的产生和扬弃的过程。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是一个服从其哲学体系需要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概念。虽然这里闪烁着辩证发展的思想光辉，但它却始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

思辨的性质。黑格尔异化思想所包含的辩证因素,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确实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只有当彻底摒弃了它的神秘主义形式以后才是如此。

事实正是这样。马克思决非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歪曲的那样,无条件地“接受”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而是第一个揭穿了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唯心主义性质。一方面他指出了黑格尔把精神异化看成是决定性的,现实异化只是由精神异化派生的;另一方面批判了黑格尔把异化的扬弃只视为在认识范围内完成的,否认在客观上的扬弃,在实践上的扬弃。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地,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①。这就揭露了黑格尔在异化问题上颠倒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心主义性质。

同时,作为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经济事实的异化和精神的异化的关系,提出经济事实的异化决定精神的异化,精神的异化只是现实生活异化的表现。可见,马克思并不否认精神异化,而是把这一切异化都归根于经济生活的异化,从而得出经济生活、生产活动是决定一切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和私有制关系的分析,清楚地认识到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学说。这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5页。

② 同上,第121页。

马克思在1844年通过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得出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之所以混淆马克思观点和黑格尔哲学的原则界限,就是妄图把马克思歪曲成象黑格尔那样的唯心主义者,从而根本抹煞马克思由此得出的革命结论。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决非象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所说的是贯彻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概念。不仅如此,就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它的地位也不是始终一贯的。

虽然借助于对异化问题的研究,使青年马克思一定程度地认识到历史的辩证运动,但是用经过改造了的黑格尔异化概念这一抽象形式来说明经济事实和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异化概念并不是最符合事物内容的形式。所以,随着对具体事物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异化这一抽象的哲学概念显然不能使马克思感到满意,他着手探索一种更为实际、更加科学的概念以取而代之。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开始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进而探讨了生产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和劳动分工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①

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如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异化那样,集中地、深入地研究了劳动分工,研究了生产——分工——所有制形式的关系,研究了人的活动的两重性: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人和人的关系(交往)。正是通过对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研究,最后形成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原理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思想,从而揭示出社会运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8页。

自然历史过程。正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诸科学概念的初步形成，因为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历史运动的源泉不在人的自我异化中，而是在物质生产中，因为认识到由生产发展水平所制约的一定的分工引起不平等的分配和使人们不得不服从某种有限的活动，因此异化概念才逐渐失去它原来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才说：“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失”^①。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他们刚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概念，来说明他们曾经用“异化”来解释的那些现象。尽管“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也出现过，但只是在一定意义上使用的，这个术语为其他更为科学的概念所代替则是无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异化概念即便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也很难说是始终如一的。资产阶级新黑格尔主义者把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概念同黑格尔的异化观念完全等量齐观，进而又将它说成是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概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素以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阐释者”自诩，然而却无视上述这些基本事实，足见他们所谓的“阐释”，充其量不过是蓄意伪造罢了。

（三）

资产阶级伪造青年马克思的另一基本派别，与存在主义相联系。其特点是在人的问题上把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混为一谈，用所谓“个人”问题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篡改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一种反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

哲学派别,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年代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对革命群众的斗志起了极大的麻痹作用。存在主义,故名思义非常强调“存在”,因而是非常唯物的了。其实不然,它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因为它所谓的“存在”,并非是唯物主义用以表示客观实在的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是人的内在“自我”的“存在”。这种“存在”决定其他一切存在,是一切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核心”。所以,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自我”的存在,不仅决定人的本质,而且决定人对客观环境的选择。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者萨特说,“人不外是他自己使自己成为的那个东西”。可见,在解决主客观关系问题上,存在主义立足于“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同费希特的“自我”,同曾经对青年马克思发生过影响的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是本质相通的。现代存在主义者抓住当时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进行所谓“新的解释”,以便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

这种图谋,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展开,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存在主义“解释”的热潮。战后不久,法国人格主义首领E·穆尼哀公然宣称:“最近一些年的任务,无疑在于把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创始人)调和起来。”^①要创造把“青年马克思”伪造成存在主义创始人的“奇迹”,正象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不通过诡辩简直是不可能的。

首先,他们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歪曲为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也即歪曲为存在主义。毋庸置疑,费尔

① 转引自捷·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74年俄文第二版导言。

巴哈是特别注重人的存在的，但是，他并不否认不依赖于人的主观的客观事物的存在，而且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他在分析人的存在时，首先认为人是一个自然的、在时期和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肉体；然后认为人的精神——灵魂依赖于肉体。他激烈地抨击了那种使肉体屈从于精神的唯灵论。不言而喻，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在存在主义者眼里，费尔巴哈主张人的存在，把人作为研究中心，就是肯定人的内在“自我”。而这个抽象的精神的“自我”是先于其它一切存在的存在。这样，费尔巴哈就变成一个十足的存在主义者了。

其次，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进而把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确实存在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因素，硬说成是费尔巴哈观点的彻底发展，从而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上升为存在主义的完备学说。例如，新托玛斯主义著名代表人物哥斯塔夫·威特在“解释”马克思早期著作时，断言青年马克思丝毫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的观点，只是“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原理，从宗教范围移到社会理论范围。”^①当他们从《神圣家族》中发现马克思转述费尔巴哈这样一个观点：“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②时，更是如获至宝，立即作出存在主义的“解释”，甚至宣称“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包含着即使在现在也绝没有过时的原理”^③。其实，马克思即使在这些不成熟的著作中关于人的观点，不仅根本不同于存在主义，而且也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

同新黑格尔主义者对青年马克思的赤裸裸地伪造不同，存在

① 哥斯塔夫·威特：《辩证唯物主义》，1958年英文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③ 考·格·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1955年德文版，第33页。

主义者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以混淆视听，掩人耳目。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露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时，批判他把“国家意识”仅仅归结于一个“单一的”、排除了其他一切人的君主身上，也就是批判黑格尔关于“朕即国家”的观点，指出“单一的”个人、脱离了经验的人的“人格”，只是一个抽象，但是人“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是现实的。^①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仍使用着费尔巴哈的术语，但他初步表述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合理思想。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该书《导言》中所阐明的重要思想：“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②，存在主义者H·帕皮茨无视马克思这一重要的思想萌芽，相反地由此得出结论，似乎马克思与存在主义者一样，“在个体本身中找到了人的本质的统一”^③，硬把存在主义观点强加在马克思头上。

帕皮茨之所以能把马克思的观点歪曲为存在主义的东西，就是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我们知道，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把个别对象的一般属性夸大为不同于个别对象的存在。同样，存在主义也不承认任何离开个别而存在的一般事物。这是否可以认为，马克思同存在主义者一样肯定个别而否定一般呢？断然不可。因为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地割裂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只承认个别的“自我”的存在，而否认一般事物的存在。不仅如此，而且把一般完全归于个别，甚至把社会也归于生物学上的个体，把社会仅仅看作表现个人本质的环境。这里，充分暴露出存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7页。

② 同上，第452页。

③ H·帕皮茨：《异化了的人》，载《哲学研究》，巴塞尔，1953年第2期，第75页。

相反，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他否定一般事物的特殊存在，就象它在黑格尔那里所表现的那样，但不否认一般事物本身的存在。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那种离开个别的作为特殊存在的一般，而不反对与个别相联系而存在的一般。正是基于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马克思阐明了个人生活与“类生活”、即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指出个人生活是较为特殊的类生活，而类生活是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①论证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但如此，马克思这时已经发现，社会决定个体的本质。他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②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断，同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哲学说教，其最高原则就是视“个人”为存在的“本体”，从而一切事物，一切存在，包括人的肉体，都离不开个人的“自我”。因此，他们不仅通过诡辩伎俩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歪曲为仅仅是承认“个人”的存在，而且也把它归结为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德国存在主义者 H·莱希公然宣称：“马克思把人的感觉、情绪不简单地理解为人本主义的规定，而理解为真正本体论的实质特征。”^③这就是说，马克思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如同存在主义者一样，也把个人的“自我”作为最高“本体”。他们据此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离开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人本学，或曰存在主义类型的人本学。这样就把马克思变成存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这是对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70 页。

③ 转引自依·拉宾：《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1962 年俄文版，第 51 页。

年马克思所进行的最明目张胆地伪造。

无庸讳言,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的问题占突出地位,而且青年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也无疑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相适应的。然而,青年马克思即便在十分强调人的重要意义时,也从未把人的“自我”凌驾于自然与社会之上,视之为一切存在的“本体”。相反地倒是,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因而他没有象青年黑格尔派那样,通过对“自我”的崇拜而返回到费希特主义,而是与之分道扬镳走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到,人和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至于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他在摒弃对人的抽象的理解以后,十分强调社会生活对人的影响。正象他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时所强调的那样,“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①一旦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作了科学分析,并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时,便立即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结论。

对马克思观点形成过程的揭示,就是对存在主义伪造的最有力的驳斥。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不仅没有与存在主义相同的东西,而且正是通过对人的主观主义理解的批判,才产生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概念。所以存在主义者妄图变马克思主义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完全是徒劳的。

(四)

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自六十年代以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在西方特别盛行，深具影响，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时髦的“理论”。

如前所述，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在伪造青年马克思问题上，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同恶相济，相互为用的。所谓“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就是近二十年来新黑格尔主义“同化”存在主义的结果。这种“同化”现象最早由新黑格尔主义者让·伊波利特倡导，很快在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中间得到广泛响应，积极推行这两派相互“同化”的德国存在主义者 H·莱希甚至公开提出，坚决反对那种在“说明”马克思观点形成问题上不愿接受“同化”的陈旧观点^①。他们所以如此热衷于这种“同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只有把这两派结合起来才能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上更加彻底地伪造青年马克思，或如伊波利特所供认的那样，由新黑格尔主义“吸收”存在主义的“成果”，就可以“更好地解释”马克思主义。

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并非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以上两个派别的折中主义的混合物。它标榜克服“片面性”，把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形成“解释”为既非黑格尔的，又非费尔巴哈的思想，而是“费尔巴哈化的”黑格尔主义。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作为辩证论者相提并论，似乎也不否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质的批判，极力造成避免从唯心主义说明马克思观点形成的假象；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摆脱了对费尔巴哈的“自然”因素的过高评价（指所谓的“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而接受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经过这样一番“加工制作”，马克思观点就变成，既不是唯物主义，又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存在主

^① 转引自依·拉宾：《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1962年俄文版。

义类型的人本学”。他们胡说什么，青年马克思试图用这样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哲学，去“填平”由康德掘成的“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鸿沟”^①。在近代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派别都企图通过折中主义“超越”唯物和唯心之上，但其结果，无不一败涂地。马赫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今天，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的境况也并不美妙。他们所谓的“存在主义类型的人本学”，或曰“新的人道主义”，不过象马赫主义的“纯粹经验”一样纯属唯心主义的货色。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②。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割裂两者的关系，摒弃其唯物主义的因素，摄取其人本主义消极成份，这就意味着把人、即存在主义者歪曲了的“个人”，变成“本体”，变成“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③因此，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者不过是重蹈马赫主义的覆辙，用折中主义手法“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罢了。

就其内容而言，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伪造马克思的主要特点，就是将异化纳入人本学的范畴，把异化概念和人的概念一起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内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继费尔巴哈的宗教的人本学之后，又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用于人类社会，说明人的历史发展，从而建立了社会的人本学，或称“人本学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④。只要异化一天不消除，“历史就依旧继续着”。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他们看成人的存在的“自我异化”和人的存在的

① 转引自依·拉宾：《围绕青年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斗争》，1962年俄文版，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④ 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3年版，第23卷，第49页。

“复归”的学说。马克思的“目标”，似乎也只是说明异化的产生和扬弃，只在于“使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和“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是“异化”的理论家，这就是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赤裸裸的伪造。

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者攻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它不仅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从而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且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一种严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代替了用“异化”对历史现象的说明。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用“异化”解释历史的同时，就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人的自我异化中，而是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②。接着，他又把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全部历史的基础”，以此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变成真正的科学。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极力抹煞这一历史事实，同时对人的“自我异化”大肆渲染，险恶用心就在于用他们臆造的“人本学的历史观”去代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产生，同任何一种反动思潮的产生一样，有其现实的目的，这就是直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钝化革命人民的斗志。它主要表现在，用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不仅如此，而且用人受“异化”的程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按照经济地位对社会阶级的划分，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的阶级概念。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归之于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使“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所以他们的全部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预言式的救世主义”和“披着末世学外衣的人本主义”。他们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如此!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的这些“杰作”,能够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完全变成了没有多少遮掩的、全力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

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伪造青年马克思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在手法上更加狡猾,而且在理论上更为系统和反动。所以它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家中,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今天,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早期诸如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概念,以及青年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作具体而深入地探讨,正确阐明马克思奠基人的思想发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的伪造,这无疑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试论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丁 常 春

列宁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比较重视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研究。他的研究每深入一步，就使自己的哲学思想升华一步。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差不多成了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酵母。它使列宁将由实践得来的养分，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树的茎和叶，蓬勃生长，开花结果。因此，从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1907 年。在这一阶段，列宁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著作的研究，结合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初步了解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特点，掌握了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基本出发点。这可说是列宁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准备阶段。

列宁是在同民粹派作斗争中把握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区别的。1890 年前后，民粹派在俄国先进思想界占据支配地位。他们坚决反对唯物辩证法。民粹派首领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加以混同，非难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痛斥了民粹派的谬论。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相反，唯物辩证法是有现实内容的，是以对客观过程的分析为前提的，因而和空

洞的三段式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正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象恩格斯那样为坚持辩证法而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否定之否定)的正确，象马克思那样在《资本论》中“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都不过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它只能起着使俗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的作用，揭去它，丝毫不损害它所包含的科学内容。因此，“责备马克思主义为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①

可见，列宁一开始评述黑格尔辩证法，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指针的。但是，列宁这时还没有直接阅读黑格尔著作，所以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难免一般化。他对黑格尔三段式和神秘主义的批判是完全对的。但是，如列宁自己后来所说，黑格尔也承认，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所以把黑格尔辩证法就当做三段式，显然缺乏分析。他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也是完全对的，但没有充分注意二者在理论上的联系，因而不能认为是全面的。

在这一阶段，列宁还研究了普列汉诺夫批判民粹派主观社会学和伯恩斯坦派新康德主义的论著，表示坚决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适应批判新康德主义斗争的需要，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学习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后来列宁指出，不研究黑格尔，就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康德主义。因为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曾经作过有力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包含着许多有决定意义的内容。因此，“必须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以便逐步地分析康德主义者等等的什么流行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53页。

的逻辑和认识论。”^①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去”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不能在批判“回到康德去”的时候，回到费尔巴哈等人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是要坚定地站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列宁发觉，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黑格尔哲学给以很大的重视，很高的评价，但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新康德主义时，并没有很好地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依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而只能不痛不痒地驳斥康德主义的议论，而不能彻底纠正它的错误。

第二阶段：1908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期。这时，列宁直接研究了黑格尔的《小逻辑》，特别是该书的概论部分（§19—83）。这可说是列宁直接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开始阶段。

黑格尔《小逻辑》这一部分是评述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包括休谟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同时又对辩证法的基本环节作了说明。列宁在批判不可知论和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时利用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

列宁在说明从经验论的前提可以产生唯物主义时，引用了黑格尔的言论。黑格尔在宣称唯物主义是“彻底的经验体系”时曾写道：“在经验论看来，外部东西总是真实的；其次，经验论即使容许某种超感觉的东西，但否认这种超感觉的东西的可知性，经验论认为必须完全遵循属于知觉的东西。而这个基本前提经过彻底的发展，便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②象这样不经过马克思、恩格斯而独立地引用黑格尔的言论，在列宁的著作中要算第一次。

列宁在论述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时又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9—1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5页。参看《小逻辑》§38。

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①

这里所引用的观点,是黑格尔在分析辩证法的抽象知性——否定的理性——肯定的理性这三个环节(§ 80—82)时提出的。他认为,知性肯定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的固定差别,坚持非此即彼的观点。这种观点夸大了,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形而上学的特点是把知识、概念绝对化。辩证法的第二个环节是否定的理性(辩证的阶段),它否定有限的规定和概念能够孤立存在,认为一切规定、概念都是相对的,都会扬弃自身而过渡到它们的反面。怀疑主义,就是把否定的环节夸大了,坚持“单纯的否定”的观点。辩证法的第三个环节是肯定的理性,它不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在“肯定中即包含有它所自出的否定”,从而达到肯定和否定的统一。所以,“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自身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但哲学不能象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否定结果方面。”列宁所引观点,就是黑格尔这最后一段话的概述。所谓“哲学”,就是指辩证法。

黑格尔的观点是很晦涩的,列宁对它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过程,把“肯定”理解为对认识的对象的客观性的肯定,把“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理解为知识的条件性和可变性;并运用这个观点解决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认为它们的区分是这样不确定又是这样确定;阐明了实践标准的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性质,认为它也是这样不确定,又是这样确定,因而既反对了教条主义,又反对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列宁还由此指出了物理学唯心主义是由于不懂得辩证法,经过相对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的。可见,没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最后,列宁还运用黑格尔对概念的辩证分析,批判了旧物理学和旧唯物主义对“物质”概念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指出:物的“实质”或“实体”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承认“物的不变的实质”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联系到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旧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我们有理由推测,列宁在这里正是要用黑格尔体系中的珍珠——辩证法来补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致命弱点。

第三阶段:1914年9月5日至1915年5月上半月。这是列宁系统地研究和全面地阐述黑格尔辩证法的新阶段。短短八个半月,列宁以惊人的毅力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和三卷哲学史,作了许多带有注释和评论的摘要,在许多地方对辩证法作了精辟的论述。对黑格尔著作作如此系统、如此具体的分析,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列宁这部分笔记包含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一)列宁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动因和路线。列宁这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研究黑格尔哲学呢?人们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1)是为了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解决帝国主义战争提出的问题;(2)是为了撰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节。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其实,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系统研究,要追溯到他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学习。1913年9月德

文版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了，列宁做了详细研究，做了长达76页的笔记，并于1914年初写出一篇研究论文。列宁一往深情地写道：“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如此深刻的认识不能不强烈地影响到列宁的思想和活动。

这表明，列宁在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之前已经通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面地研究过唯物辩证法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重读黑格尔的著作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唯物辩证法理论本身及其思想来源。笔记几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5、385、428页）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就透露了这个消息。因此，列宁这一时期的研究路线是由今及古、由近及远。他首先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然后追踪它的理论来源，进而研究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钻研了他的全部逻辑学；接着探索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来源，进而研究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阅读了黑格尔的三卷哲学史。这三卷哲学史是对古代辩证法最系统最卓越的分析，而且处处与当代德国哲学相比较。可是黑格尔的哲学史只是对古希腊辩证法的评述，而不是原著。为了更具体地了解辩证法的第一个形态，列宁又进而阅读了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这种追本求源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说过，人体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掌握了辩证法的最发达最完备的形态——唯物辩证法,就能借助这个钥匙和准则去透视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所包含的辩证法的特征和萌芽。列宁就是这样地看出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的寻求和探索,看出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接近,指出他处处都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这当然不是用唯物辩证法去套用哲学史,而是要了解唯物辩证法是怎样利用过去辩证法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人类是通过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发现唯物辩证法的。

(二)《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联系。这两本书相隔六年之久,可是在内容上是先后连续的。从这两本书的比较中,可以突出地看到,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是怎样促进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

首先,笔记是批判康德的继续。列宁对于黑格尔批判康德的任何一点合理思想,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摘录和评述。列宁并不完全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但是完全赞同康德被批判。不过,这时列宁主要已不是揭露康德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内容,而是挖掘它们的认识论根源;已不是用力肯定康德的自在之物,而是细心挑选黑格尔揭发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矛盾和抽象性的论据。在列宁看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于指出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对立统一。自在之物是现象中的本质的同一,现象是自在之物(本质)的显现。概念不是先天的形式,而是与事物的一定层次的本质相符合的。康德把认识和自在之物分开,结果,一方面,把现象看做不包含本质和自在之物的纯主观经验,把概念看做毫无内容的纯主观形式,另

一方面，使自在之物变成脱离现象、脱离与他物联系的空洞抽象，因而变成不可认识的东西。列宁和黑格尔都批判康德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但列宁是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的，而黑格尔则把知识看做关于神的知识。

其次，继续注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来对自然科学成就作哲学总结。在笔记中，列宁一方面继续运用黑格尔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观点考察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探讨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另一方面又把层次的观点应用于物质结构，指出人对物质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①。并且指出唯心主义的翳障使黑格尔不能发现“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愈来愈远的运动”^②。

再次，进一步发展了哲学党性学说。列宁在笔记中分析黑格尔的哲学史时，一方面继续肯定哲学的党派性，痛斥黑格尔抹煞唯物主义、偏袒唯心主义的卑劣做法，同时又肯定辩证法在两大阵营中交错、贯穿的复杂情况。他特别注意黑格尔对古希腊诡辩学派和怀疑论中的辩证思想的分析。同时，又从认识过程的矛盾中看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样，不是没有根基的，而是生长在同一棵人类认识大树上的不结果实的花，二者是从统一的认识运动中产生的两个相反的派别。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哲学史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互相斗争的历史，又是统一的认识辩证规律的历史。黑格尔肯定后一种情况，否定前一种情况。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全面的分析，既反对只谈认识过程的统一性、抹煞两大派别斗争的客观主义，又反对只谈两大派别的斗争，不承认认识史的统一性的宗派主义，坚持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党性原则和认识论

①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161页。

原则结合起来。

(三)列宁是怎样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指示的。列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著作。他以《资本论》为榜样,把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当做“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过程”的反映,挑选它的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揭发它的辩证法的实质,或摘录重要段落,或概述它的真实含义,或直接采纳他的范畴和命题而赋予唯物的意义,或总结他对概念的分析而提出辩证法的规定,竭力在科学的基础上把辩证法推向前进。因而既不像拉萨尔那样简单地重复黑格尔的观点,在唯心主义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也不象普列汉诺夫那样死盯住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原有的基础上踏步不前。

(四)列宁是怎样巧妙地把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史的研究是在世界大战的环境下进行的。战争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列宁通过黑格尔辩证法和人类认识史的研究而提出的两种发展观、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飞跃及其形式、诡辩论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等等命题,都是当时现实矛盾在逻辑上的反映,也都是对当时思想斗争经验的总结。没有现实斗争提供的问题和养分,单向书本讨生活,决不能从晦涩难懂的黑格尔著作中发现那些活生生的辩证思想,提出那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可是,不研究黑格尔哲学,不掌握他所运用的概念艺术,就不可能使现实的矛盾在概念的逻辑中得到科学的表达,也不可能克服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理论上玩弄的诡辩和折衷主义。狄慈根在概念上的混乱,普列汉诺夫的僵化和堕落,都与他们没有掌握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有关。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的强大生命力。

列宁研究黑格尔著作的结尾阶段，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一阶段可说是列宁研究黑格尔著作的总结阶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虽担负着极其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仍然关心对黑格尔的研究。他曾请求别人给他弄到黑格尔《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的俄译本，同时还对伊林的《黑格尔哲学》感到兴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临终前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该文强调要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要发挥唯物主义的战斗作用，必须继续利用辩证法去丰富它，而要利用辩证法就不能不研究黑格尔。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才能科学地回答现代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才能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坚持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作不懈的斗争。这篇文章是列宁的哲学遗嘱，也是他一生通过研究黑格尔辩证法而捍卫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经验总结。

对黑格尔的研究，构成列宁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结列宁研究黑格尔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要正确理解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就必须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自觉的系统的论述和他对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的总结。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思维对于理论自然科学的必要性时曾指出，把自然科学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可是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而是要求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列宁正是这样做的。他特别注意二千多年来各派哲学家对于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的表达。他从黑格尔对埃利亚学派运动观的分析发现“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①；又从赫拉克利特、亚里士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多德和黑格尔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共同探讨,看出它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认为,“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因为辩证法既然是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它必然会迫使各派哲学家不能不去注意它,就会在具体科学的认识成果中得到表现。因此,从哲学的发展中和从科学的内容中就会看到辩证法是怎样被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把握的,又是怎样在科学中表现的;从人类的认识史和各门科学的认识成果中可以总结人类思维的经验教训,对辩证法作出确切的说明和有力的论证。象普列汉诺夫那样离开认识成果和黑格尔对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来谈辩证法,就难免地把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这就难怪普列汉诺夫竟然把现象的向自己的对立物转化看做“三段式”,看做“从抽象的命题中产生出来的抽象的结论”,甚至认为从“现象的对立性的学说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因此他只能满足于重复恩格斯为使辩证法通俗化而举过的那些成例。

第二,要科学地说明认识史,必须象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哲学史》中所做的那样,抓住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这是因为人类认识史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史,就是主体由现象到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深化过程。列宁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又说《大逻辑》中《观念》的导言以及《小逻辑》中相应的各节,“差不多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而这些阐述的“要义”就是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因此,如果把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推演过程当做人类认识的一般进程,那么,它的各环节(范畴)则“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绝对观念)”的过程。列宁曾把全部认识领域、各门科学史都看做“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具体内

容,那样就会重复旧哲学的错误,把哲学变成“科学之科学”。列宁的意思是要人们注意体现在各门科学中的主观对客观的深化过程。只有这种深化过程才是各门科学共同遵循的规律。而这种深化过程是以最概括的形式反映在逻辑概念上的。因此,研究认识的深化过程,就要研究概念的联系和转化。黑格尔在《逻辑学》的《主观性》中对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作了辩证分析。列宁在总结这个分析时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①所以,通过范畴的演变史,例如比较一下人类是如何理解“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认识论。因此,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通过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统一起来的。离开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去争论这三者是不是一个东西,那完全是烦琐哲学。

第三,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流产表明,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绝不能有任何凝固不变的体系。黑格尔企图建立一个终极的哲学体系,可是,他的企图毕竟是流产了。不过,他的辩证法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这种体系的道路。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辩证法思想都是适应当时实践需要和认识水平而产生的,都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黑格尔总结人类认识史而提出他的辩证法体系,在新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又通过批判地总结黑格尔哲学和整个人类认识的成果而创立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内容上和结构上不断变化。因此,恩格斯有恩格斯的体系,列宁有列宁的体系。甚至列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宁自己的体系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卡尔·马克思》以“否定的否定”开头,提出六条;《辩证法的要素》以“观察的客观性”开头,提出十六条;《谈谈辩证法问题》以矛盾开头,分为四个部分;《再论职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以“全面性”开头,提出四条,试问这些“体系”哪一个是最終最佳的体系呢?!其实,这些体系都是通过对人类认识史,特别是通过对以往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批判地总结而提出来的。因此,对于同一个认识史、对于同一个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而没有穷尽真理。决不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过它,列宁就没有事做了;也不因为列宁研究过它,作过详细的笔记,后人就没有事做了。相反,列宁谆谆教导我们,要继续研究黑格尔,发展辩证法。根据新的认识,建立新的体系。总之,人们对于认识史的认识是永远不会完结的,辩证法的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

列宁对冯特哲学观点的评价

黄 枏 森

哲学史上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唯心主义者们由于某些观点上的分歧，常常互相揭露，互相攻击；他们尽管在正面阐述自己观点时往往是荒谬的，而在揭露和攻击其他唯心主义者时却能击中要害，入木三分。这对于唯物主义是有利的。因此，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过程中，大量引用了其他唯心主义者对马赫主义的揭露和攻击，其中引用得最多的就是冯特的言论。列宁在引用冯特对马赫主义的分析批判时也就对冯特的哲学观点作出了评价。

威廉·冯特(1832—1920)是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有重大贡献，是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列宁认为，作为哲学家，“冯特本人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①，但是他“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第48页)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阿芬那留斯承认：“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和其他研究者(例如，拉斯、马赫、黎尔、冯特)的结论一致的。虽然由于观点的不同，这种一致并不是绝对的”。(转引自202页)所谓“最后结论”，从下面列宁的分析来看，指的就是否定、至少怀疑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者所一致同意的基本原则。对于阿芬那留斯的这个自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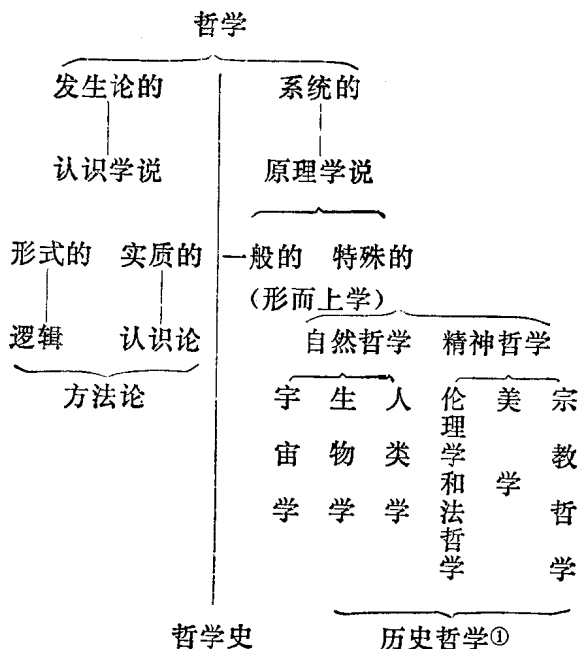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49页。以下此书引文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

列宁是同意的。但是，冯特尽管在唯心主义基本原则同上马赫主义一致，但由于仍有不同观点，故颇能揭穿马赫主义的伪装，抓住马赫主义的本质，不受马赫主义的迷惑。列宁非常重视冯特对马赫主义的评论，把他比做“老麻雀”，指出：“如果年轻的知识分子会上阿芬那留斯的圈套，那末老麻雀冯特决不是用一把糠就可以捉住的。”（第79页）列宁大量引用了冯特对马赫主义“圈套”的揭露。

但是，列宁并没有对冯特的哲学观点作正面系统的介绍。本文拟根据作者对冯特的哲学思想的理解阐明一下列宁对冯特哲学观点的评价，具体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说冯特的唯心主义观点是混乱的？

冯特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作为在心理学实验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心理学家，当然不可能不具有自发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但列宁并不是说他抱有混乱的哲学观点，即既有唯心主义观点，又有唯物主义观点，而是说他抱有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即既有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又有那种唯心主义观点，他的混乱是唯心主义范围内的混乱。从冯特的哲学观点来看，列宁指的应该是这种情况，即他一方面具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思辨哲学、信仰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冯特追随英国唯心主义经验派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认为外部世界不外是我的经验、表象，人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宣称自然科学是符号而不是自在之物的反映，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叫做形而上学，等等，从这些情况看来，他的观点同马赫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又接受了德国的思辨哲学的传统，大谈世界本体，大搞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把他的哲学体系概括如下表：



他大讲宇宙、灵魂、上帝，这些都是一般实证主义者避而不谈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1878年）中曾谈到当时德国有一种创造体系的风气，冯特的哲学体系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冯特生活和活动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完结，思辨哲学再也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冯特同当时的许多体系创造者一样，只能从他的前辈哲学家的思想中，抄袭那些他认为用得着的东西，拼拼凑凑，形成一个所谓的哲学体系。从冯特的哲学观点中，我们发现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特的观点。他是一个道地的模仿者、折中主义者。所以，冯特的哲学观点不仅是经验哲学和思辨哲学的混合，就是作为一

① 冯特：《哲学引论》，1914年第6版，第80页。

种思辨哲学，也是许多哲学流派的混合。他的唯心主义具有双倍的混乱，列宁说他抱有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正因此，冯特的哲学体系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史中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不占有什么重要的地位。

二、冯特哲学观点的基本倾向是什么？

冯特的唯心主义的混乱并不排斥他的哲学观点有一个主要倾向。列宁称他为“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就点明了他的主要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信仰主义在哲学上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冯特把自己哲学叫做“观念实在论”，还算名副其实。哲学史上的实在论有的是唯心主义，有的是唯物主义，问题在于什么是实在，观念还是物质？冯特明确主张观念实在，一切现象都从属于观念，他就用这个名字说明了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

冯特所说的实在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意志。冯特抄袭叔本华，认为绝对的实在，即世界的本质，就是意志，但他强调他所说的意志和叔本华的那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意志不同，它本来就具有智慧的萌芽，是自觉地、有目的地、有意识地活动着的。世界的本质就是由这样的意志个体构成的一个整体，意志个体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在他看来，“只有把最后的意志个体看成彼此不同的，存在的多样性才是可能的，只有这样，意志的相互规定以及由于这种相互规定而产生的更高级意志个体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因此，世界就是“意志活动的整体，这些活动通过意志的相互规定把表象的活动安排成不同领域的意志个体的发展序列”^①。冯特力图把实证主义观点塞到他的体系中去，宣称丰富多采的现实世界

① 冯特：《哲学体系》，1897年第2版，第417页。

就是现象,就是表象和感觉,它是意志个体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的结果。意志的发展最初形成物理世界,即自然界,而后形成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这样自然界就转化成为精神。自此以后,发展过程就不再是本能的,而是自觉的、有计划的、自由的。一切发展的最后目标是实现了一切倾向的充分的和谐和统一的人类精神文明,是一个创造并保持了一切价值的世界,其中最高的价值就是伦理的价值。

冯特一再声明他的“意志”是不神秘的,这是骗不了人的。他的“意志”与叔本华的“意志”同样神秘。冯特的“意志”实际上就是思想、观念,他为了强调它的活动性、冲动性、能动性,便抄袭了叔本华的术语。不管怎样,冯特总是把主观的东西(意志、观念、思想)客观化了,或者把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变化、发展观念化、思想化了,这是道地的客观唯心主义。

为什么意志会这样变化、发展呢?当冯特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时,便暴露出他不仅是一个一般的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且是一个赤裸裸的信仰主义者。冯特认为可以把意志区分为特殊的和普遍的,而普遍性有许多层次,有较低级的普遍性,也有较高级的普遍性,最普遍的意志就是上帝,其他普遍性较低的意志都从属于它。因此,他认为,上帝不是意志个体的总和,而是意志个体的最高综合和统一。这个上帝就是自然的和精神的发展的最后根据,是一切运动、发展、追求、活动、斗争的最后泉源。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归根到底都是这个世界意志——上帝的规律。冯特说:“正如只有原因进入结果之中,原因才能在结果中起作用一样,只有把上帝看作世界意志,把世界的发展看作神圣的意志和活动的展开,上帝的观念才是彻底的。这就是莱辛的真理:人们可以在世界之外设想上帝,却不能在上帝之外设想世界。这样,上帝的观念便转化为最

高世界意志的观念，个别意志从属于它，并在它那里得到一个适宜的独立的活动范围，这同个别意志在整体意志的有限经验形式那里得到这样一个活动范围相似。”^①对冯特来说，这个上帝是绝对地超越的，它不但超越自然界，而且超越精神。对于这种超越的东西，人们怎么知道呢？冯特对此采取了陈腐的回答：从逻辑上说，它是必不可少的假定；从宗教上说，它是必不可少的信仰、崇拜的对象。总之，上帝是必须存在的。这样，冯特就完全堕入了信仰主义的怀抱，他用他的体系为宗教服务，成了教会的有学问的奴仆。

三、冯特对马赫主义提出了怎样的评论？

冯特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而马赫主义的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冯特的实证主义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它具有比较鲜明的唯心主义党性，而马赫主义是主要的实证主义流派之一，以超党性标榜自己，因此，冯特出于唯心主义内部的意见分歧，对马赫主义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评论，而且往往能击中马赫主义的要害，为唯物主义者批判马赫主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参考意见。当然，冯特对哲学史上的各个流派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熟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是他能深入批判马赫主义的一个原因。那么，冯特对马赫主义的评论有哪些可取之处呢？下面我们把列宁曾经提到过的几点概括一下。

冯特对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在原则上当然是赞成的，对马赫主义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少不了称许之词，列宁也提到过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冯特写道：“如果经验批判主义责难庸俗唯物主义，说它用头脑‘有’思想或‘产生’思维等说法来表明那根本不能用事实

① 《哲学体系》，第433页。

的观察和记述来确证的关系[在冯特看来,人不用头脑思想应该是“事实”!]……那末这种责难当然是有根据的。”(转引自第80页。方括号中的话是列宁的评语)但是,“唯心主义者冯特在赞扬阿芬那留斯的嵌入说的反唯物主义倾向后,就毫不客气地撕破了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第80页)列宁指的是什么呢?

原来阿芬那留斯“创造”了一种“嵌入说”,诬蔑唯物主义把本来不属于头脑的感觉放进头脑中,犯了“嵌入”的错误,成为精神肉体二元论,他认为必须加以改正,才能回到一元论的轨道。波格丹诺夫看不出这是一个骗局,不禁赞叹道:“阿芬那留斯给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最和谐最完整的哲学图景。”(第78页)然而冯特却不这样看,他说这种嵌入说“与独立的生命系列的学说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只是在事后十分勉强地从外面加到这个学说中的。”(第80页)冯特认为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生命系列学说是唯物主义观点,因为它承认独立生命系列,即人的大脑,是物质实体,而心理的东西是大脑的机能,但是阿芬那留斯又主张存在的一切都是感觉,环境不能脱离自我,这就是唯心主义的了,这说明马赫主义和臭名昭著的内在论学派是近亲。所以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些方面是唯心主义,而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第49页)列宁对冯特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同意的,应当指出的是冯特的这个看法不够确切,因为它没有指出马赫主义的主要倾向,列宁用更精确的提法纠正了冯特的看法,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哲学中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同上第50页)但是,不管怎样,冯特总是比波格丹诺夫之流高明,没有上当受骗。因此列宁说:“如果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会上阿芬那留斯的圈套,那末老麻雀冯特决不是用一把糠就可以捉住的。”(第80页)“老麻雀”当然不是一个褒词,

然而贬中有褒还是明显的,在列宁看来,冯特这个唯心主义者在识别哲学流派时是颇为精明老练的,不象波格丹诺夫之流那样糊涂和幼稚。

冯特对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思维经济原则、唯意志论的分析,列宁也是肯定的。阿芬那留斯主张自我和环境处于不可分割的同格之中,二者互相从属,自我离不开环境,环境也离不开自我,“对现存的东西的任何完全的描述,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见到的东西的自我。”(转引自第54页)列宁指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任何正常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第57页)列宁还指出,不仅唯物主义者认为原则同格论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些哲学专家,甚至憎恨唯物主义和信奉某种唯心主义体系的哲学家,都一致有这种看法。

列宁第一个举出的就是冯特。冯特认为对现存东西的完全描述是可以摆脱任何观察者的,例如自然科学就完全摆脱任何观察者。冯特认为原则同格论是“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关于这种内容的论断混在一起”(第57页),现实经验的内容并不依存于自我,虽然关于这种内容的论断依存于自我,阿芬那留斯把二者混为一谈,当然是错误的。无疑,冯特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冯特对于马赫主义的“思维经济原则”的评论,列宁也是肯定的。我们知道,马赫主义是经验主义,否定任何先天原则,可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却提出了一个所谓“思维经济原则”作为他们的认识论基础。那么,思维经济原则又来自哪里呢?在经验主义看来,它当然不能来自经验,因为从经验中得不出任何原则,它只能是一个先天原则,这样马赫主义就陷入自我矛盾中了。冯特发现了马

赫主义的这个自相矛盾，这点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因此列宁指出：“唯心主义者冯特根据这个‘思维经济原则’，很恰当地把马赫主义叫作‘翻了一个面的康德’。在康德那里是先天和经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天，因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实质上是先天的。”（第 166 页）

马赫哲学中有唯意志论因素，冯特也指出过这点。马赫主义者喜欢杜撰一些古怪的名词术语，使人莫测高深，其实是虚张声势，借以吓人。冯特也正确地指出“这是最纯粹的晦涩的经验哲学”。（第 82 页）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十分善于利用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他对冯特哲学观点的评论和利用就是最好的事例之一。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规律观的发展

吴振海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观。马克思说:规律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①恩格斯也说:“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②他们结合各种问题,尤其是结合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规律作了深入的阐发。他们认为,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能“创造”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③他们强调指出,即使我们认识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我们也不能跳过被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发展阶段,只能因势利导,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他们在许多著作中还论述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当时主要是反对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因此所强调的主要是规律的客观性,而对规律的其它性质则阐述的不多。列宁说:“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④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7页。

说：“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完全划清了界限。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①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收和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刻地研究和阐发了规律的丰富内容，从规律与现象、规律与本质、规律与运动、规律与关系、规律的作用等方面揭示了规律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观。

列宁指出，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②。在客观世界里，物质运动不断地分化出各种具体形态，它们千差万别，复杂多变。但是，它们的运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能够发现某种共同的东西，在差别性中有同一性，多样性中有统一性，运动中有相对静止，变化中有相对巩固的不变动。每当我们从地面上向天空抛出某种物体时，总会看到它或快或慢地降落到地面上来。所有产生出来的东西，不论是人、自然物体或者某个天体，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发展过程，最后都要死亡或毁灭的。各种现象中所共同具有的这种同一的东西，现象差别性中的同一性，就是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 = 现象的静止的反映”（第 159 页）。“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留着的）东西”（第 158 页）。列宁的这些论断，从规律与现象的关系上，明确地阐述了规律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规律和现象不同，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列宁认为，规律和现象的关系近似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他说：“现象、整体、总体（规律 = 部分）。”（第 160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5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32 页。以下凡引本书的，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现象比规律丰富”(第 160 页)。任何规律都不能反映出现象的总体、整体。规律只能把握现象中静止的东西,只能表现出现象中的内部联系。“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第 159 页)但是,任何规律都要比现象深刻得多。第二,规律虽然和现象不同,但是不能把两者绝然分开。规律不等于一部分现象,但它是现象中的一部分,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而且是不断变化着的现象中同一的东西,“静止的反映”(第 159 页)。所谓“静止”的即是指现象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东西,是现象中巩固的(保留着的)东西,也就是现象的本质的反映。因此,任何规律都具有稳定性、重复性的特点,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要具备了规律存在和起作用的条件,规律就要发生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反复地表现出来。这表明,规律不在现象之外或之旁,而在现象之中。现象是我们认识规律的入门向导。

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第 161 页)。宇宙间千差万别的事物或现象,总是处于一定的关系或联系中的,绝对孤立的同其它事物相联系的物体,是不存在的。“一切都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第 103 页)事物间的联系或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第 239 页)一般说来,事物间存在着个别的、偶然的、外部的、表面的联系,即非本质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内部的、必然的、一般的联系,即本质的联系。列宁讲的规律是关系,不是指规律是事物间的非本质的关系,而是说规律是事物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第 161 页)本质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联系,现象是事物外部的表面的联系。本质具有相对稳定性、普遍性的特点,而现象则是多变

易逝的。现象之间所以具有同一性，乃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只要揭示出这些现象的规律，就能认识它们的本质。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和现象所具有的同一的东西即规律，是表示人对事物认识深化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第 159 页）认识了现象的本质，也就认识了现象的规律。“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第 160 页），“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第 159 页），是现象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东西。

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又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也具有必然性的特点。列宁说：“必然性 = ‘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第 291 页），又说：“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第 434 页）。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客观事物的最广泛的联系之一。必然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由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定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对立面，它是由事物的非本质的原因规定的，是事物发展中并非一定如此的趋势。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是本质的联系，因而也是事物的规律性的联系。事物的规律性，就是事物在一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正因为规律是事物的必然联系，所以它能说明一种现象的变化可以准确地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变化，说明事物的发展前后有连续性，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说明认识了规律就能预见事物发展的将来，说明规律对人类的活动的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当然，我们说规律是事物的必然的联系，绝不意味着否认或低估偶然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偶然性不仅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必然性。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表现自己。

否认偶然性就会这样或那样地否认必然性，当然也不能任意夸大偶然性。夸大了偶然性，把偶然性看得高于一切，把偶然的联系提高到规律的高度，甚至崇拜偶然事件，把成败寄托在偶然性上，势必要否认科学，取消科学，就要陷入非决定论，甚至陷入怀疑论。列宁说：这种理论反对“科学分析现状的可能”，“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①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怀疑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关于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以对规律的认识为根据的。正如列宁指出的：“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第227页），就是提供在规律性中。

规律既然是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那末它就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制作用。它规定和支配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辩证法的规律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向前的，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绝不会倒退到原始社会，尽管在前进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反复和曲折。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的强制作用。任何规律都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总之，稳定性、重复性、普遍性、必然性和强制性都是规律的基本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把它统称为规律的客观性，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内容：第一，规律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都消灭不了的，否定不了的。第二，规律的作用是不依人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2页。

的认识为转移的,不管人们是否认识了它,它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起作用。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认识了规律,人们就能驾驭规律,做自然界的主人;不认识规律,就要受规律的支配,成为规律的奴隶。第三,规律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发生变化的,只是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第四,人们的活动只能服从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否则就要受到它的无情的惩罚。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规律观是批判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的尖锐武器。他说:“规律就是关系。对于马赫主义者、其它不可知论者以及康德主义者等等来说,这点是要注意的。”(第161页)唯心主义包括实用主义、不可知主义认为,规律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创造出来的,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记号、标志,人能消灭规律、改变规律、创造规律。例如休谟,他根本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必然性、因果性。他认为,因果联系不过是人们的习惯的联想而已。他说一种观念总是同另一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总是依次先后出现,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经验中不断地重复,这就是因果联系。因果联系是观念联系的标志、符号,此外再没有别的因果联系。康德也是如此。他认为,知性不是从自然界抽取规律,而是向自然界规定规律。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列宁指出:“……康德和休谟的共有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①这就注定他们必然要得出唯心主义结论。

马赫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的规律观。不同的是它在批判经验的幌子下,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马赫也用“关系”来给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

律下定义,但是否认规律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而认为规律是“函数关系”。所谓“函数关系”,就是把客观世界的因果关系,自然界的规律性说成是数学上的两个变量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列宁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更改名称和术语,称它是什么,也不是对规律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① 承认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关于规律的概念是客观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两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里,列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明确对立起来,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变种。在规律问题上,把唯物主义哲学路线贯彻到底。

列宁不仅展开了唯物主义规律观同唯心主义规律观的斗争,而且展开了辩证法的规律观同形而上学、相对主义规律观的斗争。列宁说:“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第158页)物质世界是各种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而构成的无限的发展过程。人们对某类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对某一发展过程的规律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反复进行研究,透过大量表面现象、偶然的联系,认识了它的本质以后得到的。某一类事物的规律,概括了人们对这类事物认识的成果,是人们对它认识的总结、总计。它对于我们今后认识这类事物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再认识这类事物的其它现象时,必须利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60页。

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一类事物或一个发展过程对于无限发展的世界来说,它是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因此,一个规律的发现,一个科学概念的形成,只是标志着人对整个客观世界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每一类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我们不能用这一类事物的规律代替另一类事物的规律。用战争的规律代替经济的规律,用政治斗争的规律代替经济建设的规律,夸大某一规律的作用,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把对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了。它否认规律起作用的条件性,把规律的作用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无能为力。相对主义则片面夸大规律的相对性可变性,否认规律的绝对性和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规律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又是无条件的;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有条件和无条件的统一。客观世界的规律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因而它同物质一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然而任何一个具体规律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而它又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是客观规律发生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而又是相对的。有条件性和无条件性、相对性和绝对性、历史性和永恒性是对立统一的。物质是世界的主体,也是规律的主体和承担者。物质的具体形态不同,因而每个具体形态的具体规律也就不同。每种形态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自己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在这些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包含着客观世界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永恒的自然规律只有通过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就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具体作用来说,它又具有历史性。永恒的自然规律也就是历史的规律。

不能把历史规律和客观规律对立起来,以规律的历史性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承认规律的历史性绝不要求去掉规律的某些基本

属性。恩格斯说，我们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地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因而也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但是“这些科学并不因为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①历史规律也就是客观规律。规律的历史性表明规律起作用是有条件的，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是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对规律的认识绝对化、形而上学化。列宁特别指出：“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第158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首先是物理学作出了一系列新发现，出现了一系列新事实，自然科学家们由于不懂得规律的辩证法，由于形而上学世界观作祟。把以前人们对规律的认识加以绝对化、片面化、偶像化，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这些新的事实和新的发现，作出了“物质消灭了”的荒谬结论，产生了“物理学唯心主义”。而哲学唯心主义则乘机企图把由于形而上学规律观所造成的危机，硬说成是整个唯物主义哲学的危机，妄图借此推翻整个唯物主义哲学。列宁彻底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规律观造成的危害，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规律观，坚定地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观。他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在否定迄今已知的元素和物质特性的不变性时，竟否定了物质，即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否定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②。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历史教训，它说明不弄清规律的历史性和永恒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法，不批判形而上学的规律观，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律观，就有背离哲学唯物主义路线的危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页。

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体系

郭文卿

列宁(1870—1924)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他为了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出科学的分析,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不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研究了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派别,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提出了许多光辉的辩证法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翻阅多年来我国编译出版的一些哲学著作,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阐述,大体上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基本上根据恩格斯的论述,讲三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第二种情况,基本上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讲四个特征,即普遍联系和互相依存、运动和发展、质量互变、对立统一;第三种情况,基本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只讲一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既然大家都公认,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那么为什么不按照他的系统来讲呢?

当然,也有阐述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著作。但是一般说来,它们只讲辩证法十六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有关论述,好象列宁的辩证法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似的。至于有人说,恩格斯

的《自然辩证法》是列宁逝世后发表的。列宁不知道这一著作，但他的一些论点是和《自然辩证法》相吻合的。列宁和恩格斯一样，曾提出三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否定之否定”。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质量互变规律，列宁是作为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的“实例”来讲的，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列宁是作为事物矛盾关系的一个方面来谈的。他并没有把三个规律并列起来，怎么能够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呢？

其实，对于唯物辩证法，列宁是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这就是他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辩证法的“三个要素”。“要素”一词，俄文是 Элемент，也有部分的意思。列宁提出辩证法的三个要素，也可以说是关于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他讲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只不过是这三个要素的展开。仔细研究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也是根据辩证法三个要素的思想来谈的。因此，对列宁提出辩证法的三个要素的思想，不能等闲视之，应当认为这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的纲要。

有人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些批注、短评和结论，不见得都是“成熟”的，“最终的看法”。这是没有根据的。当然，笔记不等于定稿。但是，列宁这些批注、短评和结论，就我的认识水平来看，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相反，列宁的每一批注、短评和结论，都不是随便作出来的，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的辩证法三个要素的思想，是在差不多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而得出来的结论。中译本的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卷，共973页，列宁是在第957页（下卷第537页）的地方作出来的。足见列宁是慎重的人，有根据的，不是轻率的、偶然的感想。

那末，列宁是怎样按照辩证法的三个要素组成为一个完整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的呢？

一、辩证法“应该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显然这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唯心的，就在于他把辩证法当作“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而唯物辩证法，首先就是要坚持唯物论，因而不能从主观的概念出发，必须从客观的事物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分清界限。

大家知道，黑格尔(1770—1831)是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人。但是，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颠倒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①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现实只是它的外部现象，相反，在马克思这里，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因此，列宁的辩证法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坚持马克思的思想，首先把辩证法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即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这一条，就根本谈不到唯物的辩证法。

但是，怎样从事物的关系和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呢？列宁在关于辩证法十六要素中说了三条，即第一、二、三条。

第一条，“观察的客观性”，即“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②。就是说，辩证法要从事物的关系和发展中去观察事物的本质，不能只看事物的现象。因为只有深入事物的本质，才能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列宁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③如果只从实例和枝节出发，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② 《哲学笔记》，第209页。

③ 同上，第256页。

主义的泥坑。列宁强调这一条，不仅同唯心辩证法划清了界限，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局限性。

第二条，“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这就进而说明事物本质是普遍联系的，而且“总和”就不是机械地凑合，而是一种有机的、必然的联系。列宁说：“客观联系是必然的”^①，他还把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称为“辩证认识的本质”，^②就是这个道理。明确了这一条，也就不仅同形而上学相对立，而且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分清了界限。因为同形而上学相反，折衷主义诡辩论也承认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但不是内在的、必然的有机联系，而是主观的、任意的拼凑，貌似联系和发展，实则是孤立和静止的看问题。过去讲辩证法，对这一条往往注意不够。但是，由于辩证法的胜利，形而上学就容易以诡辩论的面貌出现，因而不能不加以注意。

第三条，“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事物是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外力的推动。这不仅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且与唯心论和宗教有神论相对立。形而上学把事物运动的原因归之于外部推动，唯心论和宗教也是如此，不过它们把外部的动力“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③。列宁说：“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动机’——‘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难解的（晦涩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发、理解、拯救、解脱、清洗这些实质，马克思和恩

① 《哲学笔记》，第72页。

② 同上，第140页。

③ 同上，第362页。

格斯就做到了这点”。^①可见，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捉住了黑格尔主义的这个实质，因而能够真正作到从事物的关系和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达到彻底的唯物主义。

二、辩证法是研究“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而所谓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也就是“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都有这种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②又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③因此，从事物的关系和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最根本的就是要研究事物本身的矛盾。

但是，怎样研究事物本身的矛盾呢？列宁在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中也提出了三条，即第四、五、六条。

第四条，要研究“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④因为事物的本质都存在着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倾向或方面，所以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列宁说：“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⑤他列举了数学中的“+ 和 -，微分和积分”、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离”，以及社会科学中的“阶级斗争”等实例加以证明，足见矛盾的普遍性。

第五条，“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⑥列宁在

① 《哲学笔记》，第 121 页。

② 同上，第 210 页。

③ 同上，第 361 页。

④ 同上，第 209 页。

⑤ 同上，第 362 页。

⑥ 同上，第 209 页。

“对立面”和“统一”下面打了着重号，说明不仅要在事物的自身同一中看到对立，而且还要在对立的倾向和方面中看到统一，因为“对立面是同一的”。对于“同一”和“统一”，列宁说：“这两个名词……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①但是差别还是有的。同一，俄文是 Тождество，有同一性、统一性的意思，也有“同样”、“一样”、“恒等”的意思，而统一，俄文是 единство，就是“统一”、“一致”的意思。列宁有时通用，有时分开。要在同一中看到对立，这里的“同一”是同样、恒等、自身等同的意思，而要在对立中看到统一或同一，则是另一种意思，即不是绝对的对立和分开，而是相对的对立，既对立又不对立。

列宁非常重视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他说：“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统一的，又怎样成为统一的（怎样变成统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统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②。可见，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由对立面的统一所决定的，所以，它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第六条，“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③不仅要研究对立面的统一，而且要研究对立面的斗争。因为对立面之所以统一，就在于它们的斗争。没有对立面的斗争也就没有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规定着事物发展的状态，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列宁既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列宁在“斗争”一词上打了引

① 《哲学笔记》，第362页。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209页。

号,说明这里的斗争,并不是通常的打架,而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意思。只有对立面既斗争又统一的观点,才能说明事物自己运动及其运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样,列宁就全面地论述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法则。

三、辩证法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的认识论。列宁把这一条作为辩证法三要素之一,又是十六要素的第七条,说明它是唯物辩证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过去有的哲学书上根本不讲分析和综合,有的虽然也讲到了,但只在认识论中提一下,因此不符合列宁的辩证法思想。

实际上,黑格尔就很重视分析和综合,并称之为“绝对的方法”或“哲学的方法”。他说:“绝对的认识方法……是分析的。……又同样是综合的”。“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应该叫做辩证法的环节”。^①列宁正是根据黑格尔这个思想把它作为“辩证法的规定之一”,并且指出这是“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②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解释说:“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③分解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又把各个部分联成统一的整体,这是认识过程的两种不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不仅在于把互相联系的原素综合成为统一体,而且也以同样的程度来把认识的对象分解成为各个原素”。^④认识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达到客观真理。讲辩证法而不讲分析和综合,就不是把辩证法当作“认识的规律”。列宁早就指出:“辩证法也

① 《逻辑学》下卷,第536—537页。

② 《哲学笔记》,第208页。

③ 同上,第209页。

④ 《反社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

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们常说列宁的一个著名论断,即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也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因为这里所说的“具体分析”,并不是单纯的分析。只要看一下列宁怎样提出和说明这一论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他是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的文章《论议会制问题》时提出的。他指出,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别是臆想出来的;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没有注意最主要的东西。“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①。可见,列宁是在方法论上批评了贝拉·贡的文章脱离实际,既没有分析也没有综合,因而不能通盘考虑,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因此不能忽视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四、辩证法的主要任务是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研究事物各方面的矛盾,揭示事物的互相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规律。辩证法的要素只是说明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没有揭示事物本身在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中有什么规律,因此必须进一步揭示事物本身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此,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又说了九个方面,即第7—16条。其中包括一般和个别、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有限和无限、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否定之否定、形式和内容、质量互变。当然,并不是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07—308页。

事物的矛盾规律就只有这一些，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的。不过，列宁在当时只列举了这九个方面。

但是，过去除了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称为辩证法的规律之外，其他一般都叫作辩证法的范畴。仔细研究列宁的思想，他并没有作这种区分，因此可以统称为规律。因为规律和范畴两个概念在列宁那里是不同的。他说：“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留着的）东西”；“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①。列宁列举的上述九个方面都符合这些定义。而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因此可以说，范畴是事物本质的规定，规律是事物本质关系的反映，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从列宁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来看，其他规律都是它的表现，或者叫作一般规律。

现在可以看到，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不是零乱的，而是系统的，他有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我们应当很好地研究这个体系，给它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史上以应有的地位，以便全面而准确地加以理解、掌握和运用。

① 《哲学笔记》，第132页，第135页。

② 同上，第68页。

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宋一秀 许全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该时代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它既是人类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又是那个时代群众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因而具有自己时代的特色。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决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重复或机械的套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回答了新的问题，概括了新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新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99—500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强调指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离开它,就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神秘的抽象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因此,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揭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就必须把握“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才能正确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而认真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课题。

那末,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在其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指表现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主要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内容。这种特点,不仅为具体的历史时代所规定,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共产党的具体实践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辩证统一,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先后批判过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过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批判过资产阶级哲学

界和自然科学界的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以及新康德主义等等。而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先后批判过俄国的主观社会学、马赫主义，第二国际的庸俗进化论、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等等。但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共同点，主要是以公开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根据思想论敌的特点，他们主要是从理论形态上粉碎他们的奇谈怪论，而且在批判时主要也是联系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来进行的。他们主要是以总结这方面的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在共产党内，再以公开的露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已不再仅仅在理论领域，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因此，问题不在于理论上或口头上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主要在于在实践上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深入发展的必然。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我们党内无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口头上甚至在理论上都承认唯物论和辩证法，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唯物主义前提。但在实践活动中却往往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结果导致在政治路线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彻底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算了错误路线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世界观上清算错误

路线，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我们党所遇到的思想论敌，虽然也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公开宣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但在革命队伍内部和党内却主要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所批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以学术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形式出现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在稍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表现形式的本本主义。他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②根据中国革命血的经验教训，他反复强调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的原则，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为此，他把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深刻阐明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理。阐明这个真理，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的思想路线，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89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5页。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因此,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要是依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假如我们不了解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成果,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和领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重大发展的话,那末,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主要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假如我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不了解用鲜血换来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也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和领会《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新贡献。因此,只有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全过程,才能真正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二,从哲学理论形态上系统地论证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突出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创始人,把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他们在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第一次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必须把认识的能动性应用于反映论,即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指明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等等,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列宁所处的时代,认识论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焦点。当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

狂进攻，其目标集中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列宁以极大的勇气迎接了敌人的挑战，在百忙中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列宁不仅提出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两条认识路线的基本区别，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②如此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列宁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基础上，因此，他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的辩证途径等问题，都未来得及充分地、系统地展开论述。这就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化的任务。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正如列宁所说：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而特殊”而又“特别崇高的任务”。因此，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最重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犯右倾错误还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要“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为了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引导群众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进行详尽的系统的阐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直接完成了列宁所提出而未完成的任务。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基本内容；指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系统地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详尽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论根源，等等。这表明，《实践论》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反复强调指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论断，把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指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并且进一步指出，不仅人的总的认识过程存在着反复性和曲折性，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强调指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要在全党进行认识论的教育，指明智慧来源于群众，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群众，等等，从而系统地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实践论的根本特征。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论上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科学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系统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历史唯物论高度统一起来。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规定的，同时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集中地论述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个突出特点。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研究了科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了旧哲学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而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哲学上引起了巨大的革命。鉴于黑格尔用唯心主义把辩证法神秘化,搞得混乱不堪,晦涩难懂,为此,马克思于1858年1月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辩证法专著。^①可惜马克思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恩格斯第一次给辩证法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从而提出了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研究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列宁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因而各种矛盾具有多方面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为了斗争的需要,列宁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注意研究辩证法。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和发展,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还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② 《反杜林论》,第139页。

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列宁对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作了初步的“说明和发挥”，但由于是纲要式的短文，未能系统地展开。根据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来看，他有一个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宏伟计划，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繁重的工作，致使《哲学笔记》成了列宁未完成的辩证法论著的宝贵遗产。

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最激烈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极为奇特的图画。在这里，既存在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整个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存在着中国各反动军阀之间的矛盾，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纷纭复杂相互交错的矛盾，其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是世界所罕见的，这就使得中国成了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这种客观世界复杂的矛盾运动必然要在哲学上反映出来。但在这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体中，如何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中，捉住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辩证法，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它是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专著。在《矛盾论》中，对于涉及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都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来进行阐述的。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及其他基本原理。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从本本出发，完全无视中国社会的矛盾特殊性，否认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致使革命不断遭受挫折和损失。因此，从理论上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阐明矛盾特殊性及其重要意义，阐明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的相互关系，坚持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就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最为注意的方面，或者说最为突出的方面。

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流行着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否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思想，反复教育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要应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观察和分析国际斗争中的新矛盾。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就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极为突出的方面。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是应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来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代表作。

然而，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都十分注意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研

究,并强调指出矛盾的共性个性、普遍特殊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一个新概括。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推广应用于军事斗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的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地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斗历程中,实现了恩格斯的光辉的预言。

由于旧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进行长期的、持久的革命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全面地总结了中国的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阐明了革命战争的辩证法,领导和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生动的应用和发展。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就为我军制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后，就形成了一整套作战原则。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与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一篇著名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活生生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研究战争的科学方法，阐明了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才能认识战争规律，以及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认识战争规律的全过程，指明了战争中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以及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极端重要性，论述了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持久与速决、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等等的辩证关系。可以说在这部著作里已孕育着一年后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它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篇。也可以说，它是论战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是应用唯物辩证法揭示战争发展规律，批判战争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根本规律，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论述了战争中人与物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的决定作用，阐明了战争中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相互关系，以及战略战术中进攻与防御、内战与外线、持久与速决、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等等对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说《论持久战》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续篇，同样，也可以说，它是论战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的形势和规模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同党内错误的军事路线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反映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它虽然文字简短，但却系统地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并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还揭示了战斗中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指出要从发展观点看问题，阐明了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质变与量变、根据与条件的辩证关系。总之，它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行动纲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体系，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离不开《资本论》的话，那末，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则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学的典范，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同样地也离不开研究这些重要文献。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发展的一种必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五,致力于哲学的解放,把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极为鲜明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说得对:“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时也说:“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自己的影响,日益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都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哲学的研究、宣传。但是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还被反动当局视为毒草,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它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播,根本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普及。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反复阐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一再号召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延安杨家岭居住的一段时期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后来还倡议成立新哲学学会,并亲自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唯物论,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全党学习唯物论、学习辩证法,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运动，也就是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又把在全体人民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把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队伍，看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又说：“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还说：“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可分割的一致性，阐明了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内在联系。

在1957年，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号召全党：要按辩证法办事，要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家逐步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一九五七年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②

在1963年，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对我们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145页。

② 同上书，第498页。

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①他再次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的伟大号召。可见,致力于哲学的解放,也就是哲学的群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深入地和群众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必然。

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这就要求哲学工作者克服从旧的思辨哲学那里遗留下来的,用那种群众所不熟悉的材料、言语讲解哲学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就指出:“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辩证法的书。所谓善于讲辩证法的书,在于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给李达的信中,对李达能“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极为赞赏,并提出要多写些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的文章,以满足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需要。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提出要搞实际的哲学,要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他自己的哲学著作和讲话,都是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结合实际工作和生活,用大家所熟悉的丰富材料,所喜闻乐见的言语,生动、形象、富有趣味、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哲学道理。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旧式思辨哲学,不是书本上的哲学,而是实际的哲学,群众的哲学。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84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9月11日。

为了哲学的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许多谈话和文件里，反复强调学哲学、讲哲学。他亲自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实践，指导自己的工作，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哲学的解放，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将成为哲学的世界”的预言，在中国将逐步成为现实。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的新贡献

崔自铎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那时，正值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烽火刚刚点燃之际。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六个年头的斗争锻炼，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同国内外敌人斗争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因为从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同国内外敌人、同党内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其中尤其是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了彻底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不仅需要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组织路线上，而且非常需要从理论上、哲学上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适应上述需要而发表的。这两本哲学著作，不仅从世界观高度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经验，而且也总结了我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应当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宝库。这里我们应当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和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这一理论发展的必然性。

《实践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继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之后的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践论》重新发表时，苏联《真理报》曾经郑重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的”。

然而，时过三十年，苏联的某些哲学家出于反华的政治需要，却对《实践论》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妄图把一个影响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伟大哲学文献——《实践论》一笔勾销，攻击《实践论》是“对认识论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考察”，是“‘狭隘’思想”，说什么《实践论》对“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简单解释，并没有超过德谟克利特的水平或儒家水平”等等。

然而，真理毕竟是真理，任何攻击和诽谤都不能摧毁它。历史已经证明，《实践论》是一篇光辉的马列主义认识文献。它所阐述的许多认识论思想，不仅系统地总结了马列主义认识论已有的原理，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对马列主义认识论有着创造性的发挥。这一发挥的历史根据，就在于它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于它是对中国两条对垒的思想路线激烈斗争中提出的重大认识论问题的回答。比如，理论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书本还是实践？认识的过程是怎样的？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呢？还是从书本到书本呢？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基础是什么？一个理论，一个主张和观点的真理性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检验？靠某个伟大

人物，还是靠实践？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认识论课题。“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能正确地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在实际上坚持着一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它的特点，就是象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①

毛泽东同志的批判是中肯的、正确的。他的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对中国革命实践所提出的重大认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有些苏联哲学家说什么《实践论》抄袭了苏联某哲学家的小册子，纯属无稽之谈。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性原理是：物质世界是发展的，人们的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71—272页。

社会实践也是发展的，而随着客观物质世界及实践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人们的认识和科学理论的新发展。既然谁也不可否认这个真理，那么也就不能不承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哲学理论来说，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究竟有哪些重要贡献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好好地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重大贡献的。一谈到贡献，人们往往只是看他在理论上提供了哪些新发展，即是说，他对这门科学所作出的新概念、新论点、新原理、新体系是什么？其实这只是贡献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理论方面，尤其表现在实践方面。这里，我们仅就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谈一点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两种倾向都是不好的。第一，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一切认识论问题上都有发展，任意拔高。这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认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几乎毫无发展，什么都是马、恩、列、斯讲过了的。这也不符合实际。这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对“发展”一词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主观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作祟。打倒“四人帮”之后，为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创造了条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了。也就是说，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不应当把它当成一个盲目崇拜的对象，而应当作为一门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把它仅仅作为注释的对象，而应当把它作为发展的对象；不应当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学习宣传对象，而尤其应当作为一个指导实践的革命学说。总之，还是那句老话，马列主义不是教

条,而是革命的理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哪些最突出的新贡献呢?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同志把实践和认识(即知和行)作为认识论的基本矛盾来处理,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同时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把科学的实践观点纳入了认识论,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旧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主要的缺点,就是不懂得科学实践的概念,不能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对于实践有过一些合理的猜测和好的见解,但都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科学的水平和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谈到过这点。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哲学路线又向前推进了它。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并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同志则紧紧地抓住实践和认识(知和行)这个矛盾,将它们视为认识论中的一对主要矛盾来加以全面地考察处理和发挥,形成了一个以科学实践为特征、以实践与认识相统一为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实践不仅有主次之分,而且有类别与层次之分;在实践与认识关系的问题上,实践不只是作为认识的基础、动力、目的和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而且认识又对实践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事物的发展还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第二,由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向前发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4页。

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关于实践与认识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关于实践形式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关于真理与谬误的辩证法；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亦即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等等，都是新的条件下，依据实践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所作的新的总结和科学概括。这就对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而后又为列宁所发挥的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作出了新的发挥。使列宁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思想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认识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①。在写作《实践论》时，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公式。但是，在这本书中，已经包含了上述公式中的基本思想。如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就曾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就是“离开了社会的实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已经注意到了个人实践与群众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六年之后，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73页。

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观点紧密地结合为一体,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宝库增添的新财富。当然,以上两个公式既不完全相同,也不是各不相干的,而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阐述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道理。一个公式是从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阐述认识发展规律的辩证法;另一个则是从认识的基本主体——群众与个人的相互关系来阐述认识发展规律的辩证法。它们之间既是有区别的,又是紧密联系的。这是由于无论是认识或实践,也无论是“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都离不开群众这个认识和实践的主要主体,即认识和实践都是由群众来实现的。就认识的过程说,“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公式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从一方面看,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又分别在不同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揭露和解决自身的矛盾,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既不断地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实践与认识的矛盾,又不断地解决群众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又坚持了群众路线;既提高了认识,又改造了客观世界;既改造了主观世界,又改造了客观世界。这就是以实践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54页。

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

另外，在以后的年代，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还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的理论，他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对于做好革命工作、改造世界都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吸取群众的智慧所总结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点面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对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新发挥。

应当看到，以上毛泽东同志所阐述和发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思想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都突出地表现出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易于为群众所接受、所理解、所掌握的原因所在。例如，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扼要地、通俗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认识论的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什么是“实事”？“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及其客观规律；“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认识；“是”，就是人们通过探索、研究和认识而获得的关于事物及其规律的知识。在此，毛泽东同志只用了一句成语，就扼要地说明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道理；说明了坚持以科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去探“求”客观辩证法的道理；说明了唯物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道理；说明了主观辩证法基于客观辩证法以及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统一的道理等等。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对矛盾同一性 “第二种意义”的历史考察

王永祥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包括对立面双方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这样两种意义。很明显，这是科学地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学说的思想。因为他是根据列宁下面这段话展开的。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因此，列宁也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应当包括对立面互相转化这个“第二种意义”，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只有这样理解，才不致把对立面看作是死的、凝固的东西，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也只有这种观点，才反映了各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而不是把各种事物看作彼此孤立的、静止不变的东西。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

但是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本否定矛盾的同一性应当包括对立面的转化，并且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矛盾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5页。

向对立面的转化,但从没有把转化归结为同一性;他们在讲到同一性时,也没有将转化说成是同一性的表现。如果真的这样,“相互转化”就不能“成为同一”,按照列宁上面的说法,辩证法学说也就成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几位辩证法家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历史考察,看一看他们是否真的把对立面的转化排斥在矛盾的同一性之外。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抽象同一是“排斥一切‘异’的‘同’”,具体的同一则“包含有殊异于其自身”。^①有的同志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具体同一性和抽象同一性的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包含转化,并由此否定黑格尔的矛盾同一性包含对立面转化的涵义。但是这种看法误解了黑格尔所谓“包含有殊异于其自身”的意思。因为他这句话的本意恰恰说明具体的同一性应当包含转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同一,一般讲来,乃是一否定,不过不是一抽象的空的无,而是‘有’及有的特性之否定。这样说来,则同一便同时是自身关系,甚或是否定的自身关系或自己与自己的区别了。”^②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是把区别(即差异、殊异)与自身相关的否定看作一回事。而与自身相关的否定,不包括转化又怎么可能呢?第二,再看黑格尔对差异本身的说明。异,黑格尔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异”,又叫“杂多”,这是各自独立的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之异。这种异是外在的,因而不是他所说同一本性所包含之异。二是“本质之异”。这种异“有肯定与否定两面”,每一方都藉对方反映自身,并由于对方的存在而保持其自身的存在。黑格尔又把这种本质的异叫做“对立”。在对立中,相异者“每一方面都是对方自己的对方”。这也就是黑格

①② 《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58、259页。

尔所说同一本性所具有之异。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相异者每一方“只由于对方的存在而保持其自身的存在”，“每一方面都是对方自己的对方”^①，正是说每一方面都在向着对立面发展，亦即向对立面转化。

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旁证。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论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指出，差别是和谐的本质，而“这个和谐正是绝对的生成、变化，……本质的东西是：每一个不同的、特殊的事物和他物有区别，但并非抽象地和某个他物有区别，而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区别。每一物存在着，只因为它自己的他物自身包含在它的概念中”。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摘录了这段话，并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在这里表述的辩证法思想。他批注道：“非常正确而且重要：‘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发展”。^②可见，在列宁看来，黑格尔的差异包含有对立面转化的涵义。

只要读一下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就会发现，黑格尔不仅在上述的许多论述中一般地表达了辩证同一性包含对立面转化的涵义，而且在论述质量互变规律时，还明确地把质与量的互相转化视为质与量的同一，也就是把对立面的转化看作对立面的同一。例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指出，质与量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第一种是在尺度内的质与量的关系；第二种是一定量的变化也是质的变化。对于第一种可能的关系，黑格尔说：“在尺度中所具有的质与量的统一，最初只是潜在的，尚未显明地实现出来。”^③为什么？原来在尺度中统一起来的质与量各有相对独立的效用，因此，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增减不会影响到质的变化，另一方面，这

① 《小逻辑》，第 26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88 页。

③ 《小逻辑》，第 244 页。

种量的增减又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所以在最初看来好象是无足轻重的量变后面就潜伏着向质变的转化。这就是黑格尔把这种关系称为潜在的同一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一旦量变超出限度，即达到那个一定点，这时一定量的变化也就直接是质的变化，因而这时质与量的潜在同一也就变成了显明的实现出来的同一。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质与量的第二种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同一。对于这种质与量的互相过渡，黑格尔又把它们叫做无尺度，“无尺度仍然同样是一种尺度〔或质量统一体〕”。^①由此可见，在黑格尔看来，由质转化为量和由量转化为质的过程，都是质与量同一的实现，即表现。这也就充分说明，黑格尔强调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也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怎么没有把转化归结为同一性呢？

现在我们再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时指出：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初起，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②

这里的“初起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是指在封建社会的作坊内资本主义刚萌芽时期的情形。这显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直接统一”。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式出现和确立以后就不同了。这时，一方面是只有资本家拥有资本和生产资料，但他们不从事劳动；另一方面，工人则一无所有，他们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干活，才能取得自己生存的生活资料。所以说

① 《小逻辑》，第2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页。

这时资本和劳动就“分离和异化”了。但这时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间接统一”(即间接同一性)。马克思在第一个手稿里曾谈到:“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的人数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①在第二个手稿里他又谈到:“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②这都是对资本和劳动“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这种间接统一性(同一性)的表述。实际上也就是说,资本与劳动(劳动者)的互相转化和在转化过程中不断加大对方的过程。这个过程后来在《资本论》中有了更加科学而明确的阐述。他说:“一个货币总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对于一个要当作资本来发生作用的价值量来说,是它所通过的第一个运动。……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某种价值比构成部分的价值更大,因而包含原垫付资本加一个剩余价值的商品时宣告终结。然后这种商品……必须卖掉,把它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面,这个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并且这样不断重新反复下去。”^③实际上也就是资本经过中间环节转化为工人的劳动,然后劳动又经过中间环节转化为一个更大的资本,这样一个循环往复、在不断地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彼此交替地加大对方、提升对方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在一极是资本的积累、在另一极是相应的贫困的积累的过程,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和劳动的间接统一性(同一性),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各经过中间环节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过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生产与消费的同一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2页。

② 同上,第104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17页。

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①也是指对立面的转化，即是说当每一方在实现自己的同时也就向自己的对方转化了去。

恩格斯在对抽象对立观的批判中，对于辩证同一性包含对立面转化的涵义有更加明确的阐述。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指出：“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②类似的论述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有。他在1891年11月1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谈到黑格尔的《小逻辑》时也指出：“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转化为另一面，如此等等。”^③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辩证的对立观看来，一切对立都是相对的，两极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为什么说这表明了矛盾同一性包含对立面转化呢？这是因为所谓抽象的对立观也就是抽象的同一观，两者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同一个问题罢了。抽象的同一观从“同一”的角度否认事物是矛盾的同一；抽象的对立观则从对立的角度否认事物是矛盾的同一，因此两者从不同的角度都否认事物是矛盾的同一。与此相反，辩证的同一观是从同一的角度说明事物是矛盾的同一，而辩证的对立观则从对立的角度说明事物是矛盾的同一。因此，恩格斯对抽象对立观的批判和对辩证对立观的阐述，也就是对抽象同一观的批判和对辩证同一观的阐述。

对此，我们可以用恩格斯把对抽象对立观的批判等同于对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2页。

象同一观的批判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已经指出：“对综合的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任何一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够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已经在实践中被排除，但是在理论中，它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①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非常明确而肯定的，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一致。例如，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不但一般地指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其中就包含对立面转化的涵义，而且在谈到“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时，还明确地指出，其中就包括“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②这也就是说，对立面的同一包括对立面转化这种联系在内。

有的同志认为，联系不包括转化，说作为同一性的联系是对立面双方由此达彼的“桥梁”，而对立面的转化则是经过这个桥梁向对方的“过渡”，“过渡”与“桥梁”显然不是一回事。这是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而没有了解联系的本质。其实，联系从来就是一种动态，而不是一种静态。列宁在专门论述联系与转化的关系时还指出：“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③；又说：“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④这才是对联系本质的真正揭示。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按照他的论述，显然就是说，事物是有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千万次地转化而互相联系起来；因此，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都包含着转化，在一定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③ 同上，第103页。

④ 同上，第192页。

下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联系也就是转化,任何事物正是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如果两个事物不能转化,甚至没有任何转化的可能,那么它们之间又怎么会有联系呢?由此可见,当列宁把辩证的同一性归结为联系的时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立面转化的涵义。因此,否定作为辩证同一性的联系也包含转化的意思,不符合列宁的原意。如果否定联系也包含转化,那末这种联系就是抽象的联系,而不是具体的联系,因而不是辩证法的联系,而是形而上学的联系。

有的同志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对立面的转化与“同一性”并列起来,因而断言他们没有把对立面转化看作同一性的表现。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中关于对立同一规律的表述为例,他说:“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①似乎恩格斯在这里把对立面转化和同一性“并列”起来了。但是,只要把它和恩格斯在“辩证法”一文中关于对立同一规律的表述联系起来思考,就会知道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在这里只说“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②,而没有说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如果前一种表述是把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并列起来,那末后一种表述就是残缺不全的了,只有把后一种说法也理解为包括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才能使这二种说法一致起来。否则,这个规律就只能表述为“对立的同一和转化”而不能表述为“对立的同一”。然而我们并未见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过这样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只要把对立面的转化从矛盾的同一性中排除出去,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立同一”也就不包括转化在内,因而不仅对立是绝对的对立,而且同一也是绝对的同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② 同上,第401页。

那末同一又怎么会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可变的呢？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札记和片断中的半句话：“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①也是证明同一和转化相“并列”的同志所经常引用的。其实，只要不是断章取义，这里的“同一性”显然是一个借用语，是用来表示各种自然力的不灭和守恒定律的。因此，这里丝毫没有把对立面转化与矛盾同一性并列起来的意思。

有的同志把前面毛泽东同志引用过的那段列宁的名言，也当作列宁把同一和转化并列起来的根据。因为列宁在这里说到，“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②显然这里有一个翻译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引用时，这句话是说：“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联系前文也说对立怎样“成为同一”，就不可能把转化理解为和同一相并列的意思。因为他说得很明白，在怎样的条件之下相互转化成为同一。而且，列宁在这一整段话中说了两层意思：（一）辩证法是研究对立面同一的学说；（二）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而也应与客观辩证法一致。在第一层意思里，只要分析一下语法就可以发现，其中“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并不是对前两句的说明，只是对后一句，即只是对“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的说明。因为在“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之前是一个逗号，而在这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破折号，再没有隔着别的标点符号。既然如此，破折号之后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是互相转化的”就不是并列的了，顿号前后是重叠用语，其中后者是对前者内容的阐述和说明。这个意思在第二层意思里就更明确了。在这段话的第二层意思里，同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性这个词根本就没有出现,但是很明显,其中说的“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都是同一性的内容。客观的矛盾同一性是如此的,人们的主观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可见,列宁的这段名言,并不能作为“并列”论的根据。

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的第九条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①好象列宁在这里的确是把对立面的统一和向对立面的转化并列起来了。但是把这一条同其他几条联系起来分析,就很清楚,这里的统一并不完全等同于同一性,因而也不是把对立面转化与同一性并列起来。从列宁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在十六要素之前,列宁先列了一个辩证法的三要素;写好之后,列宁显然并不满意,所以紧接着把这三要素扩充为七要素;然而写完七要素之后,列宁觉得还有些内容没写进去,于是在后面又作了补充,这才有了十六要素。其中补充的这第九条,按其内容明显的是对第五条的补充。第五条是:“(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②这第五条显然是说的矛盾双方同一性的内容: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可见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与“同一性”完全等同的概念,而只是同一性的一项内容。列宁在写了同一性的这些表现以后还觉得内容不够全面,所以才有第九条的“不仅”、“而且”的出现。因此列宁这个说法,并不是“不仅是对立面的同一性,而且是对立面的转化”的意思;相反,他是说同一性的内容,不仅包括对立面的统一,而且包括向对立面的转化。这才是列宁的本意。

我们知道,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是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快要结束时所写的综合性随笔。因此它的各条内容在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② 同上,第238页。

这之前的摘要中是有所反映的。就拿列宁在第九条所表达的思想来说，在前面的摘要中不止一处说明了这个意思。例如《哲学笔记》第 112 页所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第 210 页又把“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对立面的同一”、“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等作为相同意义的用语并列使用。这都说明，在列宁看来，对立面转化也是同一性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第九条的补充。

总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中，既没有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排斥在矛盾的同一性之外，也没有把对立面转化与同一性并列起来，而是明确地肯定矛盾的同一性也包括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内容。

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情况述评

谢 淀 波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从1876年参加民粹派运动到1918年逝世为止的四十多年中,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具有曲折多变的政治经历,从事过内容丰富、领域广阔、颇负盛誉的理论著述活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他的哲学著作,被列宁誉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如何认真地学习它们,研究它们,切切实实地继承这份遗产中的精华,早已引起了我国理论工作者的重视。现将解放以来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历史情况及现状作一简要介绍。



解放以来我国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五十年代中期,正值普列汉诺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纪念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梁诚瑞的《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绩》^①，仲系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②，汪子嵩的《需要学习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③等。这些文章的中心意思是：（1）肯定普列汉诺夫基本上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正面人物，肯定他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居于先驱者的地位，肯定他在反对民粹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2）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之所以获得了巨大声誉，不仅由于它们阐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还由于普列汉诺夫学识渊博，才华过人，长于写作，使得他的文章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说理透辟，脉络清晰，读来引人入胜，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3）对待普列汉诺夫理论著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更不能因为他的著作有缺点错误而贬得一钱不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4）有的文章还批评了苏联多年来在研究普列汉诺夫时的非历史主义态度，其表现是，“不仅批评多于研究，而且批评也失之笼统、片面”^④。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就没有反映出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一生活动的科学评价，在谈到他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时，表露出明显的不公正。纪念文章的作者们要求人们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做全面的分析批判，认真加以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虽然还处于最初步的阶段，但上述纪念文章的

① 见1956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

② 见1956年12月11日《文汇报》。

③ 见1956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④ 仲系：《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载1956年12月11日《文汇报》。

发表,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些文章所代表的方向是对头的,它们提出的任务也是正确的。只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那么,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工作肯定会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

但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我国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股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深深地渗透到理论研究中。在这期间,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寥寥无几,少得可怜,而这些文章的基调也与前大不相同。这表现在:(1)虽然也一般地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里的功绩和贡献,但往往又不适当地渲染和夸大他在此时期里的错误,突出他后来又倒向机会主义一边,堕落为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自己否定了自己。这样,普列汉诺夫便成了一个黯然失色,不足称道的人物。(2)人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着眼点,已经不是从被列宁称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里汲取丰富的营养,继承它的优秀成果,而是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象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理论家是怎么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呢”^②?原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战士怎么会成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呢?应当承认,科学地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里,那就大大降低了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他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的价值。(3)从不同程度上抹煞了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斗争中的历史作用,有的文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② 吴江:《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怎样堕落为修正主义者?》,载《红旗》1962年第23—24期。

不顾历史事实，断言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列宁首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了。在当时的报刊上，他成了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大叛徒，罪孽深重的修正主义头子。不要说研究他的思想，甚至原先出版的他的著作，也都统统列为禁书，不准出版、发售和借阅，就连附有他的序言和注释的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也因而受到株连。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指望对普列汉诺夫进行起码的理论研究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对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极为可喜的局面。这段时间里研究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发表的文章数量多。据比较粗略的统计，从1978年末到1981年初，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和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学术文章达30多篇。第二，涉及的范围广。许多研究文章，从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大体经历，到他各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从他的政治上的功过到理论上的是非；从他研究唯物史观形成史的方法论原则，到他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具体阐述；从他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到他的美学思想等，都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评价。第三，敢于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旗帜鲜明地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推倒了强加在普列汉诺夫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对于长期以来受到人们批评和非难的普列汉诺夫的某些观点，如他关于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起何种作用的观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项论公式”及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观点，关于把人的感觉和表象比喻为“特种象形文字”的观点等。研究者们已经不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结论，根据传统观念人云亦云，而是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分析和讨论。第四,在深入研究普列汉诺夫各方面理论观点的同时,还根据列宁的有关教导,提出了研究和评价普列汉诺夫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和指导思想,比如,评价普列汉诺夫要通观他的全部历史,而不能只凭一时一事,就给他扣上一顶简单、片面的政治帽子;由于他一生经历曲折,复杂多变,因而,对他的不同历史阶段,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他的同一历史阶段也要采取分析态度,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一笔抹煞;注意把哲学上的成就与政治策略上的错误适当地区分开来,在批判他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的同时,不要贬低他在哲学思想上的贡献;严格地把他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相比,与他的前人相比,看他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时,究竟贡献了什么独特的新东西,又有什么历史的局限性;评价和讨论他的某个观点,要力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他的整个论述,而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等等。这些指导原则的提出和贯彻,肯定会有助于推动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工作,使之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发展。

下面,我们侧重从哲学上分几个方面稍为具体地介绍一下最近两年来的研究情况。

—

最近两年来,在普列汉诺夫的研究工作中,大致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评价问题

研究普列汉诺夫,辟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确定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科学地估计他的理论遗产的价值,就不能采取正确

的态度去学习、研究和继承他留下来的理论遗产。近两年来,不少同志写文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林彪、“四人帮”任意割断历史、伪造历史,大肆散布丑化、诋毁普列汉诺夫的谬论,文章的作者们对此做了有力的驳斥。高放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是一个必须明确肯定的正面人物^①。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一生可以划为三个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具体分析。1876—1883年,普列汉诺夫是民粹主义者。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应该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载入史册”^②。1883—1903年,是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光辉的时期”^③,这时期他在五个方面为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1)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尖锐地批判了民粹主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在俄国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④;(3)在俄国迎接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以及国内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发展,列宁因此称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⑤;(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他是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在1903年他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之后,还在国际活动中坚持过正确的主张;(5)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是第一个举起义旗的先锋战士。从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一步步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他的错误和罪过主要有:其一,1903年11月7日发表《不该这么办》一

①②③④⑤ 见高放:《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文,鼓吹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其二,在1905年革命中抛出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反对工农武装起义;其三,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了帝国主义和沙皇的走狗,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其四,在俄国工农处于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下,被迫起来夺取政权的关头,他反对举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高文还特别分析了普列汉诺夫堕落后为机会主义者的矛盾复杂之处:在很长时间内动摇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而不是在机会主义泥潭中一沉到底;在政治上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同时,还能继续在理论上、学术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他虽然反对十月革命,但坚决拒绝出任临时政府的部长,反对举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叛乱。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属于前期有巨大功绩而后期失足的人。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决不能因其晚节不终而一笔勾销,而必须肯定其前功卓著,肯定他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

普列汉诺夫既然是一个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那么,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处于何种地位呢?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的理论活动同列宁哲学思想的形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在苏联理论界中,德波林等人曾认为,只有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才是正统,而列宁则不过是他的学生。后来,这种观点被米丁等人的意见所取代。米丁等人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到列宁,中间决不经过普列汉诺夫。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也沿袭了上述说法。王荫庭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他把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关系,比喻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①。他认为,“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一

^① 王荫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载198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

个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一个不断丰富提高的过程。要真实、全面、清楚地说明这个过程,无论从肯定还是从否定方面,普列汉诺夫都是一个必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不可或缺的人物。”^①从肯定方面说,列宁在1908年以前,基本是向普列汉诺夫学习,吸取他的思想精华。列宁倾心赞赏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明确表示坚决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有时甚至以“普列汉诺夫分子”自居。这表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是列宁主义赖以产生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其次,列宁不仅从学习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精华中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在1908年以后,又从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和哲学错误中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总之,普列汉诺夫是介于恩格斯和列宁中间的一个过渡环节。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之间,单独地存在着一个普列汉诺夫阶段,而只是意味着,普列汉诺夫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样来确定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能比较稳妥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把他抬得很高或者贬得很低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

长期以来,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不断遭到非难。不少学者认为,普列汉诺夫夸大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们常常不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抓住他在表述这些思想时的只言片语,指责他想在地理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的论断,轻则被说成是向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让步,重则被说成是滚进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地

① 王荫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载198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

理学派的怀抱。为了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王荫庭写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①,安延明、吴晓明写了《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基本理论》^②,陈延琳写了《普列汉诺夫论地理环境的作用》^③等文章。这些文章认为,从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思想来看,他并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而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发挥和发展了这个学说,对这个学说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根据文章作者们的分析,普列汉诺夫作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第一,他是公开地、系统地、全面地批判地理学派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④。“他不仅批判了近代‘地理决定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和布克尔,也批判了索洛维也夫和梅奇尼柯夫的错误”^⑤。而且,他的批评,不是简单地重复从西斯蒙第以来人们便已经熟悉的论据,即不是从相对不变化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制度迅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这个角度来立论,而是抓住了“地理决定论者”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发生的影响,并由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一根本错误。与此相对立,普列汉诺夫热情地宣传了另一种地理环境作用观,即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发生的关系来影响人的。这样,就从地理环境究竟是沿着什么途径来影响社会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上彻底与地理学派划清了界限。第二,针对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生产力发展的动因

① 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

② 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

③ 见《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④⑤ 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10期。

归结为人的智慧的努力，并企图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重新恢复唯心主义的统治的挑战，普列汉诺夫认为必须对“生产力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回答。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智慧的努力在劳动工具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根据马克思曾把自然器官的形成史与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加以类比的思想出发进而指出，如果说动植物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自然器官，那么，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改变它的人工器官。这就可以看出，“人们制造工具的智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在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①普列汉诺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驳倒把人的智慧、理性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唯心史观。第三，普列汉诺夫具体分析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作用问题，以及它通过对生产力的作用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问题。从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论来看，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某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才使得人类祖先的前肢同后肢的分工成为有利的；地理环境的不同要素影响到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和它们往后的发展，给人们提供出制造工具所必须的材料、加工的对象以及其他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别性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分工带来了交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的作用放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对它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考察。他认为，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作用是一个“变数”，而变化本身正受着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此，地理环境和社会人的相互关系是异乎寻常的变化多端，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产生着不同的结果；社会生产力每前进一

① 陈延琳：《普列汉诺夫论地理环境的作用》，载《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步,这种关系就变化一次。而且,社会生产力越增长,社会的人同自然界的联系也就变化得越快,人也就越能更加迅速地使自然服从于自己的控制,而不会回到一个受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的生活中去。第四,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地理环境学说史进行了初步探讨,特别指出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作用。

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的理论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王荫庭认为,他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在表述中有个别不确切或者错误的言论^①。陈延琳则认为,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中,有时可以看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某些影响,他有时与他本人正确的言论相矛盾,停留在地理环境简单地决定生产力、从而决定生产关系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上面。这“是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倾向”,“是对资产阶级‘地理决定论’的让步,实际上回到了普列汉诺夫自己所反对的混淆人类历史和生物发展史的错误”^②。

(三)关于普列汉诺夫论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

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也是一个曾经引起争议的理论。非难它的人们说,普列汉诺夫把意识形态仅仅看成是人的心理的反映,而不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就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许苏民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的文章,表示不同意上述看法。文章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说明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学说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是吸收了人类先进思想中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

① 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

② 陈延琳:《普列汉诺夫论地理环境的作用》,载《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6期。

关系所作的长期探索的科学成果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许苏民认为,普列汉诺夫提出这一学说的功绩在于:首先,他明确地将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人的心理和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并认为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分析,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①普列汉诺夫在自己关于思想史的理论活动中,十分注意考察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关系,具体解答了社会意识是如何反映社会存在的。这一学说,一方面反对了伯恩施坦从右的方面来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逆流,另一方面也反对了那些患有左倾幼稚病的人们把这一原理极端简单化的错误倾向。其次,普列汉诺夫提出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是批判地继承近三百年来先进思想家们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其与思想发展史之关系的研究成果的光辉范例。在近代思想史上,资产阶级学者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上提出了“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的论断^②,普列汉诺夫对这一论断进行了科学的改造。他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越过这些学者的地方,“就在于指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它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心理的进化、思想体系的变迁”^③。这样,普列汉诺夫就在自己的关于社会意识具有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中彻底贯彻了唯物主义原则。最后,普列汉诺夫的关于社会意识具有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及其“五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72页。

②③ 许苏民:《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二期。

论公式”，同恩格斯关于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的思想非常吻合。这表明，普列汉诺夫作为恩格斯的学生，很懂得他的老师的学说中的往往被人们忽略的精微之处。他把这一精微之处集中概括和明确揭示出来，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大贡献。

许苏民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学说仍然不是十分完善的。他以巨大的精力研究思想史，偏重于研究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没有强调思想体系在社会心理形成和变化中的指导作用，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四）关于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

如何科学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做到在承认个别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又坚持反对“英雄崇拜”或“个人迷信”，防止夸大个别英雄人物的作用而抹煞广大群众的个人作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陈启能在《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①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思想，并称赞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提到了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他还能“结合当时各种流派的不同看法进行分析批判，从而使他的论述旁征博引、材料丰富”^②，避免了干巴巴的说教。

陈启能认为，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论述，包括如下几点：（1）他从世界观的高度出发，严格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则界限。普列汉诺夫指出，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英雄”与“群氓”对

① 见《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② 陈启能：《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

立起来,是民粹派的错误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也是他们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之一。他们把整个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前途都寄托于某个先知的头脑,把“批判地思维的人”的大脑的活动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个别杰出人物的头脑中,而是从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肯定广大群众,特别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作用。先进人物只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时候,才能起到一定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2)普列汉诺夫继而从自由与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性同特殊性及其个别性等范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深入而又详尽地剖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首先,他一方面反对了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又反对了否认个人历史作用的宿命论和无为主义。他认为,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可以和最积极的实际行动结合得很好的,“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只能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个人的毅力”^①。而且,当个人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其次,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历史必然性只能决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而历史事变的某些局部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性造成的;但同时不应该忘记,这种偶然性的作用的实现,归根到底又受着必然性的制约,它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或历史进程的总趋势。(3)普列汉诺夫还探讨了在实现个人的历史作用时所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这种作用要得到实现,第一要有社会需要,第二要有便于他施展才能的具体环境。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43页。

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这些论述，对于批判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其一是对历史发展中主观因素的作用探讨和阐述得不够；其二是，他强调杰出个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这虽然一般说来是对的，但有时他似乎把这种需要看成是一把现成的椅子，当着某个天才人物已经占据了这把椅子之后，其他有才能的人物便只好消声匿迹，默然无闻了。这种把社会需要简单化、绝对化的看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五）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人们历来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苏联学者福米娜的《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一书指责普列汉诺夫“保卫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也称普列汉诺夫“支持了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敦尼克等人主编的《哲学史》则说普列汉诺夫“向不可知论作了让步”。我国哲学界过去沿袭了上述看法。“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有一本虽未正式出版但已流行甚广的《哲学小辞典》，说“象形文字论显然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相违背”，完全“滚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余源培和张庆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分别著文重新评价了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①。

第一，从普列汉诺夫提出“象形文字论”的经过来看，只要不带偏见，就应该承认，他的出发点是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实际上，“象形”一词本来就有“相似”的意思，象形文字是一种

① 余源培：《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张庆：《“象形文字”论再认识》，载《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在描摹实物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可见，当普列汉诺夫把人的感觉比做“特殊象形文字”时，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根源于前者；尽管普列汉诺夫为了反对物质和意识“等同论”，曾强调感觉和客观事物不是一个东西，强调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他又明白无误地指出，感觉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坚信世界乃是可知的。通观普列汉诺夫关于感觉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全部论述，他是在捍卫恩格斯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原理，他对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批判也是颇为有力的。

第二，从唯物论和唯心论及不可知论的对立来看，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决不能简单地用某一个概念来划分，而是要看它们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哲学史的事实告诉人们，“在‘记号’、‘符号’等概念下面，可以隐藏着唯心论和唯物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①。“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尽管用语不够妥切，但从实质上看，既不是贝克莱、马赫的唯心主义‘符号论’，也不是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主义的‘符号论’。”^②他没有否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他反对不可知主义，明确肯定世界的可知性。因此，将“象形文字论”等同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从1905年普列汉诺夫删除“象形文字”的表述这一事实来看，首先应该肯定他对理论问题是严肃认真的。他这样做，一是为了使自己的注释文字在表述上更忠实于恩格斯的原意，二是为了避免使用易于为哲学上的论敌所利用的术语。普列汉诺夫这种光明磊落的自我批评精神，本来是值得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的，但有的人却反诬他进行诡辩，是推诿责任，是把保卫唯心主义

①② 见余源培：《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

象形文字论的错误说成仅仅是术语上的不妥。这是不能使人信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何看待列宁对“象形文字论”的批评？余源培认为，列宁谈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首先是为了揭露巴扎罗夫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观点的把戏。其次，列宁在批评“象形文字论”时，明确肯定了普列汉诺夫是个唯物主义者，也没有给它加上唯心主义的帽子。“至于列宁把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归结为：‘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则是可以讨论的”^①。余源培认为，“这种说法过份了、太重了，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②。

（六）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述

为了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过去的进步哲学及社会科学在历史上的传统关系，普列汉诺夫一生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写出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深刻地多方面地研究了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出色地探讨和解决了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王荫庭在《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列汉诺夫研究哲学史的出发点是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以经济史来说明观念的历史。他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了那种只罗列现象而不去揭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经验主义的做法，批判了那种颠来倒去只靠援引相互作用来解释哲学发展的折衷主义的因素论，还批判了单纯用逻辑推演的方法来说明哲学派别彼此更替的唯心主义理论。

①② 余源培：《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

在批判这些理论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详细地论证了经济关系对于哲学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表现在：（1）社会必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抽出一定的人手来全力从事各种科学工作，同时，任何一种新体系赖以出现的专门知识的积累也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2）特定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其性质也决定于特定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3）社会内脑力工作的方向本身是由生产状况、特别是由生产关系的状况决定的。

第二，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哲学史研究中始终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对意识形态发展史的极端重要的巨大影响。但他认为，（1）阶级斗争对哲学的影响同物质生产状况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阶级斗争只不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经济矛盾的表现而已；（2）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时阶级斗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强烈，有时生产力或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3）阶级斗争在影响思想斗争时，它永远不是在全线上进行的，不是在人类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一切领域或一切问题上都互相攻击的；（4）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把社会物质生产或阶级斗争决定哲学思想发展的原理简单化、庸俗化的意见，他强调某种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强调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力量体系，而思想在受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不是直接的机械的过程。

第三，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区别了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体系这两种社会意识形态，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说。这个学说的基本要点是：“就整个社会意识看，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以社会存在为源，而把先行的社会意识当作流。但是在人类精神范围内，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却以当时的社会心理为源，而把先行时代所创造的思想体系当作流。”^① 据此，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一条重

要原则：要了解某一国度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不仅要知道它的经济状况，而且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不仅如此，他还把社会心理适应经济关系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反对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倾向。

第四，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另一个功绩是全面地分析了哲学、文学、艺术等思想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1）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经济发达的国家哲学不一定先进，这是因为，哲学同经济基础、同生产力只是间接地通过若干中间环节才发生关系。（2）相对于政治制度而言，政治上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产生进步的哲学思想，而就一个哲学家来说，“虽然同情社会生活中的反动意向，可是他却能创造出值得充分注意甚至值得进步人士抱同情的哲学体系……所以象反动分子或进步人士这类形容词根本没有说明这个哲学家的理论上的功绩或错误。”②（3）相对于“社会心理”而言，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某种脱节的现象。（4）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不同思想体系以及外国某些思潮的相互作用上，这种相互作用能够削弱意识形态的发展对于经济结构的依赖性，但决不能勾销这种依赖性。（5）思想体系对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社会心理具有反作用。（6）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在特定思想体系对其前辈思想成果的继承性上，普列汉诺夫以毕生精力研究了这种继承性，竭力找出它的规律性，分析了它的千差万别的情况。

总之，普列汉诺夫哲学史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在这些方法

① 王荫庭：《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载《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75页。

论原则中,唯物史观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他哲学史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继承他的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有着重大的意义。

以上几个问题的介绍表明,我国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工作已经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正在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向前发展。可以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成果会产生出来。

附录

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索引

(1949年—1981年初)

文 章 题 目	作 者 出 处	发 表 时 间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仲 系 文汇报	1956年12月11日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功绩	梁诚瑞 光明日报	1956年12月12日
需要学习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论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汪子嵩 光明日报	1956年12月26日
介绍普列汉诺夫著《论一元论历史观 之发展》	陈连舫 哲学研究	1956年第2期
对陈连舫所写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 发展》一书介绍的批评	傅雄烈	
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思想——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简 介之一	王九龄 哲学研究	1957年第1期
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的论战——	杨永志 光明日报	1957年6月30日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简介之二	同 上 同 上	1957年7月7日
普列汉诺夫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简介之三	同 上 同 上	1957年7月14日
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		
普列汉诺夫著作简介之四	同 上 同 上	1957年12月1日
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普列汉诺夫 著作简介之五	同 上 同 上	1957年12月8日
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修正主义”评介	葛 力 同 上	1957年9月15日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汝 信 人民日报	1961年10月27日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吴元迈 光明日报	1962年1月28日
曾经反对过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诺夫怎 样堕落成修正主义者?	吴 江 红 旗	1962年第23、24期

文 章 题 目	作 者 出 处	发 表 时 间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	王先睿 光明日报	1963年3月8日
评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和《艺术与社会生活》	王子野 新建设	1963年第2期
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批判	高敬增 江海学刊	1964年8月号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出版者说明		1964年
陈伯达制造的“普列汉诺夫事件”	刘梦溪 理论动态	1976年第56期
胡乔木同志对《陈伯达制造的“普列汉诺夫事件”》一文的意见	理论动态	1976年第56期
列宁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	许复宁	
	王乃禧 南京师院学报	1978年第4期
论原始民族的舞蹈——读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叶 宁 舞 蹈	1978年第6期
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读《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李森学 吉林日报	1979年1月17日
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	刘梦溪 光明日报	1979年2月17日
普列汉诺夫的追悼会	朱 容	
	高敬增 新时期	1979年第2期
历史人物评价三题——从普列汉诺夫谈起	张兹晷 河北师院学报	1979年第2期
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	吴元迈 外国文艺研究	1979年第3期
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	高 放 教学与研究	1979年第6期
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	计永佑 美学论丛	1979年第1期
评《辞海》“普列汉诺夫”条	王荫庭 光明日报	1980年1月14日
评普列汉诺夫关于审美活动的论述	楼昔勇 上海师大学报	1980年第1期
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	黄药眠 文艺理论研究	1980年第2期

文 章 题 目	作 者 出 处 发 表 时 间
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王荫庭 江汉论坛 1980年第2期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同 上 光明日报 1980年4月24日
试论普列汉诺夫	陈忠雄 河南师大学报 1980年第4期
论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演变	侯尚智 兰州大学学报 1980年第4期
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	陈复兴 东北师大学报 1980年第4期
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	吴元迈 文学评论 1980年第5期
一个本本主义者的悲剧	陈启能 世界历史 1980年第5期
评两本普列汉诺夫传记	同 上 同 上 同上
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 1903—1913 年的活动的?	陈忠雄 河南师大学报 1980年第6期
普列汉诺夫论地理环境的作用	陈延琳 教学与研究 1980年第6期
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基本理论	安延明 吴晓明 哲学研究 1980年第8期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重大贡献	王荫庭 哲学研究 1980年第10期
略论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伟大并非“救世主”	张兹暑 历史教学 1980年第10期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袁良培 浙江日报 1980年10月14日
为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说”一辩	陈启能 世界历史 1981年第1期
普列汉诺夫论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	余源培 复旦学报 1981年第1期
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	陈启能 史学月刊 1981年第1期
“象形文字”论再认识	许苏民 江汉论坛 1981年第2期
	张 庆 华南师院学报 1981年第2期

各国对德波林学派的评论

张念丰

阿布拉姆·莫依谢维奇·德波林(1881—1963)是苏联哲学界一个有争论的人物,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7—1917年曾为孟什维克,1908年毕业于伯尔尼大学哲学系,1926—1930年担任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一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

德波林学派是指以德波林为首居于当时苏联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主要成员有卡列夫、史登、卢波尔、弗兰克福特、格森、波特沃洛茨基、阿哥尔、列文、列维特等。

三十年代,苏联开展了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运动。斯大林曾于1930年12月9日向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成员发表谈话,认为德波林学派是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宣扬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修正。联共中央于1931年1月25日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批评当时领导这个杂志的德波林集团“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滚到了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立场。”这场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在各国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英、法、德、奥、瑞士等国的报刊,都发表了评论,直到七十年代仍有不少哲学著作专门评论这个问题,而且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苏联批判德波林派，各国哲学界看法不一，存在着截然相反
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哲学界开展批判德波林是正确的、必要的，是苏联生活一切方面日益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件之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评论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来看，以前的哲学界的领导显然是停留在距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很远的地方。如果说机械论者抛弃了辩证法而保卫一种不能阐明革命实践并且不适应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唯物主义的话，那末德波林在把辩证法说成是某种脱离唯物主义的东西的时候，他便是用没有物质内容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经院哲学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这已经包含着放弃唯物主义立场的胚芽，因为唯物主义跟服从实际生活要求的理论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辩证法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应当是行动的指南，而在德波林的见解中却蜕化为学院式的烦琐哲学，而哲学家也变成了编造一些与他周围正实现着的建设事业毫无关系的学究。对黑格尔的非批判的态度成了所谓哲学领导的特征。（米尔斯基：《1930年—1931年联共（布）内的哲学论战》，美国《The Communist》杂志1931年10月号）

在英国，1933年以问答的形式，出版了盖凯尔的《莫斯科的对话》一书。书中是以共产党员索克拉托夫同英国资本主义世界的教授、银行家、改良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福利团体的成员以及主教等进行谈话的方式，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书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1930年的哲学论战。作者通过索克拉托夫之口，讲述了批判德波林派的必要性，使对话者也了解了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人道主义者”说道：“在这些争论中使我感到吃惊的是

你们的革命心理对于那些即使犯了错误然而仍然忠顺地为你们的事业服务的人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激”时，而另一个对话者“教授”却反驳说：“大概，你忘记了这个国家不只是曾经发生过革命，而且还正处在它的一个最危机的阶段上，如果说共产党人不能容忍自己的阶级敌人，那末他们也就不能容忍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中的那些有意或无意帮助他们的阶级敌人的那些人。”作者通过对话者之口还谈到，在革命的年代，当打下涉及下一代一系列福利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时，社会和负责的革命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求哲学领导在理论上服务于新生活新制度的建设。对话的结尾是这样说的：由共产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新的转变证明它的革命精力是取之不竭的，并且尽管我们的运动面前还有巨大的障碍，但仍在坚毅的向自己的伟大目标前进。（盖凯尔：《莫斯科的对话》英文版，第189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批判德波林派是错误的，是斯大林干预的结果。一家法文杂志发表文章说，斯大林1930年12月9日的谈话，是德波林派的“决定性的危机”。文章认为，德波林重视哲学的特殊性并具有客观的敏感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经院哲学掩盖下的德波林的著作中，复活了许多哲学基本范畴，例如质的范畴。然而正是这种情况，也就成了在新的革命时期条件下的弱点。^①（沃斯阔夫：《革命以后的俄国哲学》法文杂志《I monde slave》1931年11、12月号）IM·鲍亨斯基认为，机械论者与德波林派之间的论战，到一九二九年，对德波林来说，意味着取得了对对手的完全胜利。但是斯大林插身进来。1929年12月27日，他在社会主义农学家会议上的发言中否定了机械论者，并且也严厉地批判了官方

^① II·沃斯阔夫系俄国逃亡分子。

哲学家。正统派就利用这个讲话向德波林和他的集团进行公开的攻击。不久以后，1931年1月25日，俄国最高权威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对他的学说和刊物作出了判决，在红色教授研究院支部的一个决议里得到详尽的说明。次日，1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红色教授研究院支部的决议，决议对战败者加了很多罪名。^①（I·M·鲍亨斯基：《苏俄辩证唯物主义》，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9页。）

南斯拉夫的弗兰尼茨基认为，德波林为以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而著称，革命后他对辩证法，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德波林派眼中，斯大林根本不算是理论人物，尤其是不算是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写道，米丁集团对德波林的主要责难是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使哲学脱离政治即不去研究党和国家当前政策和任务。但是，在政治领导看来，米丁集团的党性仍然不够。因此，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议上，不仅支持了米丁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同时还责备他们的温情主义。并把德波林称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史》下册第432～437页）

二

对德波林派的哲学思想，各国哲学界的评价也不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德波林派的哲学思想是倾向于唯心主义的，是经由费尔巴哈主义向后倒退到了黑格尔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评论说，德波林一派在攻击机械论者和揭露他们的错误上，确有贡

^① 鲍亨斯基系瑞士新托马斯主义者。

献；但德波林一派的哲学见解也有两个严重弱点。第一，他们在纠正机械论的错误上不免矫往过正，倾向于唯心主义阵营。第二，他们没有接触到苏联全国突飞猛进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尤其没有接触到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建立集体农庄为中心的种种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德波林原是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就哲学上说，所谓孟什维克意思是依附于普列汉诺夫的人们，他们相信革命运动中的领导的哲学家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列宁。值得重视的，反对德波林的几乎全是比较年青的人们。他们既不象机械论者那样耽心于自然科学，也不象德波林一派那样耽心于哲学史。他们强调哲学对于目前的日新月异的现实应该提供社会的和政治的贡献。在这方面，苏联的哲学论者，在确立苏联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上，具有不朽的作用。（桑莫维尔：《苏联的哲学》中译本第208—212页）

拉克在美国《苏联思想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德波林根据列宁的著作，试图运用和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可是，却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当作自己的哲学观点，德波林阐述的辩证法理论，事实上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继续，如果德波林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他是经由费尔巴哈主义向后倒退到了黑格尔主义；正是这经由费尔巴哈主义向后倒退了，黑格尔主义的行为构成了德波林主义的本质。事实上，德波林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汇合”或“合并”起来所得的结果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延伸”的辩证法。德波林不可能超过作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一个“延伸”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为他和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懂得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经过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汇合”，而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马克思是黑格

尔主义者,但超出了黑格尔的范围而达到费尔巴哈主义;马克思在掌握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后,又回过头来唯物地仔细研究黑格尔,用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研读黑格尔;然后,马克思运用这个脱去了它神秘的外壳尔后成为革命的辩证法的新的方法反对费尔巴哈。德波林在他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一书中承认,德波林学派是以黑格尔为中心,德波林学派的辩证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黑格尔基础上的。(《哲学译丛》1980年第3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德波林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最深刻的唯物主义的捍卫者,被责难为唯心主义是不公平的。德波林主持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使俄国读者同西方某些思潮保持接触,有时也发表一些具有真正哲学内容的文章。(英国《哲学家》杂志1933年4月号)

奥地利的哥斯塔夫·维特尔认为,从1905年到1917年,德波林是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机械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主要战士之一。这时期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辩证唯物主义导论》。书中叙述了从培根起的近代哲学史上的经验批判的思想的发展,并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一个综合的论述。这一著作,普列汉诺夫曾附著一序言,在推动辩证唯物主义上,起了巨大的作用。革命后,德波林在哲学界很活跃,他专心致力于和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偏向作斗争,他批判卢卡奇以黑格尔解释马克思主义,反对当时甚至在俄国也有某些反应的弗洛伊德和斯宾格勒的理论;反对伦理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派的新康德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德波林看来,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包括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二)自然辩证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三)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把

辩证法看作是方法论，德波林这一理论遭受机械论和官方辩证唯物主义解说者二方面的猛烈攻击。作者认为，这种责难，殊欠公允。（威特尔特：《辩证唯物主义》，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86—189 页）

在评论德波林的哲学思想与普列汉诺夫以及黑格尔哲学关系的问题时，各国哲学界的看法则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德波林是黑格尔的狂热崇拜者，德波林派的哲学思想是黑格尔主义的变种。认为他同黑格尔哲学发生接触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因此他有时候也感染了许多年轻的黑格尔崇拜者的那种狂热，似乎决心要把一切政治事件都套进黑格尔的范畴。他关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广泛知识使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斯宾诺莎以后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按照黑格尔的三段式——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同德国唯心主义中辩证因素的伟大综合。（勒奈·阿耳贝尔格：《被遗忘的哲学家：阿布拉姆·德波林》《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第 145 页）尽管德波林自己并不承认，或者——可以肯定的设想——违反他的意志，他成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一个先驱者。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黑格尔主义的变种。

德波林被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分子。美国的拉克认为，德波林深受列宁的影响，却是普列汉诺夫分子；他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世界观发展到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英国的阿耳贝尔格认为，德波林虽然对列宁的政治和组织天才十分钦佩，他仍然不会把列宁的哲学看得多么重要。布尔什维克关于哲学的“列宁阶段”的说法在德波林的广泛的思辩中没有地位。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他只同气味相投的普列汉诺夫接近。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他

经常只提到普列汉诺夫，使普列汉诺夫成为他的重要见证。奥地利的威特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描述说，就对普列汉诺夫而言，赞成他，本非不当，因为列宁也尊重他；但是德波林受的反对，在于他做的太过分，他是无批判地追随普列汉诺夫。德波林所取于普列汉诺夫的地方，恰是他的最无价值的地方，例如他为费尔巴哈辩护，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理应用于认识论，他低估列宁的认识论，企图不顾历史和现实，用纯粹的形而上学范畴来解决认识论上的主体客体的关系问题。德波林哲学的整个非政治和非革命的精神，和普列汉诺夫相似。

三

在苏联，对德波林派的评论，1956年以前和1956年以后有很大的变化。

1956年以前，认为德波林派的理论观点本质上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论。它以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辞极巧妙地掩盖着真面目。它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表现在：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分离。由此而在实际上复活了第二国际最有害的教条之一。二、拒绝和曲解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派性原则。三、对列宁及其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四、修正和歪曲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1954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条中介绍说：“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派别，是阶级敌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行反抗的反映，是托洛茨基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复辟分子的思想掩护，为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革命提供理论粮食，……共产党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敌人在哲学战线上的代理人加以揭露和粉碎。”

1960年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第一卷中关于“德波林”的条目，在提法上发生了变化。文中说，在二十年代，德波林曾批判机械主义，保卫唯物辩证法。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德波林的许多著作的特点是：哲学理论脱离实践，低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革命转变的意义，低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在《列宁是思想家》一书中，德波林在描述列宁是伟大思想家的同时，说列宁在哲学上是普列汉诺夫的门徒。在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中，批评当时领导这个杂志的德波林集团“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滚到了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立场。”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对批判德波林派，在一些问题是肯定的，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是否定的。例如196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在苏联的发表和研究史》一书中评论说，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我国广泛开展的理论大辩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大辩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深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过程，并且是同我国思想领域的一般过程、同反对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的思想残余的斗争以及党内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在大辩论中反映了社会科学向紧密联系实际、联系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的转变（其积极意义也在此）。

这本书评论说，在辩论过程中克服了一些当时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然而应当指出，过于尖锐的辩论语调、派别主义表现，有时毫无根据地从政治上指责某一参加讨论的人，把理论上的错误（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平地）直接同反党倾向联系在一起，这就常常妨碍深入研究那些有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1978年，第100—101页）

德波林本人，1956年以前一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担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兼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委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委。但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较少。1956年以后，德波林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问题》1956年第1期）、《近代和现代社会政治学说》（第1卷，1958年）、《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家弗里·施坦别尔格》（《近代现代史》1959年第1期）、《新纳粹主义者的言论和行动》（《共产党人》1960年第13期）。1961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哲学与政治》。

1961年6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为德波林八十岁生日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宣读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历史研究所等给德波林的祝词，赞扬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历史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63年德波林死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发表讣告说，从1907年，直到逝世为止，德波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天资和组织才能都贡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事业和干部教育。

四

在我国，对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评论，较早的一本书是《近代哲学批判》。书中在谈到苏联哲学界中的德波林派时说，以德波林为首的所谓“带有少数派色彩的唯心论”其主要代表者有德波林、卡列夫、史登、卢波尔等。大都是苏联哲学界的“老权威”，建立了与具体实践脱离的抽象哲学，这是表现于它的黑格尔化的事实。在德波林派的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条件地容纳了黑格尔观点，同时他们又不加批判地继承了普列汉诺夫。该

书作者认为，德波林派的思想特点之一，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与政治分离。具体表现在他们完全放弃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理论的探讨，如新经济政策最后阶段的问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社会主义劳动组织问题，以及过渡时期的规律性，过渡时期新的生产关系问题等等。德波林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忽视苏俄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所谓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是在列宁一生不断对修正派、马赫派、波格丹诺夫派、少数派、机械论派等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锻炼成的。哲学上的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变革时期的马克思派哲学的发展。列宁用新的革命实践充实了现代唯物论哲学的内容：他暴露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帝国主义的规律性；他与渐近论、自然生长论及尾巴主义的理论，作了极努力的斗争。列宁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最卓越的模范，他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政策、策略和战术问题。这些便是列宁阶段的特征。（沈志远：《近代哲学批判》第220—226页）

五十和六十年代，我国出版的哲学著作，对德波林派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李达在《矛盾论解说》一书中认为，德波林本人原是一个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的孟什维克劣根性仍未改变。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外衣，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行新黑格尔主义的“修正”。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自然观及历史观的综合。这便是说，黑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法加上唯物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德波林不但不能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成了黑格尔唯心论的俘虏。他把唯物辩证法改变为抽象的方法论。所以德波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首先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哲学脱离政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复活了第二国际孟什维克最有

害的特征；其次表现为对于哲学的党派性的曲解，使哲学离开党的方针政策；再次表现为对于哲学上的列宁阶段的不理解，不能履行列宁所指示的战斗唯物论者的任务，因而使哲学变为与实际不发生关系、缺乏战斗性的概念的游戏。

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批判了德波林派。在论述矛盾普遍性问题时，该书举例说，无论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过程都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如果只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有矛盾而不承认别的阶段有矛盾，例如德波林学派认为过程的开始时只有差异，没有矛盾，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矛盾，那是同事实不符的，违反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事实上，事物发展过程开始时的差异，就是矛盾，只是没有激化而已。

近年来，我国对德波林哲学思想的评价，有了不同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分歧。

对于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苏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界开展批判德波林派的运动，其基本方面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这场斗争对于保卫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对于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对于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也应当总结其教训。其主要问题，一是对批判的对象，逐步升级，一棍子打死；二是对批判的问题，缺乏辩证的分析，全盘否定。有的时候不适当的把理论上的错误同反党倾向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派在内容上是片面的，在方式上是粗暴的，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压制学术民主的恶劣先例。它的唯一成果是保卫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

对于德波林本人的评价，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德波林是修正主义哲学家。与伯恩斯坦、波格丹诺夫的修正主义哲学反映了把黑格尔当“死狗”的资产阶级思潮相反，德波林的修正主义哲学则反映了黑格尔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德波林对唯物辩证法的修正和歪曲，都是在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旗帜下进行的。为此，德波林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等同起来，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把一切哲学思潮调和起来并联合在一个最高的哲学综合中，它是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结果。”还说“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意味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综合，它在科学上是用来调和这些对立面的。”德波林还鼓吹差别不是矛盾的谬论，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说：“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一切存在物都应当从纯粹状态中，即从无差别的同一中摆脱出来。”与此同时，德波林还鼓吹矛盾调和论，他说：“康德把反题和正题对立起来，想证明正题排斥反题，因而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解决的。可是积极的辩证法认为，正题和反题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而是互相调和的对立面。”（徐崇温：《保卫唯物辩证法》第48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把德波林判为修正主义哲学家是不公正的。德波林在反对机械论者的斗争中所持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在德波林的著作中，虽然可以找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这更多的表现在形式方面即有的观点的表述上。

关于德波林学派的思想渊源，一种观点认为，德波林学派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无条件地容纳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在他伦理学中，把概念的自动发展，看做是现实世界的发展，他把发展划分为同一、差别、对立和矛盾的几个阶段，矛盾是在后一

个阶段上才表现出来。这种见解，不但是唯心论，而且是形而上学。德波林派师承黑格尔的概念发展公式，也把事物的发展过程，分为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几个阶段。由同一进到差别，由差别进到对立，由对立进到矛盾。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一种误解。从字面上看，德波林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黑格尔的著作，说了许多关于黑格尔的话，但其实质上，德波林却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歪曲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黑格尔曾在他的《逻辑学》中把概念自动发展划分为同一、差别、对立、矛盾等阶段，但他讲的本质自身内部展开过程所经历的阶段与德波林关于“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到达于极端的矛盾——都经过以后，解决矛盾的时候就到来”的说法，在内容上不是一回事。德波林所讲的同一是抽象的同一，绝对的同一，不包含差别的同一，黑格尔所讲的同一，是“包含殊异于自身的同一，是具体的同一。虽然他们都在唯心论的基础上，但是黑格尔讲的是辩证法，德波林讲的是形而上学。（任吉悌：《德波林学派及其对黑格尔矛盾学说的歪曲》，《安徽劳动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关于德波林学派的评价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对德波林学派的评价，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相信，经过广大哲学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这些有争论的问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简介

俞长彬 钱学敏

《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些著名学者集体编写的，负责领导编写工作的是以G·门德教授和H·乌尔利希博士为首的委员会。

本书把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分为五个主要时期：

(一)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巴黎公社的建立；

(二) 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巴黎公社的建立，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帝国主义阶段开始；

(三) 从帝国主义阶段开始，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四) 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1945年德国从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五) 从1945年苏联人民战胜希特勒德国和东德反法西斯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到六十年代初。

据此，这部哲学史共分三卷。第一卷包括第(一)、(二)、(三)三个时期；第二卷论述第(四)个时期；第三卷论述第(五)个时期，亦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

现将《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第一卷上册简介如下：

本册的作者是M·克莱恩、E·朗格和F·李希特。1969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这一册除《序言》外，共分五章：一、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二、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三、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发现和从哲学理论上的论证；四、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和1848—185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五、1852—187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发展。

在《序言》中，作者对于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任务、方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对象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运用的规律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的工人政党、社会主义建设、科学进步的内在的发展中的联系”。他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要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面和组成部分。同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内容和规律性”，“科学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借以表现出来的决定性的政治形式和理论形式”。关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普遍原则与各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书中写道：“既然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国际主义本质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么，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普遍原则也要运用于特殊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政党，对运用和进一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一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前提和理论前提（包括自然科学前提）。其中一节专门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产生于德国，作者说：“当我们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历史形

势和英国及法国的历史形势加以对比,那么就会发现,德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不仅比英国和法国的多得多,而且也更尖锐、更复杂”,“为了能够洞察德国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发展条件,必须运用当时哲学和科学已达到的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并不是所有当时的思想家都能够运用这种最高的认识的。只有最进步的、与人民的革命力量相联系的、站在科学高峰之上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作者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能够科学地分析革命的动力,发现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章详细地叙述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作者分析了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并通过大量具体而生动的材料说明这种转变是反复的、矛盾的、包含着激烈的内心冲突的。由于作者对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分别阐明的,因而使人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位创始人在共同合作之前,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作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民主主义原则不仅带有政治性,而且首先带有社会性,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不可能在国家形式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只有通过对于市民社会实行社会的改造才能解决。作者还认为青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以前已经把宗教或神归结为人和人性,而费尔巴哈是在这不久以后才从理论上详细阐发了这一思想。

第三章分析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起,直至《共产党宣言》出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科学论证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的,所以这一章

的总题目定为“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发现和从哲学理论上的论证”，书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是工人阶级科学哲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成为这个阶级的理论家，他们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并且开始制订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的理论观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也都作了具体的分析。作者认为：从《德法年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宣告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而开始的，是以制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告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把自己在经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成为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观形成过程的结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观同现代工人运动的结合。这种结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改造世界的意义。

第四章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欧洲1848—1849年革命经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作者指出，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观点用来全面分析当时的政治事件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创造性地概括了新的历史经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深化和发展。特别是由于具体地确定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书中还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进一步论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法，分析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政治的与思想的表现之间的复杂的交互关系，揭示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及其本质特征。

在第五章中作者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研究的中心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1850年以后，由于马克思广泛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所以黑格尔的全部哲学、特别是他的《逻辑学》成为马克思注意的中心。因而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阐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哲学问题，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和1863—1865年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丰富材料、以及《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中的发展。同时，作者还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第一国际前后的理论活动，分析了他们为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所进行的斗争。富有特色的是：书中对于拉萨尔的哲学发展、拉萨尔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在世界观方面的论战都有专门论述。

在编写《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组织全国一些哲学工作者就有关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拟定了编写提纲，于1964年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广泛征求意见，五年后第一卷上册才问世。因此，这部哲学史反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列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水平。从第一卷上册（40余万字）来看，该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作了最详细的论述，观点鲜明，文字简洁，材料丰富，有些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有一定科学水平的著作。

编 后 记

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科学在我国开始得到了重视，学术讨论比较活跃。为了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们编辑了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战斗历程。它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已经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光辉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一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它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发展的状况，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本书收入的文章，从上述几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这本论集，是由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辑组选编的。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下列同志（按姓氏笔划为序）：马泽民、马绍孟、王卫国、田士章、宋一秀、张义德、徐亦让。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提供意见，以便今后改进工作。

一九八二年三月